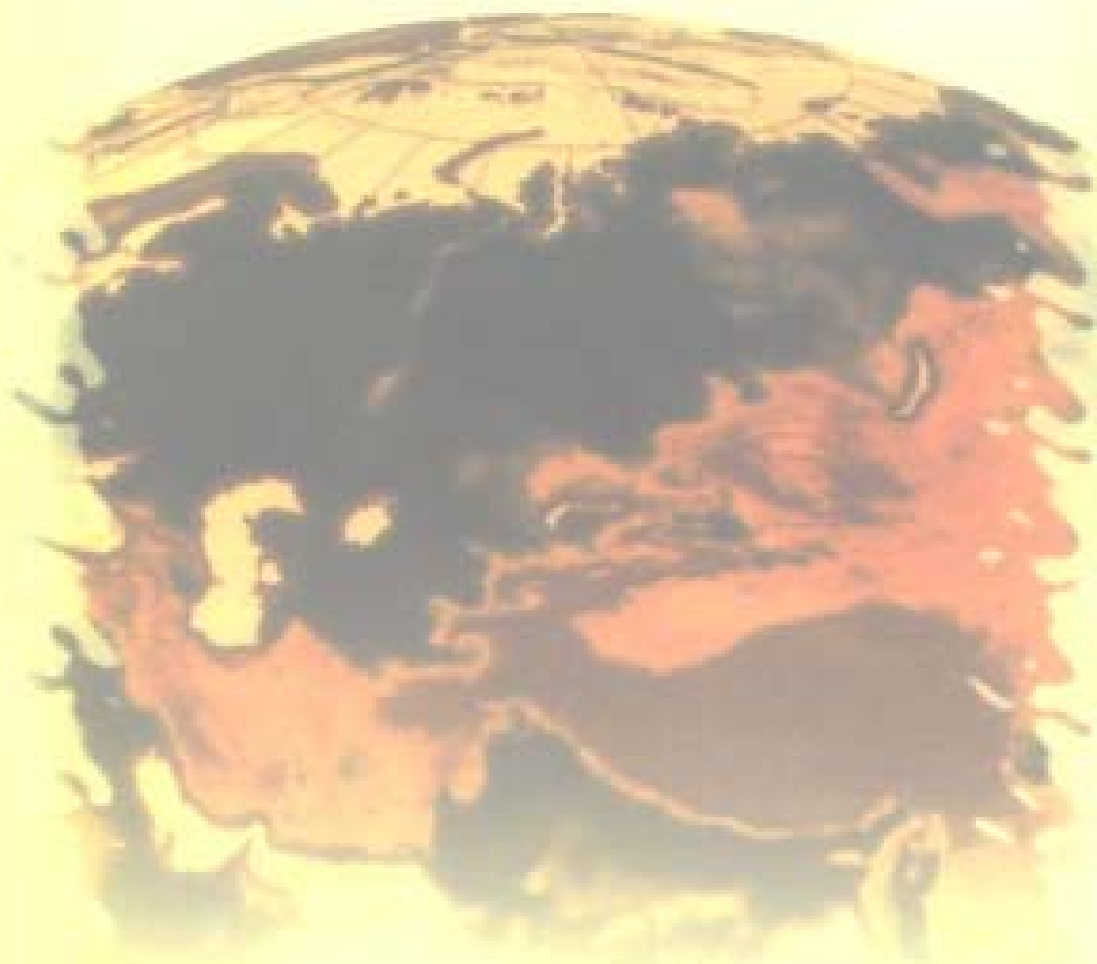


全球化论丛

GLOBALIZATION SERIES

全球化时代的 资本主义

■ 张世鹏 殷叙彝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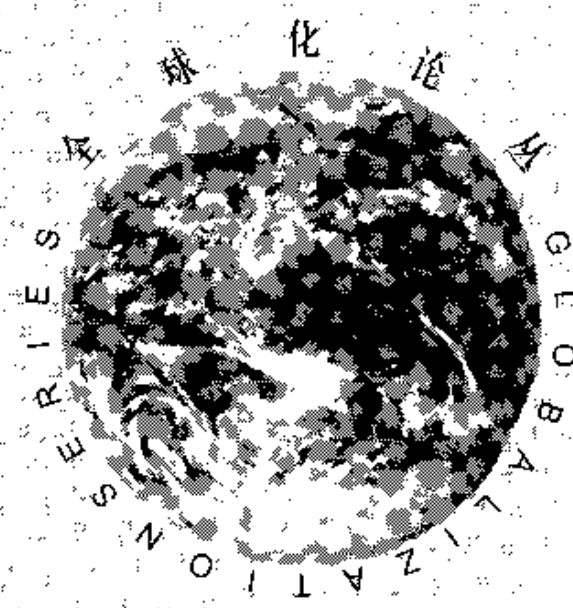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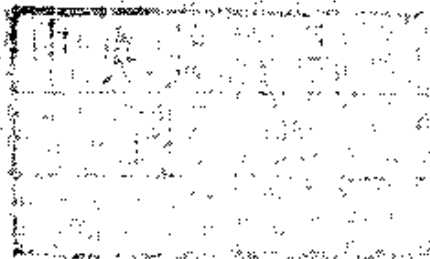
0200153



201004536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张世鹏 殷叙彝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 张世鹏 殷叙彝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全球化论丛)

ISBN 7-80109-281-3

I. 全…

II. ①张… ②殷…

III.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研究—文集

IV. D5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299 号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张世鹏 殷叙彝 编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 册

定 价:15.20 元

前 言

2155/16 关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研究的若干问题

7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方学者对于这个新资本主义的若干新现象、新问题、基本特点、发展趋势多年来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如果说70年代初这些研究还有很大推测成分的话,那么90年代的今天,新资本主义研究则更多地建立在对近十余年积累的大量丰富经验,大量事实所做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作出了许多具有宝贵价值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创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关注。我们历来认为,搞不懂当代资本主义,也就说不清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从来都是以批判现实资本主义为前提条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关于80—90年代新资本主义的研究,强调研究和吸收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90年代中期我在联邦德国进行学术考察的时候,接触并收集了有关新资本主义研究的大量最新资料,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胡文建教授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工作。

2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1996年我与殷叙彝教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王列副研究员合作,共同设计申请了《80—9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并获批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收集翻译了两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代表性学术刊物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作为这一研究课题的中间成果,编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与世界》两本书出版发行。

这些论文发表时间大都在90年代中期以后,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比较多地介绍了西方左派观点,选材集中于全球化问题,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研究的其他重大问题——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危机、社会福利国家危机等也有所涉及。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这些文章,下面简要介绍一些背景材料以及我们的基本观点。

在今天的西方政界、经济界、社会舆论界以及大学讲坛上,全球化是一个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报刊杂志上几乎每周都可以读到论及全球化的文章,书店里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批研究全球化的新书问世。全球化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全球化涉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总体趋势,涉及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前景的观测,是我们研究当代世界无法回避的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西方,关于全球化概念的界定,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塞博士写文章说:“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困难,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肯花气力对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时髦词汇作出界定,或者至少对它的意义作出合理的限定。”巴塞认

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①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博士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目前它几乎成了一种标语口号，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就是在科学著作中，也被理解为各种不同的内容，没有统一的定义。”“困难首先在于这个专业术语描述的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不仅如此，还有人经常把全球化的后果也当成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弗里德里希斯总结说：“全球化的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他把这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概括为三个要点：(1)依赖性的设想。这种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对于所有参与者都产生反作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不仅调控各民族的发展，而且还调控各城市与城市地区的发展。(2)转移的设想。由于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信息传送成本、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跨国公司把它的部分生产部门以及部分服务监督职能机构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信息技术，运输技术越是发展，这种国际网络就越扩大。(3)集中化设想。全球化的势头越猛烈，越是把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转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对于监督控制和协调工作的要求也就越强烈。而这种协调组织工作的任务也就更多地集中到少数几个国家的大城市中，使这些城市发展成为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②

① 卡尔·海因茨·巴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后果》，载于《联邦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

② 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载于《联邦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33—34期合刊。

4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80年代后期,欧洲委员会有关项目负责人里卡多·佩特雷拉教授倡议建立了由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瑞士等国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进行全球化问题研究,1995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在该书的第一章《全球化世界的出现》首先对全球化概念进行了分析研究。里斯本小组的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是一种新现象,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和表现方法,其中一些形式和方法也许会在10至15年内消失或失去作用。民族因素、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变迁都不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没有一种长期有效的、固定的全球化模式,所以今天很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最近15至20年在如此众多领域(金融、通讯交往网络、基础设施、公司企业组织、交通运输业、商业与服务业的流通、人们的消费行为、价值体系、民族国家的作用、人口增长、全球政治等)变化如此之巨大,国际化、跨国化概念对于描述目前发展,测量这些发展的意义已经变得很不合适。新的概念,如全球化的普遍流行绝对不是一种时髦现象,它反映了人们理解目前进程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概念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或者已经失去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是很准确的,把各种各样的概念简单地掺合到一起也不足以接近真理。”里斯本小组的学者提出:“我们的定义以安东尼·迈克格雷夫及其助手的建议为依据,对全球化作如下解释: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一方面,这个概念被解释为席卷这个星球大部分地区

的,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范围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横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这个过程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扩展。它远远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全球化说的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里斯本小组的学者强调:“当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全球化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里斯本小组最后还强调:“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它也不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人们必须对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它所作出的种种限制表示承认和尊重。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①

我们认为里斯本小组的全球化定义还是比较客观,比较完整的。全球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包括客观现实、主观战略,以及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客观现实指的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导致的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商品、货币资本和人员交往方面空前频繁,用流行的话来说,整个地球变小了。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观战略是指西方资本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以及西方政治家推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针。客

^①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1977年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版第48、50、51页。

观现实与这种主观战略相互结合就促成了今天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对于这个发展进程的进展程度目前也存在着激烈争论。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现在全球化的过程已经从根本上完成,他们夸大全球化的发展,声称现在已经到处形成了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民族经济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已经完全失效。另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发展进程不过是恢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就全球贸易而言,仅仅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水平,所以还完全谈不上什么全球化。这种看法被称为全球化的怀疑论。这两种偏激看法已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本书所选文章部分地涉及这场争论。

至于目前全球化所涉及的范畴,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里斯本小组的学者们在《竞争的极限》一书中列举了全球化过程所涉及的范围:“人们可以区分出众多的全球化过程:金融全球化、市场和战略全球化,特别是竞争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和与此相联系的知识、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全球化,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与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与控制机会的全球化,作为一个世界从政治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观察和意识的全球化。”我们认为,在众多的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而资本全球化、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则是全球化的中心。正是跨国公司在80年代推行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推动了世界财政金融体系的结构转换,而各国新保守主义政府推行的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方针政策加速了世界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一种“没有祖国”的、在全球四处流浪的资本。全球性的金融货币和股票交易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赌场,金融货币交易和股票交易远远脱离了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实际经济轨道,走上了独立化畸形发展的道路。而新的金融衍生物的发明和使用

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成分和危机风险成倍升级。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巴林银行的破产、墨西哥金融危机、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以及目前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一再显示出这种全球化的金融投机活动给世界经济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已经引起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政治界、经济界和专家学者的严重关注。西方国家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在继续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方针的同时,避免承担各种经济风险。而左派学者已经提出了严重警告,如果不及时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世界即将再度面临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南北贫富分化、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强烈不满和抗议。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执政的新保守主义政党纷纷下台,几乎到处都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中左势力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多数选民对于新自由主义方针激烈反抗的结果。

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利益的关系问题也是讨论的重点题目,本书相应选录了有关文章。全球化的世界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民族国家的利率主权。面对全球化金融交易巨额利润驱动下和现代金融信息技术掩护下出现的大量资本外逃,民族国家政府一筹莫展,民族国家利用经济政策对于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机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新保守主义政府在80年代大力推行的自由化、私有化、对资本放松控制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控局面。至于这种失控的规模和程度,学者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估计,也存在着争论。此外关于全球化的原因,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对于全球化所持的不同立场,都是讨论的重要题目。限于篇幅,本书没有充分涉及这部分内容。

8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除了全球化问题之外,本书还选编了论及西方劳动社会危机、社会福利国家危机的一些文章。虽然全球化并不是造成上述危机的唯一原因,但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本书选编的论及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分期和阶段划分的基本看法,对于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由张世鹏负责选编,还有一些同志参加了翻译工作,都在译文后署名。殷叙彝同志阅读了全部文章,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本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收入《全球化论丛》。

张世鹏

1998年10月6月

目 录

- 前 言——关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研究的若干问题…… (1)
- 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 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1)
- 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分析…… 约阿吉姆·比朔夫(23)
- 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 …………… 卡尔·海因茨·巴奎(55)
- 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一):全球化,世界范围内
围绕劳动岗位与工资的竞争 …………… 《明镜》杂志记者(71)
- 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二):民族斗争,向社会福
利国家的进攻 …………… 《明镜》杂志记者(87)
-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从民族的国民经济到
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 狄特玛尔·布洛克(100)

2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 乌尔利希·贝克(118)

面临金钱与自然挑战的劳动社会

..... 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133)

团结互助与全球主义 约什卡·费舍(155)

分裂的社会..... 《明镜》杂志记者(163)

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当前的社会危机

及其后果 约阿吉姆·希尔施(178)

后福特主义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

..... 阿兰·利皮茨(208)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 埃伦·米克辛斯·伍德(258)

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

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

一、引言

1997年5月初,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它的工作人员到1998年要从目前的10名增加到50名。^① 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不是工作人员

* 本文发表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33—34期合刊。原文是作者1996年10月7—11日在德累斯顿举行的德国社会学学会第28届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报告经过压缩,以《关于全球化的命题——对于不同空间范围的阐述与设想》的标题收入斯泰凡·赫拉迪尔主编的《分化与一体化,德国社会学学会第28届代表大会论文集》199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第769—782页。本文作者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1938年生,哲学博士,在科隆大学教授社会学并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① 参见《戴姆勒—奔驰在印度开设新的研究中心》,载于《法兰克福汇报》1997年5月5日。

2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的数目,而是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不在德国,却在印度开设这个事实。对于戴姆勒—奔驰公司来说,这个研究中心是通往印度市场的桥梁,较低的工资成本在这里只起了“一种次要作用”。^①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例子。创造科研能力不再在企业总部所在地或所在国家,而是成了改变第三世界某一地区就业人员结构的(另一个)经济刺激。

全球化这个概念,如本文将要说明的,具有多种含义。目前,它几乎成了一种标签,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就是在科学著作中,也被理解为各种不同的内容,没有统一的定义。

困难首先在于这个专业术语描述的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不仅如此,还有人经常把全球化的后果也当成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这在科学上是一种无益的行为。

二、定义与中心设想

我首先要对定义进行研究,全球化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网络联系。它包含着极其不同的具体内容,如下面的引文所证明的。

“我们把全球化的经济理解为在真实时间内,在这个星球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

^① 参见同上,这里应当说明,一名年轻的印度电脑工作人员每年只挣 100 000 卢比,大约相当 6 000 马克。

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赖的经济。”^①

尼格尔·特里福特间接下了一个定义,他把这个概念划分成五个过程:

1)信贷资金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并由此产生金融业对于生产的统治日益加强这一后果。

2)“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日益增长。

3)全球范围内卖主控制市场的局面日益发展。

4)一个跨国经营者阶层的发展。

5)一种跨国经济外交的出现,以及民族国家权力的全球化。^②

各种不同的内容都包含在这种网络联系的范围之内,例如生产场地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重新建立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例如上述戴姆勒—奔驰公司的例子),还有文化在国际范围内适应市场需求。好莱坞新的故事影片预算已经膨胀到1亿美元,但还要加上用于广告和市场营销的5000万美元——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例子。如果没有语言障碍,那么摩洛哥、日本、德国和美国年满8岁的孩子是能够一同谈论他们在星期日早晨电视中观看的同一部日本动画片的。

全球化的过程首先不是别的,而是这种网络化的增长。关键是关于这一过程的设想。它们可以概括成三个要点。

1)依赖性的设想:这第一个最重要的设想认为,这种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对于所有参与者都产生反作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

①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欧洲城市,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经济》,载于《城市研究》1993年第84期第249页。

② 尼格尔·特里福特:《全球化、调控、城市化》,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第336—338页。

4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不仅调控各民族的发展,而且还调控城市和城市地区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制约了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发展。这种区域性的影响甚至被一些作者看作是全球化的核心(并看作是全球化的一种定义特征)。^① 一个国家的发展,例如德国的发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依赖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

国际金融市场的出现这个事实使纽约、东京和伦敦的交易所对于其他国家的交易所起了一种领导作用。

2)转移的设想:服务与监督职能机构的转移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因为与工资差距相比,信息转送的成本更低。对于运输成本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它低于工资差价,部分生产的转移也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转移的范围越来越大,从汽车的部分零件、书籍的排版,直到电脑的程序设计、会计工作。信息技术,还有运输技术越是发展,这种国际网络联系也越扩大。

3)集中化设想:全球化的势头越强烈,就更多地把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上,对于监督控制和协调工作的要求也就越强烈,而这种协调组织任务也就更多地集中到少数几个国家的大城市中,使这些城市发展成为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

不难看出,全球化的命题是针对各种不同的地区或者地域单位的:世界——民族(国家)——城市(其中有作为专门集团的“全球化城市”)——城市地区——家庭——个人。为了理解关

^① 参见埃尔玛尔·阿尔特发特、比尔吉特·曼可普夫:《全球化的界限,世界社会中的经济,生态与政治》1997年明斯特版。詹斯·当沙特:《在德国城市中全球化挑战的区域性问题》,收入伯恩哈德·舍非尔斯、格特里克·威维尔主编的《德国的城市》1996年奥普拉登版第39页及以下几页。

于全球化后果的设想,对于这些地区单位分别进行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些过程中,是否真正涉及一些新的事实情况,对此人们经常很难作出决定性的判断。在仔细的研究分析中,在这件事情上人们也坚持认为,首先是发生了一系列数量上的变化——如生产与服务的转移,向国外投资的重要意义,贸易的国际网络联系等。现在要把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解释为质量上的新事物,因此需要引入一种新概念。

但是事实上,全球化概念所概括的某些内容绝对不是什么新事物。世界范围的贸易联系长久以来就存在,例如英联邦的世界贸易。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工资成本的落差也是几十年以来就存在的。早在关于生产周期论的著作中就有人指出,当一种产品达到成熟阶段的时候,需要的是非熟练技术工人,因为生产已经标准化了,生产场地因此也可以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地方。安·马尔库森在他关于利润周期的理论中正是以更加明确的形式使用了这种论据。^①

三、原因

由于全球化涉及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因此其原因,或者更

^① 安·马尔库森:《利润周期、商品垄断与地区发展》1985年马萨诸塞州剑桥—伦敦版,关于生产周期及其影响参见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城市社会学》1995年奥普拉登版第51—53页。

6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加准确地说,使它产生并推动它发展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证实解释某个事实情况的某种理由。尽管目前的科学研究水平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举出一些原因及其影响。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从卫星信息传送到国际互联网络和内部网络——人们今天可以向任何地方传送信息。在各公司企业之间和一个公司企业内部都可以进行这样一种交往联系,它使人们可以进行控制监督,使得物质传送——例如文件——成为不必要,还可以对于股市行情迅速作出反应,使转移服务变得十分简单,而且还能消除时差。

但是市场的网络联系也要以对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市场在政策上放松控制为先决条件。对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日益密切的国际网络联系来说,有两个政治协定是根本性的:1944年布林顿森林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以后的各次会议。它们使资本能够具有越来越大的流动性。^①

运输成本的降低、工资水平的差距导致生产从高度工业化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这种转移带来一种非工业化的后果,并涉及所有城市,特别是老的工业化城市。重要标志就是在生产企业中就业人员的减少。这个过程逐渐涉及所有行业,从

^① 参见彼得·狄肯:《全球变化,经济活动的国际化》1992年纽约—伦敦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业活动的全球化》,第四小组研究。奥托·帕茨、切米卡斯:《集中化与半导体技术》1992年巴黎版。萨斯吉亚·萨森:《世界市场的大城市》199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参见尼格尔·特里福特:《全球化、调控、城市化》,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第366页。

钟表、纺织品和照相机开始,然后是造船、汽车工业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参见表 1)。目前这个过程也在日益广泛地涉及服务业。

表 1:全球性竞争的变化

年代	条件	受到威胁的国民经济行业
60 年代	劳动密集化	纺织、制鞋、简单的流水线工作
70 年代	资本密集化	汽车、机械、化工生产
80 年代	新技术	娱乐电器、电讯
90 年代	信息	金融服务、媒介、“系统”—公司

资料来源:约翰·斯托普福德、苏珊·斯特兰奇:《竞赛的国家、竞赛的公司,夺取世界市场份额的竞争》1991 年剑桥版第 36 页。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市场扩大,也必须在被辟为新市场的国家中进行生产。这些新的生产基地被看作是一个桥头堡,以便更加接近市场,同时也通过在该国建立生产基地证明公司对于这个市场、以致对于这些消费者感兴趣。本文开头提到的戴姆勒—奔驰公司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随着一个企业的生产基地、原料基地和服务基地被分散到许多国家,对于这些活动进行协调和控制就越来越困难,对于涉及企业的服务需求也就越来越高,而这些服务又越来越难于全部由企业自己完成。这些服务或者从企业中分离出去,或者直接向外部的服务公司去购买。跨国公司生产与生产基地的多样化最终强制性地要求它的组织结构向有利于分散决策的方向发

生变化,如约尔格·弗雷克与盖尔德·辛斯托克所证明的。^①

萨斯吉亚·萨森认为,这种涉及金融与企业机构的服务——而不是涉及生产——对于全球化进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甚至成为“一种新的基础工业”。^② 它们的核心是金融业、保险业和不动产业。“这一类涉及生产的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系列具有混合的营业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有保险业、银行、金融服务、房地产业、法律咨询、经济评估和各种专业团体。”^③

萨森认为,对于国际金融流通和涉及公司企业及生产的服务业进行分析,是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核心所在。埃尔玛尔·阿尔特发特和比尔吉特·曼可普夫^④ 也认为国际金融流通是中心环节,这种流通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来衡量的。如果把这个标准用于德国,就会看到它的地位正在恶化。1995年德国在国外的净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加工企业中,超过了在国内的设备投资。因此专家鉴定委员会确认:“德国的卖方竞争能力越来越多地通

① 约尔格·弗雷克、盖尔德·辛斯托克:《全球化:康采恩的结构与劳动组织的集中》,收入尼尔斯·倍肯巴赫、维尔内·凡·特雷克主编的《社会劳动的突破》1994年格丁根版(《社会福利世界杂志》第9期特刊)第628、634页。

② 萨斯吉亚·萨森:《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关于国际投资与劳动流动的研究》1988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第135页。

③ 同上,第90页。

④ 参见埃尔玛尔·阿尔特发特、比尔吉特·曼可普夫:《全球化的界限,世界社会中的经济、生态与政治》1997年明斯特版。詹斯·当沙特:《在德国城市中全球化挑战的区域性问题》,收入伯恩哈德·舍非尔斯、格特里克·威维尔主编的《德国的城市》1996年奥普拉登版第159页。

过在国外的投资,而不是通过德国出口体现出来。”^① 能否把这个标准当作测量全球化的指示剂,目前在经济界是有争论的。对于第二个标准:与公司企业有关行业中的就业人员,也是如此。萨森看到了这种反对意见,并设法进行反驳。他的论据是:虽然 1985 年这些行业中的就业人员在全体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在东京仅为 4.2%,在纽约为 13.9%,但是这些行业显示出强有力的增长,对于国民社会总生产作出了超出比例的贡献。^②

彼得·狄肯^③ 与他们不同,他强调跨国公司对于全球化过程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它们的投资在世界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市场连接起来。这是通过生产的转移、生产与服务的多样化,通过在许多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的。^④ 狄肯依靠一个图表说明跨国公司的重要作用,这表现在对于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的条件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德国这种类型的企业的一个范例就是西门子股份公司。1996 年它在世界范围内有 379 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在国外有 176 000 名,在 50 多个国家中有 300 多个生产场

① 《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 1996—1997 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鉴定》1997 波恩版第 68 页。

② 萨斯吉亚·萨森:《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关于国际投资与劳动流动的研究》1988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第 12、131 页。

③ 参见彼得·狄肯《全球变化,经济活动的国际化》1992 年纽约—伦敦版第 49 页。

④ 参见《德国公司全球化的五个案例》,收入帕美拉·梅尔主编的《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战略与结构,“未来战略”专家小组研究结果》1996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2 卷。

地。在 942 亿马克的总营业额中 61% 来自国外。^①

与萨森的设想相比,狄肯的设想由于多种原因似乎更有成果,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个进程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根据这些公司的活动,也可以对这种全球的网络联系更好地进行研究。此外,首先以跨国公司为起点,把这种跨国公司看作是使涉及企业的服务业的作用日益增长的原因,从经验来说这也是更容易解释清楚的,不过这两位作者,萨斯吉亚·萨森和彼得·狄肯在一个假定条件上是一致的:对于生产的监督控制和涉及生产的服务依旧保留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一座大城市中。

四、全球性的城市

与全球化概念紧密联系的是全球性城市的概念,特别是萨森,在他发表的若干著作中都涉及这个命题。日益推进的全球化要求对于全世界规模的市场进行监督控制和协调。按照他的观点,进行这种监督控制的机构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即纽约、伦敦和东京。^② 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中^③ 又增加了几个城

① 参见彼得·狄肯《全球变化,经济活动的国际化》1992年纽约—伦敦版第49页。这个图表来自G.K.海莱内尔、R.拉韦涅:《企业内贸易联盟与对美国的工业出口》,载于《牛津经济与统计公报》1979年第41期第307页。

② 萨斯吉亚·萨森:《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关于国际投资与劳动流动的研究》1988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第135页。

③ 参见萨斯吉亚·萨森:《世界经济中的城市》1994年绍森欧克斯版。

市,其中有阿姆斯特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香港、墨西哥城、巴黎、圣保罗、悉尼和苏黎世。这种变化不定的提名表明,对于什么样的城市算作一座全球性城市,迄今为止人们的衡量标准还是很不明朗的。我们姑且引用萨卡尔所作的定义:

“世界性城市是各种全球性监督控制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大型企业和跨国康采恩、交易所和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数据加工和通讯联络中心以及所有支持这些机构的活动,如不断发展的涉及企业的服务业,其中有法律咨询、经济评估、房地产公司、广告与营销业,都以世界城市为其总部地址。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对于全球化经济的监督控制、指挥和管理中心确定为世界性城市的推动力。”^①

如同全球化的概念一样,全球性城市这个概念也不是新的。什么样的城市算作是全球性城市这个问题早在许多旧的著作中已经提出过,只是当时说的是“世界性城市”(这种表述今天在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中还能找到)。彼得·哈尔认为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莱茵—鲁尔、莫斯科、纽约和东京都是世界性的城市。^②在马西·多干和约翰·卡萨尔达的著作中^③把纽约、洛杉矶、伦敦、东京、上海、德里、拉各斯、开罗、墨西哥城和圣保罗都算作超级大城市。很显然,这些城市的选择既要取决于历史条件,又要取决于各位作者或多或少明确提到的标准。关于对于全球性城

① 阿里·萨卡尔:《阿姆斯特丹是“世界性城市”吗?》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第385页。还可参见萨斯吉亚·萨森:《世界经济中的城市》1994年绍森欧克斯版第4页。

② 彼得·哈尔:《世界性城市》1977年伦敦版。

③ 马西·多干、约翰·卡萨尔达主编的《大都会的时代》第2卷:《超级大城市》1988年新贝里公园版。

市如何界定,还有其他一些作者研究了这个问题。^① 他们所下的定义是各不相同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种假设是说,基本的推动力在于,经济越来越强烈地全球化,中心的职能就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全球性城市。”^②

“地域上分散的生产场地、办公机构和原料基地,以及金融行业机构的改组,这些在最近几十年内导致了新形式的管理集中化和新形式的对生产场地与金融市场的一种全球化网络的管理。”^③

因此如萨森^④所说,事实上我们是否真的遇到了一种“新型城市”还是存在疑问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对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城市可以成为全球性城市提出任何假说,也不能确定哪些城市在什么时候可以算是全球性城市。但是,他们关于全球性城市的两点设想还是很重要的:大企业的重要办公基地从空间上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全球性城市中;商业贸易和金融流通的国际联系网络越紧密,涉及企业的服务业越是更多地集中在全球性城市中。由于“监督控制地点”依旧保留在全球性城市中,这些城市监督控制着国际经济活动,因此也对世界商业贸易

① 一般论述见鲁迪格·科夫《对世界性城市假说的批评》,载于《发展与变革》1987年第18期第483—495页;以欧洲城市为例的论述见:约翰·弗里德曼:《世界性城市的假说》,载于《发展与变革》1986年第17期第69—84页。

② 萨斯吉亚·萨森:《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关于国际投资与劳动流动的研究》1988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第5页。

③ 同上,第126页。

④ 同上,第4页。

产生影响。^①

所以全球性城市是在“世界”这一空间层次发生变化的结果。全球性城市对于它们内部(城市 and 市内各区这两个层次)以及其他城市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他城市的经济机会正在减少。

萨森设想的缺陷在于给全球化城市赋予它们一种作为城市根本不可能具有的职能。因为城市本身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因此应对于城市中的行为主体加以确定,显然这里又要涉及跨国公司;监督控制是由国际康采恩进行的,大公司的领导机构所在地是全球性城市。因此上述见解不是针对城市,而是针对作为法人团体的行为主体的。以城市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为一方,大公司企业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用“城市”这个表述,就掩盖了这一冲突,因此这也要求作出更加准确的表述。必须把这种冲突作为对城市发展的分析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全球性城市,因为有充分的感性材料证明,这些企业打算并且能够在与城市相对立的情况下贯彻它们的利益,例如在企业迁移的时候、在扩展占用面积和旧工业地区问题上,或者在纳税方面的种种优惠上。

五、全球化的后果

我们论述一些社会进程,诸如社会不平等、个人主义化或者

① 参见萨斯吉亚·萨森:《世界经济中的城市》1994年绍森欧克斯版第130页及以下几页。

种族隔离,经常是因为这些过程的影响对相应命题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意义。在这里也是一样。全球化的后果决定着目前这场辩论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这是一个被人们看作不可逆转的、日益猛烈的进程,因此其后果更加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由于它引起了某些忧虑。

关于全球化后果的设想非常之多,而且多种多样。它涉及所有地区层次,并且把它们连接起来。我现在按照这个顺序对几个最重要的设想进行描述。

跨国公司。大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由于它们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地区范围的扩展今后将处于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与此相关的还有对于地方企业的接收和接管,这将使后者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加强。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企业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大大提高,这使得企业对于股票市场波动和股东利益产生更大的依赖性。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出现了一个国际金融市场,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于生产的兴趣,它所关心的是以钱生钱。阿尔特发特和曼可普夫也说过,财政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与此同时还极其强大,作为证明他们指出,在世界的全部资本流通运动中用于世界贸易的只占1%。^①

因此企业陷入压力之下,他们不总是关心保持劳动岗位和维持与地方的联系(例如拜耳公司与莱沃库森市的联系)以及长

^① 参见埃尔玛尔·阿尔特发特、比尔吉特·曼可普夫:《全球化的极限,世界社会中的经济、生态与政治》,1997年明斯特版。詹斯·当沙特:《在德国城市中全球化挑战的区域性问题》,收入伯恩哈德·舍非尔斯、格特里克·威维尔主编的《德国的城市》1996年奥普拉登版第159页。

期稳定,而是更多地关心短期赢利,交易所牌价和股东利益(股息),简言之:关心季度结算,关心股东的价值,即股东的资产值。

各国政府。世界范围的竞争反过来也对各国政府产生影响,也对跨国公司发生反作用,正如表1所表现的那样。“我们进入了企业与政府在一个世界舞台上相互谈判,并且政府彼此之间、企业彼此之间相互谈判的时代。”^①人们通常把这类后果称之为“放松控制”。这被理解为削减关税或取消进口配额之类的减少贸易障碍、统一贸易条件的努力,例如提交世界贸易组织(WTO)仲裁的各国之间的诉讼:如1996年美国控诉日本限制照相机和胶片产品的进口,欧共体控诉南韩对电讯产业部门的调控。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企业联合组织(作为跨国公司的组织)和工会都处于使就业条件适应竞争的压力之下。劳动条件灵活化了,这在德国引起关于劳动时间、工资和薪金、解雇通知期限、患病期间工资继续支付等问题的长期讨论。

与此同时,50、60、70年代关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规定也陷入了被动境地。结果是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都在减少,或者不得不减少。^②这导致跨国公司对国家提出自相矛盾的要求。国家一方面应该通过贸易协定拆除还存在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又应该对处于困境的本国工业或者企业(例

① 尼格尔·特里福特:《全球化、调控、城市化》,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第368页。

② 参见埃尔玛尔·阿尔特发特、比尔吉特·曼可普夫:《全球化的极限,世界社会中的经济、生态与政治》,1997年明斯特版。詹斯·当沙特:《在德国城市中全球化挑战的区域性问题》,收入伯恩哈德·舍非尔斯、格特里克·威维尔主编的《德国的城市》1996年奥普拉登版第50页及以下几页、459页及以下几页。

如矿山等)保证提供补贴,对于劳资协议伙伴施加影响,以便实行最低工资(如1996年在建筑业中实行的)。

就业结构与收入结构。全球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就业人员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收入变化。

“目前的调查表明,收入很高的专业与技术人员的劳动岗位在增加,中等收入的工人与职员劳动岗位在减少,低工资的劳动岗位大幅度增加。低工资劳动岗位的增加大部分是增长中的产业部门发挥作用的结果,衰落工业只起次要作用,后者为了维持生存需要廉价劳动力。”^①

这个后果用流行的概念描述就是一种“两极分化”。^② 日益大量需要的是那些拥有极高的熟练技术(大学毕业)的人,或者是技术水平极低的人。萨森设想,前一个集团的生活风格促进了后一个集团的劳务:“制作名菜名点和美味佳肴,生产各种装饰品,缝制奢侈性高档服装和其他消费性商品,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如清洗、修理、信差服务等。”^③

这种劳务部分地是由影子经济完成的,而外籍劳动移民大

① 参见埃尔玛尔·冯·尔特发特、比尔吉特·曼可普夫:《全球化的极限,世界社会中的经济、生态与政治》,1997年明斯特版。詹斯·当沙特:《在德国城市中全球化挑战的区域性问题》,收入伯恩哈德·舍非尔斯、格特里克·威维尔主编的《德国的城市》1996年奥普拉登版第22页。

② 参见曼纽尔·卡斯特尔斯:《欧洲城市,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经济》,《城市研究》1993年第84期第254页,详细讨论情况参见约翰·奥隆林、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主编的《后工业大都市中的社会两极分化》1996年柏林—纽约版。

③ 参见萨斯吉亚·萨森:《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关于国际投资与劳动流动的研究》1988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第158页。

批参加了这种影子经济。但与此同时人们在德国还可以看到，部分影子经济和非正式产业部门的劳动已经进入了正式的劳动市场。就像在美国一样出现了一种种族性企业和种族性劳动市场。

与这种发展相联系的是失业率的不断增高(失业者比例的增加)。一种细致区分的研究表明青年失业率和长期失业者(失业在两个月以上)的比例正在增长。其中包括那些自身的熟练技术(如原来生产企业的熟练技术)不再为市场所需要的失业者。人们通过城市比较可以确定,这种结构性失业即使在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也只是稍有减少。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降低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在个别城市中,例如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慕尼黑,可以看到这种两极分化趋势的影响,而对于鲁尔地区的城市来说,从发展趋势上看也是如此。在这些城市中虽然创造了新的劳动岗位,但无论是失业者还是救济金领取者的人数都没有下降。

另一种设想认为,这种变化了的就业条件导致一种收入的两极分化。严格地说,这是一种U字型的收入分配,中等收入者集团人数不断减少。与此相反,克里斯特·哈姆内特在他的论文中对这一设想进行了严密检验,他得出结论说,这种两极分化既没有在伦敦,也没有在阿姆斯特丹发生。不如说发生了一种专业化。此外人们还必须对于职业的两极分化和收入的两极分化进行区分,^①很可能我们涉及的是一种收入的两极分化。

^① 参见克里斯·哈姆内特:《伦敦的社会经济变化,专业化而不是两极分化》,载于《创造环境》1994年第20期第192—203页。还可参见他写的《全球性城市中的社会分化,理论与证据》,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第401—424页。

城市。关于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人们提出了大量的设想。准确地说,首先使城市陷入危机的是前面所描述的劳动岗位的转移,以及刚才描述的就业结构中的变化。在70和80年代只是老工业地区的城市——例如鲁尔地区的城市、萨尔布吕肯,还有不来梅和汉堡——受到冲击,而目前所有的德国城市都处于一种强大的适应压力之下。征税收入下降,由于社会救济和经常要用10%以上的预算款项清偿债务、支付利息而使政府的负担加重,在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投资减少、城市服务业的私有化、城市公有企业的出售,都是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

收入的两极分化对于私人家庭也产生了影响,使本来就不平等的获得居住空间的机会进一步发生分化(与此同时,涉及企业的服务业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性大城市中导致这些城市中地价上涨。因此在全球性城市中可以看到土地价格和居住空间、生产空间的租金超乎寻常地上涨)。

由失业率不断上涨、收入不平等加剧(或者甚至是收入的两极分化)、贫困加剧而引起的下一步后果在专业著作中^①是这样假定的:

1. 低收入集团被排挤出接近市内的居住地区(城区的上层化)。
2. 社会的和种族的隔离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居住区进行不平等的分配。
3. 城市贫民区的数量增加。

^① 参见苏珊·费恩斯垣、米歇尔·哈洛主编的《城市的分化》1992年牛津—剑桥版。哈尔特穆特·豪斯曼、瓦尔特·西贝尔:《新城市化》1987年美国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3页及以下几页。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1990年伦敦—纽约版。

德国与国际研究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表明,这个过程不仅在纽约和伦敦,而且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出现。^①

六、总结与结论

全球化概念和与此相联系的设想是一个有益的科学开端,它使人们把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和经济地理学的分析结合起来——至少要迫使人们进行一种综合。迄今已有的研究只是部分地满足这项要求,而且也还说不上是一种已经得到系统发展的理论。

首先,哪些事实情况确实是新的,为此需要一种与迄今为止解释非工业化或者城市衰落原因的理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理

① 关于纽约与伦敦可参见约翰·莫伦科普夫、曼努艾尔·卡斯特尔主编的《二元的城市,纽约的改建》1992年纽约版。关于其他城市,如鲁尔地区,可参见曼纽尔·卡斯特尔斯:《欧洲城市,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经济》,载于《城市研究》1993年第84期第254页,详细讨论情况参见约翰·奥隆林、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主编的《后工业大都市中的社会两极分化》1996年柏林—纽约版。关于上层化可参见詹斯·当沙特、于尔格·布拉西乌斯主编的《上层化,城市内居民区的升值》1990年美国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罗伯特·凯克斯主编的《上层化,理论与研究成果》1996年奥普拉登版。

论,这些都还是很不明朗的。^① 进一步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大城市能够变成一个全球性城市,这也是很不明确的。是由于四通八达这个条件吗?但是由于电讯网络的建立,这已是几乎到处都已实现的了。是由于一种满足定义规定数量的涉及公司的服务性企业和交易所而形成一种凝聚优势吗?是由于现在已有很一大批大型企业——或者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设在这里吗?

全球性城市中企业和涉及企业的服务业(例如企业的业务状况分析人员)应实行一种什么样的监督控制?如何对此进行衡量?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确定。纽约或伦敦交易所股票行情的变化能够使非全球性城市,例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或者苏黎世交易所的股市发生相应变化吗?另外,人们对于下面这个问题也还没有作出答案,即在纽约或东京的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是否会对于杜伊斯堡、列日或者米兰等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人们在学术著作中正在对以下问题进行争论,即金融市场是否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跨国公司是否能够如此彻底地摆脱民族国家的条件,即它们一方面对于各国政府的行为施加强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能使自己摆脱国家的调控?^② 有人对于这个命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全球化过程对于一个国家的城市的影响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条件,其中包括国家

① 参见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西德大城市及其发展模式的一种分类学,1970—1990年》,收入作者主编的《90年代的城市》1997年奥普拉登版。

② 参见保尔·希尔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在争论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的管理》1996年剑桥版第7页。

对于劳动力市场、住宅市场以及税收体系、教育体系的干预。根据他们的看法,国家干预措施可以缓解“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两极分化影响,如荷兰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①

相反,人们对于这一点毫无争议,即全球化过程将继续进行。在这一条件下劳动岗位很可能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转移出去。全球化的作用在于它使得各个时期最低的工资成本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特别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因为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工资较低、劳动时间较长,而德国却在缩短每周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在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条件下,企业恐怕不会(也不能)再有任何社会的与政治的顾虑,而会坚决地转移劳动岗位,只要能保证生产质量。因此人们估计这个过程——劳动岗位转移出德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断定,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大企业的业务报告将表明,利润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就业人数却在下降。

只有当人们愿意按照低于他们熟练技术资格的条件,为了低工资和经常是有期限的劳动契约从事劳动的时候,就像美国那样,经济增长才能重新与减少失业联系起来。这迫使有关的个人在两种不利的、因而同时都要使自己遭受损失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失业还是从事较低工资——与自己最近的就业条件相比——的劳动。

在全球化条件下把企业资源分布到各个不同国家可能是很有道理的(准确地说是有效的)。但是它要求付出其他的代价(负面的外在效应)。这种代价从社会方面必须以失业救济金、

^① 参见弗兰斯·狄勒曼、克里斯·哈姆内特:《全球化、调控与城市系统》,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

再教育培训措施和劳动就业纲领的形式,从市政当局方面必须以提高社会救济开支的形式,从个人方面必须以大大减少行动选择权和忍受心理痛苦的形式加以承受或补偿。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越来越陷入互相矛盾之中。这种情况自 90 年代初以来在所有高度工业化国家中都能看到。而且跨国的经济利益与民族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间也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在这种负担——分配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各个居民集团之间的团结互助很可能要被削弱。而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摆脱这种两难处境的出路。

(张世鹏 译)

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分析*

约阿吉姆·比朔夫

国际结算银行最近所进行的调查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证实了在国际范围活动的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加速积累。1995年4月除去重复记数,每个贸易日的交易额为12300亿美元,这里还不包括货币期货与期权合同。这个数额大概相当于17220亿马克,或者说相当于1993年美国全部国内生产产值的五分之一。而交易所的活跃则已预示出,实际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发展将使彼此间的差距越拉越大。1989年4月交易所平均日营业额5900亿美元,1992年4月已达8200亿美元。关于这个数字,必须要考虑到,在90年代美元与日元、德国马克及其他重要货币相比在相对贬值。如果以美元不变价格计算,那么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0%,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范围内实际国内生产产值的相应变化明显低于3%。金融有价债券在交易所每天都在成倍上翻。不能无条件地根据交易活动对相应积累

*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杂志1996年第1期增刊。作者约阿吉姆·比朔夫任德国左翼杂志《社会主义》编辑。

总额作出结论,也是众所周知的^①。但是金融产业部门中日益增长的财产所有权和占有权所要求的数额已经预示了这种与实际经济发展的距离日益拉大的趋势。据世界银行计算,1993年全世界社会生产产值为231000亿美元,年底尚未结算的世界范围内有价证券交易额估计超过600000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资本方面有权要求占有的财富数量相当于平均每年社会劳动生产产值的3倍。这种加速的货币资本积累导致所有权和占有权明显超越了现实经济过程的年度成果。

除了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加速积累之外,另一点也很值得注意。最主要的金融市场始终在英国,伦敦占30%的交易额。美国的有价证券交易所占16%,居第二位。接着是日本、新加坡、香港,然后才是瑞士和在世界外汇交易中占5%的联邦德国。在金融交易中美元所占比例为83%(1995年),居遥遥领先的首位,其次是德国马克,占37%的市场份额,日元占24%(由于重复计算,这些比例总和超过100%)。我们碰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在货币期货、期权交易中,英镑的排名地位也很差。虽然如此,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伦敦的金融地位还是无可争议地端居首位。

我们所提的问题是,国际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如此大规模地增长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有价证券的跨国金融交易达到如此令人无法设想的庞大数量等级?然而在这里为直接投资和商品

① 马克思在分析金融资本时就已经说过:“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3—534页。

交易筹集资金所占比例仅在 5% 至 7% 之间。在以后年代里,这种积累速度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它与创造价值的实际经济过程之间是否还存在一种调节中介关系?

跨国公司——新的世界大国

日夜不停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交易所和外汇交易所达到如此庞大的交易总额,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关系全球化这个命题的形成与传播。久负盛名的英国巴林银行由于新加坡交易所一连串错误投机而彻底破产,从而被一家竞争者收购。外汇市场的排名次序把新加坡与香港排在日内瓦与法兰克福的前面。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关于世界市场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质量变化的看法。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被说成是现代资本主义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各大洲、各民族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然而,关于如何理解这种发展,人们还很不清楚。

一种广泛流传的假说认为:工业和服务产业部门的跨国国际化自 80 年初以来已经达到一种新的质量。^①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① 在大量关于全球化这一命题的著作中,除本文下面要提到的以外,还可参见 W. D. 纳尔、A. 舒伯特:《世界经济》1994 年法兰克福版,载于《梅诺论坛》不来梅 1995 年 9 月第 23 期。

第一,庞大的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资本公司在经济实力方面已达到一种新的规模,已经能够把现代工艺技术同各国经济基地的最有利的成本结构结合起来,使这些生产基地彼此竞争,这就会使资本增殖条件在创造价值链条的所有环节上,无论是在获得预先支付方面还是在商品销售方面都得到巨大改善。

第二,由于这种国际化,民族资本范围内的平衡运动不断丧失效力。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已被冲破,民族国家的调控职能已被削弱。

第三,在80年代,跨国康采恩的活跃导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转换。“这些公司推行一种以世界范围为基地的经营政策,把它的生产越来越多地迁移到主要销售国家或最重要的原料产地。所以,与以前居主导地位的出口拨款相比,投资拨款现在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些跨国公司希望它们的银行在世界所有重要国家内向它们提供一种尽可能广泛的服务。”^①

这些论证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命题:在80年代期间,这些跨国公司企业触发了世界经济的一种结构转变,接着金融资本与货币资本也发生了一种形式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四处流动”的金融资本不过是全球化最为明显的表现。“这些跨国企业和银行由于失去政治控制,由于技术和金钱漫无边界地迅速流动,从而能够随时转移它们的生产。与资本相反,受着地域约束的雇员和国家则日益失去影响,并且日益依赖于资本的自主决策。失去国籍的跨国康采恩似乎成为本身日益独立

^① H.E.比什根:《1957年至目前的德意志银行》,载于《1870至1995年的德意志银行》1995年慕尼黑版。

的、推动全球经济的主体,雇员和国家则变成客体。”^①

关于这些全球运动明星不断独立自由化的命题使人得出的下一步结论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性。“把这种发展归咎于经理人员或企业主个人是不恰当的。决策不再由企业主自由做出,而是要服从于全球化的经济,与昔日在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中的境遇相比,企业的利益要由匿名的巨大经济强制力量所造成的压力来决定。”^②从如此解释的世界经济结构转换中所得出的经济政策结论被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狄特·舒尔特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句话:“适应还是衰亡”。这意味着全球化把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卷入了一场竞争,那些能够顺利地适应变化后的条件,使整个民族国家的创造价值过程经受减肥疗法和保健疗法的民族就能确保竞争的优势地位。“因为我们无法使自己摆脱世界经济的竞争,所以我们必须为在这场竞争中能否保住以德国为生产场所的企业而操心。否则的话,其结果就是大量劳动岗位丧失和贫困化。”^③

在这样一种霸权解释模式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部分政治科学目前都在为现代民族国家在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主权的丧失而伤透脑筋。^④

① 发展与和平基金会:《1996年全球发展趋势》1995年法兰克福版第19页。

② 同上。

③ F.沙尔普夫:《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社会民主党政策》,未公开发表手稿,1994年6月,第10页。

④ 参见F.沙尔普夫:《20世纪终结时国家的行动能力》,载于《政治季刊》1994年第4期。J.希尔施:《民族竞争国家》1995年法兰克福版,H.J.比林、F.德佩、B.耶索普:《欧洲一体化与政治调节》1995年马堡版。

全球化 = 世界中心区域的紧密网络化

有人对这种流行的“全球化”观点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对市场的紧密依赖关系中进行的,全球性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① 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本属于资本主义概念题中之义。而眼下所要确定的是 80 年代初开始的新发展趋势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首先需要指出,“全球化”概念可能会招致一种错误的联想。回顾最近 10 年的情况表明,生产和商贸正强烈地集中于北美—西欧—东南亚(日本与正在崛起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地区——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最后还有中国)的三角范围之内。以美元为基础计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到 90 年代初已扩大到 80%。而它的反面就是世界经济的一系列地区——首先是非洲,沦入可怕的边缘化。

直接投资的现有数额和新的投资注入反映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巨大优势地位。“1993 年底,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总额的 76% 集中于工业国家,只有 23% 投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国家内部直接投资的 90% 以上投在西欧—北美—日本这三角地区内”^②,这些投资所有者可以在区域上明确划出界线,

^① J. 希尔施:《民族竞争国家》,参见同上,第 103 页。

^② 《1996 年全球发展趋势》第 160 页。

80%以上的直接投资属于把营业总部和居住地点安放在七国集团国家中的企业、银行和私人。总之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排他性圈子之内。

对于90年代初以来直接投资分配模式的某些轻微修正并不能使人宣告发展趋势的转折。第一,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直接投资的轻微下降是衰退的反应,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稍有上升也还有一种地域重点。1993年有大约4/5的投给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是注入不到10个南方国家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东南亚地区。至1992年底联邦德国的直接投资大多投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累计占投资的86%,居第一位。原东方集团国家作为资本投入地区日益使人感兴趣。但是至90年代中期每年投资额仍明显低于德国全部境外投资的10%。^① 资本转移到捷克或匈牙利的个别事例在政治和社会讨论中经常被说成是普遍的,从而歪曲了实际情况:

“对于私人资本转移总量的乐观估计主要是由于那里拥有廉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地域上与西方市场相距不远,而且,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预计将会有有一个巨大的增长。人们对以往5年来的改革政策进行总结,情况表明,直接投资总额远远落后于人们的期望。而且在1993年注入资本大约40亿美元以后,有数字表明,1994年对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15%,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外国投资的数额却在增长,除了一些大型投资以外,这些向东欧的资本注入都是在较低的水平上运动。”^②

① 《德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载于《信息快报》1993年第23期第18页。

② 《对东欧的金融划汇与财政援助》,参见《信息快讯》1995年第31期。

1970 年和 1993 年各地区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

	1970 年		1993 年	
	10 亿美元	%	10 亿美元	%
世界	2802	100.0	23113	100.0
工业国家 [*]	2803	74.3	18312	79.0
美国	1012	36.1	6260	27.1
日本	204	7.3	4214	18.2
西德	184	6.6	1911	8.3
法国	142	5.1	1252	5.4
英国	106	3.8	819	3.5
发展中国家 ^{**}			4865	21.0
拉丁美洲	166	5.9	1406	6.1
东亚/太平洋地区	159	5.7	1285	5.6
南亚	74	2.6	316	1.4
欧洲/中亚 ^{***}			1094	4.7
撒哈拉次大陆/非洲	57	2.0	269	1.2

注：* 高收入国家。

**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希腊、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恩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原苏联各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1992 年以后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土耳其、匈牙利。

总而言之,“对于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全球化过程并不是所有地区在同样程度上都进行了参与,参与者主要是一些区域性的集团,如上面所说的三角地带”。^① 因此,与其说全球化是指由于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质的变化而把所有地区都纳入市场和市场发展,不如说,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空间的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结。绝对不会由于全球化而使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使前者居于主导优势的世界经济结构瓦解。相反,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优势地位加强了。因此全球化是反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结构变化的一种现象。

在创造价值和商品贸易这个层次上,全球化还可以说是指主要国家和它们的区域影响范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广泛边缘地带加重负担。纳尔和舒伯特非常正确地判断说:“不平衡、不平等的生产——这就是跨国化过程的社会核心。这种全球性的断裂绝对不是世界经济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就能够加以克服的偶然事件。与全球生产过程和金融资金筹措过程的跨国统一相对立的是被全球化排挤出局者的极端悲惨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就是使人群、企业和国家在它的范围内根据在本质方面完全不同的起点条件彼此竞争。这些竞争者不可避免地要分化为胜利者与失败者、受欢迎者与被驱逐者、受优待者与受歧视者。除了利润与实力的标准,没有其他社会价值可以用来检验这种竞争的效率。”^②

① 《1996 年全球发展趋势》第 160 页。

② 纳尔、舒伯特:《世界经济》第 43 页。

麦当劳是榜样吗？——全球市场与地方市场

关于作为世界经济结构转换的社会核心的不平等生产的论点是与声称跨国公司具有世界范围的决定权的论点相矛盾的。纳尔与舒伯特声称：“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不再有任何空白点。那些不想适应这种发展的全球化特点而想另搞一套、摆脱全球化的权力控制的经济领域正在消失。任何人、任何强大的国家和社会都无法从这种全球化关系中摆脱出来。”^① 一种“世界市场的客观强制”^② 是无可争辩地存在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需要使一系列地区失去利用价值，成为空白点。麦金西公司的企业顾问大前健一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中心领域的“互联经济”时更加精确地描述了这种变化：“一种新的统一正在出现，这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家与那些年轻的、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国民经济，如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经济。”^③

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互联经济是通过许多人规模的、多数是以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企业的紧张竞争而产生的。但是在这里需要提醒人们，对于纳尔和舒伯特所谈论的全球化

① 同上。

② E. 阿尔特法特：《世界市场的客观强制》1978年汉堡版。

③ 大前健一：《世界经济的新逻辑》1992年法兰克福版第13页。还可参见R. B. 莱西：《新世界经济》1993年法兰克福版。

的决定权力,不要产生会引起一系列后果的误解。他们写道:“时装、电子娱乐玩具,以至信息需求和新技术的全球化——在所有各种各样的世界博览会、流行趋势展示会、汽车俱乐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都可以看到消费者入迷地欣赏各种新的流行款式。他们在那里确定自己的行为模式、幻想和需求的取向。全球化是一种决定权。是的,它是具有最广大影响的决定权,从衣阿华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从肯尼亚到法国,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每一个角落都处于它的影响范围之内。”^① 在席卷世界的信息与通讯革命时代,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消费模式日益趋同,这种现象肯定也被人们正确地观察到了。自然,也就有了“全球性商品”,它出现在几乎所有食品、饮料及消费领域。但是,这还不是说跨国公司拥有了垄断市场的权力。作为跨国公司经营政策的一种结果而广泛形成的消费模式全球化这个论点事实上早已过时了。在消费商品市场和生产性商品市场上,跨国公司还需面对一种不可忽视的顾客权利。主要的公司必须以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跨国经营为方向。但这不是说,他们能够为了这个互联经济空间而实行一种跨国的产品政策和模式规范政策,或者一种通用的商品哲学。日本索尼康采恩的创始人为了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的互联经济空间内成功地推行国际化战略,制定了“全球的区域化”公式。因为在跨国境膨胀发展的时候,企业必须在关键性市场上集中争取顾客。“在对这些市场进行研究的时候,共同性与差异性对于这个战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只有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公司企业才能实现‘全球的区域化’这个目标,这也就是说,既要完全像一个区域性商品提供者那样作为知情人而行动,同时又享受着世界范围内经营活动的

^① 纳尔、舒伯特:《世界经济》第21页。

好处。”^①

我认为,由于持续出现一种结构上过分积累的局面,国际竞争中的下述基本特点就更加突出,即正在发挥作用的资本努力把它的供给投向市场,但市场的限制也日益收紧。所有资本主义中心区域都是如此。因为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在生产资料、生产性商品和消费性商品领域,本国民族市场长期以来已受到限制。由于这些市场不能按必须的规模扩大,日益激化的破纪录的竞争斗争就使资本闲置和贬值。在承认人们的取向模式和消费模式日益趋同的同时,还需要确认的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特殊性绝对没有消失。

大规模生产的灵活性通过一种多变的自动化技术、新的组织技术和控制技术得以实现,因此得以对创造价值过程进行一种跨企业的重新改组。夸张地说,不是人的劳动力——无论是通过各种新形式和新类型的技术熟练化也好,还是在新的劳动组织结构(小组劳动)范围内也好——而是系统技术构成了新的合理化方案的飞跃起点。基础是交通系统、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中的一种技术工艺变革,通过这种变革,能够力求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减肥,使产品个性化,并使分布在各大洲和经济地区的生产基地、推销基地和后勤基地更加密切地相互衔接。^②

我认为,从“区域性全球化”这个命题中可以推导出5个结论。

1)实际资本的增殖结构始终是通过平均利润的平衡过程而形成的。资本被转移到国外是因为在那里经营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然而民族资本内在联系中的平衡过程的条件并没有因

^① 引自大前健一:《世界经济的新逻辑》第27页。

^② 参见约·比朔夫:《复旧还是现代化?》1995年汉堡版。

此失去效力。实际资本领域的投资决策要受到利润率和利息率参数、价格上涨比例(也就是货币稳定性)、销售预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2)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实际资本的国际化是由扩大市场的必要性决定的。由于用预先支付方式购买原材料时可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以及在销售市场扩大时实行更加理想的成本经济,进一步推进了实际资本的内部紧密衔接,因而原则上创造了在某些经济空间把经济调控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可能性。欧洲联盟的经济联盟和货币联盟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把经济和政治领域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族国家的调控关系(民族资本)转移到一个跨国经济空间中去。然而,迄今为止,这个新的经济空间的萌芽正不断受到限制;在资本与劳动不断流动的时候,首先必须借助一种统一的货币和相应的银行体系才能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应收入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统一的跨国的价值创造关系。

3)跨国康采恩毫无疑问是世界经济结构转换的推动力,但这不是说它具有囊括世界的“全球”意义,而是把它看作促进互联经济的推动力。作为这样一种推动力,它们总是同时受到民族国家调节关系和相应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的制约。不存在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资本。

4)资本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开拓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不能取消金融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民族属性。例如,没有各种具有相应平衡空间和调节空间的民族资本的实际存在,现代金融衍生物的流通过程就会令人无法理解。这种或那种革新仅仅是辅助手段,借以减少在向各种价值调节关系过渡时的价值损失。

5)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域生产国际化之后,信贷资本和货币资本面临的任務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生产企业导致世界经济

的结构变化以前,金融资本早已开始了国际化。

总而言之,这个命题就是说,大企业对于灵活的汇率和已经改变的筹资条件作出反应,改变了经营政策。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使得产品在灵活的自动化的情况下实现个性化。把经济重心更多地放在不变资本(固定成本)的使用上,迫使大企业突破本国市场的边界。由于国际化,也就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的紧密连接,一个行业的各个主要商品提供者就变成直接的竞争对手。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提出了一个颇为可笑的问题。他声称,劳动力供给的国际化是标志全球化提高到新的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化通过资本与劳动跨越国境流动性的增长而使劳动力的提供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同时又使金融部门拒绝被当作民族国家的基础设施使用。由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国际化和由此造成的组织松动,全球化取消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间能够通过协议实现的任何协调工作,并以世界范围内资本市场对劳动市场的等级统治取而代之。”^① 在这里把原因和结果完全搅乱了。劳动的流动性一方面是由于南部国家不断脱离北美—西欧—日本三角地带财富发展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而不是全球化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市场放松控制的结果,而这个劳动力市场依旧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为国内市场。

至于工会如何评价世界经济的结构转变,最近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作了具体论证:“从工会的尺度来看,全球

^①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德国资本主义——它还能再活下去吗?》,收入《五金工业工会、利益代表、组织发展和社会改革》199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化不仅是一种风险,也还是一种机遇。”^① 至少他们希望,从这一方面可以获得大量证据,证明国际工会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在实践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这涉及国际的和欧洲的工会组织,还有具体的团结互助精神,如目前法国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样。

国际金融市场

当人们谈论“全球化”的时候,至少首先涉及的不是现实经济范畴,如生产基地辩论中各种建议所具体涉及的那样。全球化涉及的中心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的渗透也导致了金融领域的变化;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某种确定结构相联系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及其他世界银行机构是以几十年来美国霸权统治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原因还是从政治原因出发,都必须取消美元与黄金的紧密联系。货币资本现在通过发展新的金融中心,对原有以美元为轴心和支撑点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作出反应。它一方面冲破了原有的调节框架,另一方面它的增殖活动依旧总是在各种不同的民族资本的框架中进行。今天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没有国籍的国际金融产业部门和彼此相互竞争的民族金融体系之间存在一种二元结构。

在国际协议的框架范围内削弱和调节关税限制的政策和以

^① 克劳斯·维茨克尔:《市场全球化和工会利益代表》,载于《工会月刊》1995年第10期第599页。

黄金—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支撑着战后最初 20 年各国经济的膨胀。货币可兑换性的扩大和资本流通的逐步自由化是这种确实成功的发展阶段的表现。实际资本与金融资本逐步拉开距离的剪刀型的发展趋势早在 50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在以黄金—美元的交换比例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总崩溃以后进一步加快了速度。^①

1963 年欧洲美元市场的开放在布雷顿森林金融货币体系的摧毁中是一次重大转折。欧洲货币市场出现那一年,发行 6 种债券总值约 7500 万美元。1995 年中期这个最大的国际货币市场的总量估计约为 100000 亿美元,其中贷款和短期有价证券大约有 75000 亿美元,处于运转流通中的可兑换资本债券估计有 16870 亿美元。

在其他地区也开始仿效这个无国家控制的金融市场的成功药方。可以夸张地说,国际金融体系已分裂为一方面是一部分非国家的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互联经济。生息资本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特异功能,无论如何它要指靠重新返回各个民族资本的总体经济增殖关系中。它换上了民族服装,参与了各种社会盈余过程,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是短期的。随着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实际上一种货币和货币市场的放任主义已经开始了。在这里,非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世界经济的新成分对民族国家的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日益施加要求放松控制的压力。金融市场的分裂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决定性内容。京特·赖曼非常正确地表述道:“这个独立于民族国家的、没有祖国的、四处流浪的金融资本与受到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本相分离,但是,任何资本投放都不会在一个无人的真空地

^① 斯托克:《欧洲市场》1995 年斯图加特版。

带实现。”^①

对于与金融资本的分裂相联系的投机的指责显然是容易被误解的。大部分有价证券并不与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实际资本相对应,这种实际资本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机器、商品和初级产品之中。只要涉及债券,这一情况就很明显:所借的货币总额早已被支付出去,并且仅仅被描述为一种对于未来社会财富的占有资格要求,所有这些证券和债券都是可进行交易的,也就是说,它经历了一种与原来资本价值或所借资本总额不相依赖的价格运动。“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实现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② 证券和债券的总额越大,被卷入的国家、机构(实际资本、社会保险机构、国有企业、各种团体)越多,对于价值增殖的推测就越公开,投机成分也就越大。因为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银行机构已不再能保障各民族资本之间稳定的兑换比例,大规模的、日益加速的资本流动性转变为周期越来越短的价格运动,因此市场为了确保避免在各国货币和货币使用方面发生变化时所出现的汇兑风险和交易风险,发明了新的流通手段(金融衍生物),借此实践一种汇率保障,但同时又使投机成分上升到更高的台阶。

虽然如此,这样一种看法还是错误的,即在近几十年加快速度的资本积累背后主要隐藏着一种独立的投机现象。相反,与生

① 《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收入京特·赖曼编的《过渡中间趋势》1994年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6页。在这里还可以参考他的论文《论金融资本的未来》,在京特·赖曼的另一本书《强权者的软弱》(1993年莱比锡版)中详细论述了他的立场。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0页。

息资本的所有手段和流通形式一样,金融衍生物起到了使社会流通成本经济化的作用。但是由于市场调节占支配地位,因此金融资本的所有价格变动都同时受到由景气变化或危机形式的运动所引起的贬值过程的影响。若是积累的证券总是如肥皂泡沫一样破灭,各民族国家恐怕真的要穷得身无分文了。当然还是存在一种危险,这种有价证券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导致社会流通过程的阻塞,这最后可能意味着流通与生产的真正停滞。

货币资本的国际贸易场所并不服从交易所的行情预测,也不服从民族国家的调节。各种债券的发行无须任何主管单位批准。这种契约允许各种调节规定,前提条件是市场的参与者也参与决定。由于一个中央银行进行的监督也取消了,因此也不存在关于最低储备金的法律规定,这就会表现为很高的利润率。最后,享有治外法权的金融市场不受任何控制。这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这里交易的金融证券的价值实现总是要来源于现实经济空间,而这个空间总归还是要服从于民族资本的经济平衡过程。

这种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存在因此越来越成为主张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减少调控、大幅度削减各种税率的决定性论据。资本不断地涌入这种自由化的金融场所。与70年代那种过分兴奋的期望相反,向灵活的汇率过渡既未能有利于造成一种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也没有扩大经济政策活动范围。相反,由于资本流入具有魅力的金融市场,世界经济被进一步削弱,它的基础变得更加脆弱。这个国际的、非国家结构化的金融市场在金融领域施加压力,要求废除所有政治的和国家的调控活动。其宗旨就是要使所有承担利息的收入正式特权化,不管这种特权化发生在哪里。迄今为止,根据在仅仅由市场创立和调控的世界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历史经验,要想从这种发展方

向中期待合理化资源使用和紧缩货币的经济,确实是一种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浪漫主义幻想。在这个“作为今天货币秩序核心的、国际上放松控制的金融市场上,如中世纪晚期一样,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货币的抵押权”。^①使利息收入和财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为国家开支提供资金的义务,从发展趋势上看,将导致社会生活过程的摧毁。

从风险保护到增加风险

由于布雷顿森林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日益紧张的关系,出现了以下这些革新的金融手段:期货合同、互惠信贷、期权交易等。它们是世界金融秩序内进行再保险的手段。为了减少各民族国家空间内有限的支付义务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发明的金融衍生物反而使不稳定极度增长。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转变除了国家信贷的增长之外,还包括向这种衍生金融手段的明显的重点转移。由于这种金融衍生物的交易总是从财产原有价值推导出来的,因此名义价格和资本的实际投入很少能说明企业风险。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经过有价证券交易所而进行交易的金融衍生物 1993 年总量达 160 亿美元。如果把近 10 年内的平均增长率再加上,那么,1994 年可能名义上超

^① 汉克尔:《美元与欧洲货币单位》1992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69 页。

过 300 亿美元。如此规模的经营总量使人们不难理解,金融机构的总收益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来源于这种交易。在国际范围内活动的银行资本实行的也是全球性区域化原则:金融工作程序的国际化依旧遵循使用所投入资本的企业经营逻辑。对于金融资本来说,全球化本身并不是目标。例如,德意志银行声称,它们的经营战略是,“如果遵循一种世界范围的、而且有时无所不包的战略,那么最终不是别的,而是赤字”。因为:

“许多顾客要求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地方化的、完整成套的供给,而不是适用于世界范围的特色产品。”

“如果打算到处都能做得比竞争者更好,那也就是说看不到自身资源的现实状况。”^①

在 80 年代的进程中,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清算银行对 1993 年作出如下判断:“在下一年,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网络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在银行信贷和有价值证券发行之间、现货市场手段和金融衍生物之间,以及在各种不同范畴的金融衍生物之间的差异将进一步变得更加模糊。这种日益发展的一体化将刺激跨越国境的资本涌流。”^②

在货币关系、利息、股票方面差异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使用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风险的原因,而且还能招来大量的、希望参与这种不同评估的资本。从套汇交易向投机性使用金融资本的过渡是流动不定的,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日本投资者 90 年代初曾投资于美国的有价值证券和国家证券,在没有充分风险

① H. E. 比什根:《1957 年至目前的德意志银行》第 868 页。

② 《国际清算银行 1993 年度报告》1994 年巴塞尔版:特别可参见 K. G. 齐恩:《金融资本的新质量》,载于《经济与社会》1993 年第 1 期。

控制的情况下,货币运作过程的推移造成1995年痛苦的、近40%的财产损失。棘手的金融衍生生物交易并不是努尔牌局(一种不能吃掉对方底牌的打法。——译者注),各种投资机构,还有那些资本雄厚、靠食利为生的私人投资者预感到收益丰厚的机会,在短期内即可实现梦想的利润率。因此,那些不大聪明的市场参与者面前就会出现一份相应损失的清单。“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生物避开交易所进行交易,这种金融衍生生物市场几乎是不透明的,现场交易所变成期货交易所的傀儡。在一个以放松控制和全球化为取向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专家们对于突发事件的恐惧日益增长,辨清方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转变速度越来越快,汇率变动也同样如此,宏观周期与利息周期搅到一起,金融经济似乎越来越远地脱离了现实经济基础。没有人知道,良好的运行状态能保持多久,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大冲击危险的干扰。”^①

金融市场的现代化把金融衍生生物当作看守门户的两面神,它不仅能够很好地分配风险,本身还成为投机活动的诱因,并导致对金融市场过分迁就的适应过程。金融衍生生物的影响已经足以对世界货币体系不断造成威胁。10家货币发行银行集团总裁在一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中说:“国际金融市场的增长可以使总体经济扩大规模,推进一体化,增加活力,因此得到人们的欢迎。然而,这会对汇率造成很大压力。今后几年,如果储蓄机构进一步扩大,金融投资机构的有价证券在国际上更加花样翻新

① 克里斯蒂安·费尔施勒:《金融指南》199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58页。

的话,估计国际金融市场还将有更大的增长。”^① 这种观望政策不会使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物市场安静。在压力继续增大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货币保护者和信贷监控者将被迫实施新的监督与调控原则,如果这种损失还可以补偿的话。

中央银行和国际监督的麻烦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放松控制政策使得金融资本有可能进行国际流动,今天每个民族国家似乎很难宣布进行国内控制。第二,新的流通手段是越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无法反映到银行和有价证券交易结构的结算之中。只要有一名参与者发疯地进入这类数十亿的交易中,把各种交易搅到一起,就会在金融体系中造成一种严重的紊乱局面。

“四处流浪”资本的童话

新保守主义放松控制政策是针对 70 年代资本主义中心区域投资与积累的衰弱状态,作为治理疗法而出名的。然而,80 年代下半期的情况表明,它不仅没有使资本积累所患的病症痊愈,反而为生产的国际化和货币资本的加快积累创造了一种十分适宜的气候。

随着 1973 年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接踵而来的民族金融市场的放松控制,货币资本积累的独立化进程大为加强。世界范围内证券和债券的积累主要是通过国家信贷供给的。“金融

^① 《10 家货币发行银行关于国际资本运动和金融衍生物的研究》,德国财政部翻译的德文本,1993 年波恩版第 4 页。

资产的一个很大部分不是用于实物资本的构成(投资),而是用于填补商品和劳务结算或国家预算中的赤字。”“居于统治地位的金融机制这样一种阻碍性和选择性趋势的实际发展对于社会上一部分人是十分不利的。它符合那些数量日益增多、富有家财、靠食利为生者特殊的财产利益。为了确保他们的货币财富占有资格实行了一种实际利率高额增长的政策,而雇员和企业主投资于生产、革新和就业的利益却大大受损。给予这种食利者的优惠同时加重了年轻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社会的负担——不管它们是分布于欧洲的边缘地带还是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①

在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至少得以遏制以后,80年代中期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负债率开始下降,而美国的商品与劳务结算赤字和国家产业部门的赤字却不断升级。现代金融体系和它的金融衍生物手段面临的所有困难,对于国家债务来说也毫无二致。这涉及到把一个借来的、并且正被消费掉的数目变为虚幻的、虚拟的资本。各种债券——有价证券——是可以出售的,一个独立的价格运动渗透了金融市场。

在80年代进程中,所有资本主义中心区域都不得不加强利用资本市场,以便筹措资金,填补它的预算赤字。国家债务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在最近10年内明显提高。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关于“四处流浪的金融资本”的假说导致经济政策走入迷途。把超出货币总额的大部分单纯债券描绘为资本,并用它来平衡国家财政赤字。对这种从虚假资本中所派生出来的收入征税,当然是提高国家收入和贯彻——至少是开始推行纳税公正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工作程序。但是这种政

^① 《1993—1994年全球发展趋势》,1994年法兰克福版第220页。

策上的要求还在不断深入,要填平实际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之间的鸿沟则要求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改组,应当不断消除这种寄生结构。

没有真正发挥职能作用的信贷体系,财富的积聚就不得不在多得数不清的机构中进行(偿债基金、最低附加资本构成、储备银行与后备银行、供投资收入循环的货币储备等),而社会保险的发展则变得十分艰难。这些潜在的货币资本是通过信贷体系积聚,并被引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应当抛弃这样一种设想:这些可借用的货币资本首先是为食利者私人所拥有。实际上它是不断地从再生产过程中“排泄”出来的。无论是为了革新生产或扩大生产对折旧的固定资本作出过高的评估,还是通过周转运动的特殊结构,都会定期地使货币资本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释放出来。最后,所有不能立即支付的收入都同样被包容在细致划分的货币流通体系之内,变为承担利息的资本。

借贷资本来自真正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种形式的货币资本和信贷资本的增殖来自对整个社会利润的分配。金融产业部门发展的主要基础依旧是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定期释放出来的货币资本和可增殖的或可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利润收入。如果从关于“四处流浪的资本”设想得出它是与社会创造价值过程相脱离的结论,那么这种设想就成为错误的了。通过这种实际的独立化倾向,不应忽视的是所有形式的生息资本——不管是在哪一方面提供的,都参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

货币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化发展趋势,是由于基本的增殖结构,由于实际经济中积累衰弱而产生的。货币资本的这种加速膨胀和或多或少日益广泛的独立化又不断地反过来制约着再生产产业部门的资本增值过程。货币资本的迅速发展已经导致这样的结果:实际创造价值过程和资本增值过程由于对未来社

会财富占有资格要求而背上沉重负担。不是雇佣劳动者的过分要求阻塞了积累过程,而是货币资本日益增加的消耗性使用提高了利息负担,然而却没有导致生产的扩大。马克思早已作出了如下断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①

信贷体系的效率日益受到这种寄生结构的影响。借贷资本只有一部分返回到再生产过程;一旦被非生产性地扭曲,就只能作为定期生息证券而存在,一方面加重了财富生产负担,阻碍了生产过程必要的结构转换,另一方面作为走上冒险投机轨道的虚拟资本经受着贬值的危险。整个信贷业和货和货币业因此受到束缚,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寄生结构越来越成为实际积累的一种障碍。

生息资本发展形式脱离资本增值过程和实际利率的独立化,一般说来,受到强力手段的遏制。在有了1987年和1989年的经验以后,人们再也不会简单地把给银行系统带来重大损失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的风险,看作是人为描绘的阴暗图景而不予重视。相反,认为在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根本不存在民族国家采取对抗独立化行动的余地的那种观点也应当受到批判。只有同时努力推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改组,才能进行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取消货币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化过程要求人们不仅集中精力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同时还必须处理实际资本投资减少的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62页。

民族国家经济调控的终结？

向一种改革了的世界经济结构过渡是与民族国家的权力损失密切相关联的。金融资本领域的这种结构转变是民族国家经济政策终结这个命题的背景。这一命题假定，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充分就业政策在原则上已无法付诸实践。80年代中期，弗里茨·沙尔普夫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战略正在受到限制，再也不能凭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调控进行反对大规模失业的斗争。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承认自己在同资本进行的分配斗争中已经失败，放弃在反对大规模失业斗争中由企业收入和财产收入参与提供财政支持的要求；至多只能借助征收较高的雇员收入税来推行一项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90年代初甚至这种“在一个阶级内部的社会主义”也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了。“国家已不能通过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致力于充分就业。在以出口为目标的工业和服务行业中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企业挖掘一切合理化的可能潜力，否则就要垮台，而超出平均水平的高额工资和工资附加成本导致那些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大的劳动岗位被消灭。”^①

对企业 and 市场进行有效政治调控的能力明显地受到限制，因为无法对世界货币体系进行富有成果的更新，无法对资本的流动性进行相应的调控。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和民族国家控制的

^① 弗里茨·沙尔普夫：《从对失业的财政拨款到对过低职业收入的补贴》，载于《工会月刊》1993年第7期第436页。

金融资本并存的二元结构,对经济调控方式和积累方式进行政治改造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对民族资本起主要作用的利息率(贴现率、抵押贷款、开放市场政策)实际数值变化的余地变得更加狭隘。虽然如此,中央银行的影响还是经常被人们过高估计,人们经常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货币发行银行实行的是自主的利息政策,但它们从来未能推行这种政策。然而无可争议的是,在福特主义发展阶段的加快资本积累时期通过利息调整、需求政策(对于群众收入减税、社会划拨福利和国家公共关系消费)和投资刺激(减税或改善固定资本折旧率)还是可以减缓经济周期变化的。这种经济政策手段失效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和货币资本流动性的提高从而使民族国家调控关系(利息主权)被削弱。扩大社会福利国家的划拨福利(教育、文化)以及在资本收入和雇佣劳动收入之间减少两极分化的分配方案都陷于失败。大规模失业的重新出现和经济周期更加强烈的表现并没有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积累方式的结构问题。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各个政治阶级未能在扩大社会服务的方向上开辟一条发展道路。

所谓利率主权的丧失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由于福利制企业模式发展潜力的明显削弱,本来必须对工业、私营与国营服务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划拨福利实行比例调整。但对于社会福利国家、工业、服务产业部门,以及从而对劳动与生活中的生态方面进行合理改革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里,恰恰是一种目标明确的、扩大部分服务产业部门的政策可以决定性地减少对于世界市场形势的依赖性。

诚然,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需求,在这里尚有广泛领域没有受到国际竞争的侵入,较高的就业密度是可以同国内市场社会改造的发展相互联系的。

事实上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所有资本主义中心区域放松控制政策和私有化政策正逐步普遍化。削减社会福利国家的划拨福利、生产关系的灵活化,以及国家企业的私有化都促进了货币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化,然而,却看不到资本主义积累方式重新恢复活力的任何迹象。

80年代,一种进攻性的放松控制政策造成了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势,它使货币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距离日益拉大的剪刀型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的国际化都大为加强。社会调控被削减得越多,企业承受的国际竞争压力也就越大。日益加重的国家财政收支的债务鼓励了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加速积累。在这里,有一种相互推动的关系;国家不仅受制于这种不受控制的发展,而且新保守主义的再分配政策更加强了金融资本寄生结构的形成。而且,严酷的大规模群众性失业摧毁了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文明化的基础,不断强化的削减社会福利政策反过来又加强了资本结构上的过度积累。

大规模失业推动着国家财政预算收支和社会保险性债务向上增长,为减少风险,资本投资向金融领域转移的趋势也在增长。高等和中等收入阶层购买各种债券,坐吃利息收入,而这些利息收入是从雇佣劳动者家庭赚来的。我们经历了凯恩斯所分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停滞现象的翻版;在一个停滞的实际经济中债务日益增加,货币积累日益加速。“中心问题是这个‘靠食利为生者的社会’,投资者避开充满风险的私营产业部门,优先选择有保障的、可以定期获取利息的国家债券。与自己从事职业活动相比,他们更喜欢靠利息生活,他们把职业活动转嫁给为了生活不得不谋求职业劳动的工薪阶层。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实际上进行了一种颇成问题的、自下而上的收入再分配。这种债务犹如遏制经济增长的制动器,而经济增长的停滞又使偿

还债务的能力削弱。”^①

以取消货币资本积累相对独立性为目标的政策所碰到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幽灵是否还能重新被放回瓶子中去。也就是说,金融市场上新保守主义放松控制政策的消极后果是否会得到限制,甚至完全消除。

这样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即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只能孤立无助地听任国际金融资本的运动和权力的摆布。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结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某一国家采取有力的单独行动已不可能。但是有可能采取的替代办法仍旧是可以明确地列举出来的,尽管人们认为,这会使已积累起来的证券大部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贬值,而由此产生的另一种发展情况很可能是,这种清理活动将使现实经济倒退。

货币资本构成日益超过实际资本构成的过分倾斜必须消除。向所有货币资本交易征收营业税当然是有益的。^② 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对于货币领域进行再整顿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使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性逐渐得到限制,所有这些在原则上不是不可思议的。积累起来的证券和债券中有很大部分已经是无利可图的,就像把给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短期贷款改成长期贷款一样,因此,似乎还可以考虑经过协商重新确定金融资本的额度,结果将导致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软弱无力的状态必须扫除。

① W. 维特曼:《全球性的灾难》1995年慕尼黑第95页。

② J. 霍夫施密特:《反对投机行为的征税》,载于《梅诺论坛》第23期。汉克尔:《美元与欧洲货币单位》199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但是关键还是如何处理实际资本的问题。货币资本越来越多地在民族资本经济空间之内进行跨国活动,然而它的增殖却要依靠回到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受到那里的增殖关系和调控关系的制约。所以生息资本的增殖原则上仍旧要接受民族国家的控制与调节。而且这种国际范围内活动的金融资本的增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家预算和社会保险机构所承担的债务,因此也要在这条途径上反过来受到民族国家流通过程的制约。

这涉及到在三个层次上进行调节的混合措施:

- 1)对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价值创造过程进行改组。
- 2)改变民族国家内的分配关系,而这样做时必须超出对社会福利国家的明智改革的范围。
- 3)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

以上所述,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把问题推迟:因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明确地改变分配关系,特别是要对所有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财产收入进行等值征税似乎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民族国家经济范畴内这种无法应付冲突的软弱状态,面对国际范畴活动的金融资本将显得无能为力。

极而言之,这种批评的意思是,通过证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可控制性将推导出的结论是,民族国家的税收体系面对金融投资的抽逃早已束手无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税收体系有三个重要目标:为国家开支筹措资金,对分配关系作出社会修正,对经济政策发展和金融政策发展进行控制——很久以来,甚至在联邦德国这三个目标也陷于失败。这表现为私人财富的无限增长,分配中的扭曲状态进一步加剧。私人财富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加速积累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很难设想,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金融资本的增殖会像一个自我调控的自动装置一样实现。同样,有价证券的所有者也不是生存在一个无人的真空地

带。在民族国家关系中大量货币财产的形成已经证明,对于利息收入和货币收入进行征税是行不通的,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联邦德国财产关系出现这种扭曲形势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

1)对地产和不动产所有者在征税方面实行优惠照顾。

2)在对利息征税方面,据专家估计只有 25%的利息收入进行了申报。

3)有可能充分利用关于免税金额的规定和其他特殊规定而减少应征税收人。

4)对于利润和高收入实行一种公开宣布的优惠政策。

国家财政赤字已被有意识地当作论证削减社会福利国家的工具。

在对高收入和财产进行征税方面,现行法律的实施已经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开辟了很大的活动余地。一个在民族国家调控关系方面不能对收入和财产进行等值征税的社会自然也无法对国际货币体系和银行体系进行监督和控制。在贯彻实施目前一系列征税法令的时候,居首位的应是利息征税;现在大约有 80%的有纳税义务的利息收入获得者由于免税金额的规定而被免于征税,其余 20%的人也在大量逃税。通过银行的监督调查和受委托从事国家债券经营工作的联邦财产局的相应实践,征税收入能够增加大约 400—600 亿马克,接着应对所有收入和生息资本的所有价值变化进行征税和监督。

只要所有各种形式的生息资本收入至少没有像企业经营活动那样平等纳税,现实经济投资实际上受到歧视这一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不合情理的荒谬局面就会继续维持下去,财政预算赤字和大量债务就始终会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司空见惯的特点。只有取消利息收入免于征税的做法,把一切证券和债券的

价格变动置于社会监督控制之下,日益加速的货币积累才会受到抑制。

另一项挑战在于,再调整政策不能只局限于金融产业部门,它必须同时解决实际资本投资势头减弱的问题。

有人把实际资本积累的衰退归咎于高额工资、社会福利国家和环保生态标准。目前群众收入处于双重压力之下。第一、由于实际经济的缓慢拖沓进程和大规模失业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极其不利的力量对比,实际收入几乎无法获得保障。第二、社会福利开支增加了,而日益增加的国家债务实际上又对群众实际收入增加一重高额负担。国内购买力的减弱并不能从积极的出口政策和竞争政策得到平衡。只有当价值创造过程在社会调控下发展,目标在于扩大非赢利产业部门的政策得以实行,从而发展一个不受市场和国家官僚机构控制的公共就业部门的时候,大规模失业的局面才能改变。^①

相反,根据“适应还是衰亡”这句格言所制定的战略却是建筑在希望紧缩的禁锢可以自我打破的幻想之上。这项战略可以归结为一种一厢情愿的卜算:因为并没有向累积的证券和占有资格提出挑战,也没有要求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再调整,因此,适应就成了对臆想的世界市场客观强制力的屈从。那些根本不想对社会控制调节的可能性作彻底深入研究的人,希望自己事实上在生产基地的竞争中能作为胜利者出现,但是,有多少胜利者在另一方面也就有多少失败者,所以,这句格言的正确说法应当是“适应与失败”。

(张世鹏 译)

① J.里夫金:《劳动的终结》1995年法兰克福版第189页。

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后果^{*}

卡尔·海因茨·巴奎

一、主题词：全球化

很久以来,这已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德国几乎每周都有人发表文章,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上预言世界经济分工将发生急剧变化。这种预言多数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基调,有的甚至归结为世界末日的可怕观念。人们具体描述工业国家劳动岗位大量丧失的图景,恼恨来

* 本文发表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作者卡尔·海因茨·巴奎,1956年生,政治学博士、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增长、结构政策与国际分工研究室)学术主任和行政负责人。

自原第三世界的所谓廉价工资的竞争居然对西方生活水平造成威胁,抱怨政界对于这种困境束手无策。

没有人知道未来。就此而言,这种可怕幻景归根到底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驳倒。但是人们至少可以通过对事实和知识的清醒分析与解释对它们的可信度作出检验。通过这样一种清理完全会得出一幅多种变化的满足科学要求的图画,从而成为对这种挑战作出务实的政治反应的基础。

二、量的维度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困难,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肯花气力对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时髦词汇作出界定,或者至少对它的意义作出合理的限定。^① 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边境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就越高,世界经济就越是强烈地“全球化”。^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

① 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是保罗·克鲁格曼:《增长中的世界贸易,原因与结果》,载于《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丛》1995年第1期第327—362页。此处指第330—343页。

② 把世界出口率作为衡量全球化尺度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据此推断,国家间边界变化也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程度。然而对于本文以下的论证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的 20 世纪下半叶事实上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全球化时代。因为世界出口率从大约 7% (1950 年) 经过 12% (1973 年), 一直增长到 17% (1993 年)。^①

然而这种上升在历史比较中是有局限的。它部分地无非是意味着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对外贸易网络化程度。那时作为一个漫长的世界经济一体化阶段的结果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出口率——就当时能合理测量的范围而言——1913 年已达到 12%, 也就是说, 已经相当于 1973 年的水平。与此相比, 19 世纪中叶才大约达 5%。^② 总之, 今天的全球化与 20 世纪前期相比, 纯粹数量上的差异远比许多观察家公开发表的意见所认为的要少。

而日益发展的贸易网络密集化自然还有一个结构方面, 在这里它的发展变化更大。首先引人注目的有两个事实: 1) 工业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 而且经常是在同样产品类别之内。2) 一系列原来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几乎全部是亚洲东部国家——崛起而进入重要的出口国联盟。

第一, 可以没有多大夸张地说, 在 20 世纪初, 主要工业民族的贸易还是遵循着一种简单模式, 出口成品商品, 进口原料。与此相应, 当时主要国家的国民经济之间贸易网络化的程度是很低的。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完全改变了。工业国家进口和出口的主要是成品商品, 但经常是那种在性能上彼此只略有差异的商品。用专家语言来说, 这是一种内部自由贸易。它主要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之间进行。对此人们大多引述汽车行业作为例

① 参见本书第 56 页注释①, 第 331 页。

②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代的估计只包括后来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 但这一情况并没有使这个结果受到很大歪曲。

子；大众汽车公司向法国出口，雷诺公司向德国出口。这两家汽车康采恩在这方面几乎利用同样的部分市场。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可以随手拈来。随着富裕程度的增长，潜在的购买者对产品需求的差异越来越大。商品提供者对此作出反应，自身相应地日益专门化。此外技术进步也是这种差异分化的源泉，这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方面。在这里单纯嗜好品位问题已远远处于次要地位。今天，生产制造一种类型的工业产品要求购买大量的各种前期产品，而这些前期产品本身已经是具有很高技术价值的、高度专业化的成品商品，而不是简单的生产原料。这样一些前期产品的购入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进行，特别是跨越发达国家的边界，而这归根到底还是运输成本和通讯联络成本下降，以及科学技术结构日益精细化的结果。这种精细化必然要求分化出许多复杂的生产过程。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如德国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是它加入国际分工活动的绝对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每年西德全部出口的90%进入其他工业国家，进口份额也相当于这一规模。从长期趋势看，这表明是朝继续增长的方向发展。在70年代与此相应的比例还是80%，50年代为70%，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能作出合理估计的范围来说，明显低于50%。^①

内部自由贸易的强大增长自然绝对不会引起人们的忧虑。相反，对于所有贸易参加者来说它都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有助于尽可能好地利用各国国民经济中人们的高度专业化知识和特

① 这些数字以《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1994—199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鉴定》1994年斯图加特版第414页及以下几页中的数据为基础。表格第72、73(1950—1993年)；还可参见布赖恩·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1975年伦敦版第514、547页。

殊技能；因此，它也为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进行学习的进程创造了基础。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富裕国家国民经济之间的贸易增长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会导致政治争执。欧洲联盟内部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始终获得西德多数居民的广泛承认。没有一支严肃的政治力量曾对此提出疑问。

第二，主要在最近 20 年内人们所观察到的、世界贸易中的第二种结构变化是，一些“门槛国家”崛起为重要的出口民族。首先是所谓的东亚“老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来说，这种崛起毫无疑问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戏剧性。尤其是因为它与生活水平的改善相联系，而改善的速度是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因为这种崛起是出乎意料的，几乎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或政治家对此作过预言，因此它当然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经济政策经验教训。^① 它们对世界贸易结构的直接影响却通常被过高估计。尽管最近 20 年内“门槛国家”依靠工业成品商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从 0.24%（1970 年）到 1.61%（1990 年），^② 但今天它们在这一领域所占比例仍不到 2%，与老牌工业国家之间大宗贸易相比，真是微不足道。虽然如此，恰恰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经济与政治忧虑，尤其是从损失劳动岗位的角度来看。难道这些忧虑是毫无根据的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是否定的，但理由与其说在于世界经济分工的数量变化，倒不如说在于质量变化，它远远超出门槛

①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在经济学家中曾引起很大争论，在这里不再深入探讨。对此可参见阿尔文·扬：《东亚新工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载于《欧洲经济评论》1994 年第 38 期第 964—973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56 页注释①，第 337 页。

国家崛起问题的范围。此外,这种变化刚刚开始,所以对它们的分析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推测成分,而不是严格科学的。尽管如此,只要人们把这种质量变化纳入视野,那么全球化这个概念就会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三、质的维度

毫无疑问,最近 10 年内,运输成本,首先是通讯联络成本明显降低。世界不是在地理意义上、而是在经济意义上说大为缩小。这为各家企业和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开辟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使它们创造价值的生产链条根据经济效益标准从空间上被分割开来,而且扩大到世界范围。^①

因此,这种内部自由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的范围。这一次不再仅仅是那些地域上相距不远、发展水平相近的各国民经济之间,而且还在被我们通常分别列入“不同世界的国民经济之间”。以前可以这样说,发展中国家仅在世界市场一些明确界定的经济环节内曾经或者将会具有竞争能力,而且是在生产的劳动密集度比较高以及使用相对标准化的技术工艺的行业之中。这方面的传统例子是服装、纺织品、玩具、皮革制品之类的消费品,还有原钢和普通化学药剂的生产。

今天生产的花色品种已大大拓宽,而更为重要的是,再也不

^① 这种表述起源于克鲁格曼,参见本书第 56 页注释^①,第 333 页。他用美式英语说:“创造价值的链条现在已被切成薄片了。”

能很容易地把它划归各种具体行业。因为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领域企业把部分生产过程转移到工资成本比较低廉的国家。对此,电子计算机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芯片、微处理器和显示屏,作为一台个人电脑的科研密集性组成部分,典型方式是放在工业国家中制造(我们已把韩国也算在其内了!)而外壳和其他简单部分则经常由这个行业的生产者在发展中国家制造。

如果人们遵循传统的国民经济总结算标准,那么,在这种方法基础上确实就会看出某种本质全新的东西:这恰恰是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自由贸易。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下降,企业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把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即“第一世界”的技术和“第三世界”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从经济观点来看,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就其核心内容来讲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生产成本,首先是劳动成本具有吸引力,这一点是与过去相同的,只不过工业内部生产过程分散化的机会也极大地扩大了。

因此,在观察生产基地选择时根据财会人员的观点——例如科研投入在价值创造中所占的数额——对于“高技术”工业和“低技术”工业之间进行区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几乎每个工业部门都有自己的“高技术”生产阶段和“低技术”生产阶段。它们在世界经济结构转换中显然可以越来越容易地在空间上彼此分开。

由此产生什么后果?可以概括成一个主题词作为答案:即一场尖锐的世界规模的生产基地竞争。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关于德国生产基地的讨论。这场讨论最近几年日益紧张,简直席卷了所有重要的工业行业,这首先是全球化的这种新性

质的反应。^① 几乎在所有工业部门——不仅是传统的萎缩性行业——企业主都在重新考虑如何尽可能以最佳方式在空间上分配他的生产场地,以便利用世界市场。

事实上,最近几年德国公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猛烈增长,1989年至1993年期间大约每年增长12%(与它相比较,国内名义生产总值每年增长5.5%)。与此相比,自统一时期的繁荣结束之后——大约自1991年以来——外国在德国的投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② 当然这是否可以是一个长期趋势,还必须等着瞧。

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人们仍必须防止把形势说得过分严重。关于德国在国外直接投资的统计表明,绝大部分资本仍旧流入其他国民经济高度发达地区,而不是被公共舆论看作是世界上的“低廉工资竞争地区”。1993年德国企业在国外拥有的设备资产大约88%在西方工业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到10%,剩下的20%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和以前年代相比,这些比例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除了中欧和东欧的比例明显上

① 还有一系列“德国的特殊因素”,如经常表现出的对于技术衰落的担忧,以及外汇市场上德国马克大幅度升值。关于在所有重要层次上有关德国生产基地的讨论可参见亨尼希·克洛特、于尔根·施特恩等著:《德国生产基地。新欧洲结构性挑战》,载于《基尔研究》(蒂宾根)1994年第265号。

② 关于这些数字的细节请看德意志联邦银行出版的《与外国资本的联系》1995年5月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统计特刊》第10号)。这些数据实际测量的是相应参股的名义上的结算价值或账面价值。它们固然是在测算由直接投资产生的资本股份价值时可供利用的最佳资料,但仍旧表现出存在许多严重的方法问题。参见同上书,第71—75页。

升以外,1990年以前那里的比例几乎接近于零。

可见,迄今为止还谈不上向工资低廉国家投资流向的急剧转移。此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比例与相应的对外贸易比例的相似是引人注目的。这不足为怪。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双边资本联络网络的加强与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的加强是密切相关的。许多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能通过在当地生产而进一步开拓已经稳定的国外市场,而且首先还要改善推销途径。至于本国劳动岗位的损失,它们几乎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由此可见,公众舆论肯定认为已存在世界范围生产基地竞争的新规模,而要在重要的统计中确定这种新规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管是关于国际贸易还是关于直接投资的统计,都是一样。尽管如此,一些令人信服思考表明,在未来是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新规模的。

首先,很有可能,在今后几年或几十年内,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门槛国家,或从门槛国家向工业国家过渡之中的国家)内生活的居民人数将急剧增加。迄今为止(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民经济最成功的多数都是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是如果像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那就会把一种工业供给的潜力动员起来,使所有迄今为止的供给潜力都相形见绌。这种梦幻般的设想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在以后20年内将有一半的世界居民第一次以大规模的方式参加世界贸易。

其次,越来越多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供货者打入世界市场。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即使把所有原苏联的后继国家都包括进去——与印度和中国相比,人口固然还是少得多,但考虑到居民的教育水平以及一些地区可以依靠前共产党时代的工业传统,人们相信,一旦困难的转型阶段结束,它们的国民经济很可

能会特别顺利地加入世界范围的分工。再加上与西欧市场地理上接近,这在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时代将保持某种生产基地优势。

这种赶超过程与创造价值链条空间上的分散化加起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富裕西方的工业如果在广泛战线上面临工资低廉国家的竞争,是否会衰落下去,还是必须迁移出去?这些难道不会无可挽回地导致传统工业国家令人担忧的大规模失业吗?

为了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人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基本的,然而在公开讨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条真理。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总是意味着在商品提供和商品需求方面的一体化。这就是说,一个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增加出口,而且也要增加进口。甚至首先被美国方面指责为推行反市场政策的日本,在它的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就已成为一个西方产品的重要进口国。从长期观点看来,简直无法设想——而且实际上将会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情况——一个国家会不断压制自己的进口增长,获得越来越多的外贸节余,并且在极其广泛的战线上把外国竞争排除出市场。更加可能的情况是,这个国家的消费者由于福利的增长,也会对来自富裕西方的、花样繁多的高价产品产生需求。而生产者由于他们生产实践的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就需要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方的生产资料。

人们过去常常看到的是,经济赶超过程和相应的后起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的一体化并没有导致原来领先的那些国家的贫困化和大规模失业。例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再度崛起过程中曾促成整个国际贸易的繁荣,使所有参与者结构转变而在新的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这对于当时的主要工业强国美国来说,意味着它对于后起国家的优势地位正在缓慢消失,这可

能会从政治和心理上导致一种美国的“特殊身份危机”^①。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与失业的形势。相反,在70年代某个时期结束的西欧国家迅速的赶超时代,今天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经济上增长的黄金时代,即使对于美国也是如此。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也可以确认类似情况。德国和一些比较小的欧洲大陆国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济崛起挖掉了英国那时领导地位的墙角。虽然如此,在不列颠群岛上并没有引起经济削弱和失业的危机形势。

这背后可能存在一种规律性(如果说在世界经济中确实有某种规律的话)。这就是说,一大批国家进行急剧经济赶超的时代同时也是典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是结构迅速转变和劳动生产率迅速进步的时代。由于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所有参与竞争国家都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寻找自己的新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所有参与竞争国家的企业都要对自己的生产潜力进行新的结构组合,使自己在正在显现的新的分工中长期保持最佳的市场前景,而这在今天涉及的自然是在富裕工业国家要求高知识产品的那部分市场上。这种知识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工艺性知识,也可以是由于“文化经验”之类而产生的知识,这种经验只有在与顾客,及他们的“消费气候”在空间上距离很近的时候才能获得,例如在时尚和式样设计问题上都是这样的。

重要的是看到这场结构转变的三个特征。

第一,它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很大意义的,如果人们不想以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关闭工业国家市场的话,而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是灾难性的。今天在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如印

^① 参见1991年10月26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美国——旧式国家》一文的正确分析。

度、中国,结构转变归根到底无非是改善经济政策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些国家要在这个过程中最终进入经济学家们几十年来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轨道。至于结束了彻底失败的指令性经济实验的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就更不必说了。在这里,结构转变速度是一种经济增长的征兆,而不是(不管人们如何解释)那种危机的征兆。只有通过加强“知识密集性”的方向上对产品花色品种和生产技术工艺的适应,一个十分发达的国民经济,如德国经济才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保住位置,保障一种相对高的人均收入。

第二,这种结构转变固然在整体的粗线条轮廓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它对各行业的特殊作用却无法预见。德国各种工业中什么行业能够长期经受国际生产基地竞争的考验,是绝对无法根据某种简单指数搞得清楚的。因为工业内部分工越来越复杂了。例如20年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见到,90年代初在德国依旧保持——甚至还要加强——自行车的生产制造。这件产品在20年前简直已可算作标准化技术的典范了,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产品本身和顾客的希望从技术工艺上说都变得更加精细,以致自行车制造在我们这里重新变成增长行业。当然,这要借助于一种世界范围内原材料、零部件提供者的复杂联系配合,这对于“现代”工业部门是很典型的。相反,飞机制造——恰恰是在交通工具制造中传统的高技术部门——多年以来却陷入了危机。这些例子表明,一种富于远见的、相信自己可以鉴别出哪些行业是大有前途的工业政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第三,结构转变对于参与者自然是一种痛苦的适应过程。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种设想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转变,在我们这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总地来说已变得越来越小。这种想法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仍旧有一种重要的结构

效应引起人们的政治忧虑,使人们担心在一个从发展趋势上说越来越强烈地专门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国民经济内,对简单劳动的需求会越来越小。这在经济上归根结底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的结构转变导致富裕工业国家中单纯体力劳动的贬值。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人们对于“由于合理化而削减劳动岗位”的抱怨在实质上是合理的,即使它所涉及的与其说是劳动市场的总体形势,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并且十分重要的结构问题。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应付这些问题呢?

四、要求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为了对这个问题作出答案,需要在长期适应、短期以至中期适应之间画出一条鲜明的思维分界线。从长期观点看,如果劳动力供给结构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能适应新的需求,具体地说,就是通过逐步地世代更替使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有很大改善,使未受教育劳动力所组成的边缘集团越来越小的话,那么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单纯体力劳动的贬值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在所有关于未来将出现大规模失业的世界末日的想法中,经常忽视了西德最近 20 年内在几乎未受到公众舆论注意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方面以相当快的速度进行的“强化人力资本”过程。1973 至 1989 年期间,大约有 300 万非熟练劳动岗位被消灭,但是又产生了 500 万个熟练技术劳动岗位。与此同时,非熟练工人中失业率的增长已经超出了平均比例。然而这种增长与退出职业生活的、老年的非熟练劳动力和接班的、青年熟练技

术劳动力之间的“世代交替”的规模是无法相比的。^① 总之它所涉及的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经院式思考所认为的那种社会无法指望得到的适应机会,而是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使问题得到极大缓解的强有力过程。

这一论点在展望未来年代时也是适用的。人口的发展情况使平均技术水平较低的老年劳动力以相对较高的比例退出职业生活。在这里重要的也在于“受世代制约的”劳动力供给的适应远远超出了单纯正式的劳动力熟练技术培训问题,而且还涉及对现代劳动方法的熟悉,对此人们常常无法从数量方面把握。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最近20年代“电脑儿童”的成长。他们从最早的童年时代就面对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所以,如果涉及对于新的服务业与工业职业风格的适应,他们很可能具有一种很大的优势。

这样一种劳动供给方面的补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保障的吗?从长期观点来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结构相配合”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教育重点和它要求的风格特点能够早有准备地尽可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实现这种保障。总之,必须为每一代受教育的青年人创造尽可能良好的前提条件,以便在市场上形成价值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保障很高程度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从而防止这批人力资本过分迅速地贬值。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确定了教育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它的意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公共舆论界的充分评价。首先需要为那些有一天会受到合理化和结构转变严重冲击的青年人——主要是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青年人——开辟接

^① 卡尔·海因茨·巴塞:《失业与产业结构变化》,载于《经济与财政政策论坛》1995年第21卷第167—194页。

受始终很完善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道路,保障他们在未来具有很高程度的灵活性。

重要的是解释清楚,从教育政策方面固然能对于劳动力供给的长期适应施加影响,但是,具体劳动市场政策辅助措施方面的影响却远不及前者:因为经验揭示,与教育内容和职业招聘之间的事前协调相比,对一种有缺陷的熟练技术培训以至对一种错误的熟练技术特点进行事后修正不仅要困难得多,而且代价也昂贵得多。对流动津贴、重新培训计划、带有继续教育特点的劳动就业措施,都应当始终看作相对微小的“补救手段”。这种补救手段是为了支持一些人已经开始的对于新的劳动力市场关系的适应并为之提供方便而采取的,而不是为了对整整一代被解雇的劳动力重新“进行教育”。

总之,人们可以指望通过教育政策的正确转轨而做到使劳动力供给的特点适应劳动市场,但依旧会有一种短期的、直至中期的、可能很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受世界经济制约的劳动力重新评价可能要在较长的时期内超前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适应。历史上曾有过这种事情,而在实践中基本上有两种适应方式,人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

在美国,只有一种数量比较微小、时间受到严格限制的失业救济。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非技术劳动的贬值导致了工资结构的大规模分化。今天统计很好地证明,最近20年低收入集团遭到很大的实际收入损失。这一现象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中被称作“缩减的中产阶级”现象。^①在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存在相

^① 参见盖里·伯特莱斯主编的《恶劣劳动岗位前景,美国工资结构变化》1990年华盛顿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辑的《职业劳动前景展望》1993年巴黎版。

对规模较大、时间几乎无限长的失业救济。与美国不同,这里的工资结构依旧未变,而失业率,首先是长期失业率却日益增长。

可以设想对这种历史上长期实践的模式进行替代性选择吗?人们有充分理由对这个难题用一个小心翼翼的“否”进行回答。在许多欧洲国家——首先是瑞典,其次是德国——多年以来努力设法通过大量实施国家的(再)技术培训和劳动就业措施纲领来缓解结构变化对劳动市场产生的影响。不管这些纲领在某些具体方面取得什么成果,它们始终未能长期地、持续地削弱劳动力市场上人员的两极分化,即一部分人能够相对很好地适应结构变化,另一部分人则受到长期失业威胁。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纲领是毫无意义的。这只是说,人们不应期望国家资金和各种手段的投入会产生奇迹——即指望它们能够遏制世界经济结构转变的强大力量。

(张世鹏 译)

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一)

——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
与工资的竞争*

《明镜》杂志记者

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爆发了。资本主义失去了国界。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和工资的竞争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眼中只看到本国福利的各民族国家政府孤立无援地与长期以来着眼于全球考虑问题的康采恩公司和股票持有者相对峙。政治是否已失去它的力量?

至于世界经济,它正日益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库特·土霍尔斯基

如果亨利希·冯·皮勒尔把一个地球仪拿到手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转动它,变换方向,因为西门子公司现在已经遍布世界。

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一家下属公司的程序设计师们正在开

* 本文发表于德国《明镜》杂志 1996 年第 39 期,未署名,文章另一标题是《唯有市场统治一切》。

发一种高智能软件。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廉价劳动力制造着质量卓越的老式钨丝灯。在北泰恩塞德——英格兰北部一座城市,建成了一座年产值为 20 亿马克的集成电路板工厂,马上就会有 1500 名英国人在这里工作。

“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大约 190 个国家之内。”这位西门子老板自豪地宣布,西门子公司几乎成了全球性企业。在世界六大洲范围内总计有 400 多个生产场地,有大约 382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 170000 名在国外。长期以来,西门子公司在国外挣的钱远远超过国内。“我们已经转移了生产,”这位老板说,“但是,我们首先开辟了新的市场。”

西门子的技术人员计划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地区——阿克纠宾斯克建立一个发电厂。他们在中国的广州市正努力建设一个穿越地下土层的地铁网络,在南非建设一个超速多媒体网络。由于“西门子制造”的变压器来自匈牙利,光纤电缆来自印度尼西亚,因此称为“德国制造”的产品越来越稀少。冯·皮勒尔说,没有这种全球化的经营,巴伐利亚的公司总部恐怕就会成为一个“悲惨机构”了。

所以,这家高技术的巨型公司领导人像背诵经文一样不断重复他们要赢得未来市场的信条。谁要想在东南亚站住脚,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间漂亮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仅仅在中国,皮勒尔就想在 4 年内招收 40000 名就业人员;“向这个增长中的市场仅仅提供来自欧洲或美国的出口产品是不行的。”

全球化被称作不可思议的神奇魔力。许多康采恩像西门子一样努力追求它,同时又成为它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长期以来,它们已不再满足于向全世界出口它们的商品。它们希望在可望出现尚待开发的新市场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方进行生产。与此同时投资者把数十亿资本从一个交易所转向另一个交易所,

从各种金融衍生物转向股票,从股票转向各种金融债券。在这个全球的赌场上长期以来国家边界已不起任何作用。在这里,正在发挥作用的这支强大力量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世界。康采恩公司推动着这场越来越快的变化,民族国家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制约这些真正的“全球赌徒”的权力。

一场经济时代转折正在为自己铺平道路。西门子公司老板皮勒尔注意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世界贸易组织首脑认为一场“地缘政治革命”正在兴起。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呼唤一个“新的跨国世纪”——一个同时蕴藏着风险与机遇的时代。

这个世界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通讯卫星、电传、电脑联网而被网络化。新产品的出现越来越快,而且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总额自80年代以来也在成倍增长。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可以支配全球化经济。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东西。”

这个世界突然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购物中心。长期以来,柯达胶卷、索尼录像机、以及法国葡萄酒纷纷涌入地球最落后的角落。微软公司的软件在吉隆坡推动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如同在内罗毕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与此同时,摆脱桎梏的经济正围绕工资和劳动进行着一场毫不留情的残酷斗争,对福利和贫困要重新进行分配。德国的钢铁高炉不得不同东欧的廉价劳动力进行较量。西方福利国家同亚洲的禁欲弃权社会进行着竞争。这些生产基地被置于围绕投资、资本和劳动岗位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之中。

制定世界范围计划的康采恩与两眼只关注本国福利的各国

政府之间已出现了一道鸿沟。这场冲突具有一种划时代的作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预言:政府将会失败,国家将不得不对社会福利进行紧缩。千百万人将被迫尽快寻找新的工作岗位,而许多人将再也找不到工作。一种新的权力形势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新的国家和地区在崛起,它们的福利在增长——首先是亚洲四只虎——香港、新加坡、南韩和台湾,然后是墨西哥、印度或者巴西。老牌帝国则陷于中间的地位,大概欧洲也属于此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言,到2004年发展中国家要比所有工业国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到2020年德国在经济强国中将仅仅排名第6位,将侧身于印度尼西亚与南韩之间,远远落在新崛起的第一名即中国后面。瑟罗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火山爆发。像卡尔·马克思那样,这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利——他们是未来的精英。

首先在欧洲,这种迅速变化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当去年秋天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法国街道,抗议政府紧缩政策的时候,《世界报》报道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全球化的罢工”。而在德国,围绕生产基地与福利国家、竞争能力与工资附加成本也正在进行着激烈斗争。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后果。几乎有400万人在寻找工作岗位,人数如此之多,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如此众多公司打入国外,也是前所未有的。德国——如果人们相信雇主的话——现在有一种新的畅销品:劳动岗位。

经济是要转移到国外吗?德国人必须要习惯于马来西亚人或捷克人相差无几的工资吗?全球化带来了一种螺旋形下降,

在这里,真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奥斯卡·拉封丹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能赢,最终大家都要输掉”吗?是像《全球化陷阱》一书的作者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德·舒曼所认为的那样,“涡轮资本主义要摧毁它自身的生存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 and 民主的稳定”吗?对这件事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预言全球化将带来“更多的福利和稳定”。如在里昂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谈公报所说:“它不仅为我们这些国家,而且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机遇。”

这种乐观的世界观察建立在这样一种经济理论之上:早在19世纪英国人大卫·李嘉图就表述了“比较成本优势法则”,这个理论直到今天还统治着经济学界;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制造那些比其他国家更好的东西,如果每个国家都实现了这种专门化,那么生产和收入就会增长,自由贸易使每个参与国家的福利都能增加。后来,瑞典的埃里·黑克舍尔和贝尔蒂尔·奥林把这个学说进一步精确化。它的核心命题是:那些拥有许多金钱的国家应当专门生产资本密集性产品——高技术产品。而那些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应生产资本投入较少,但可促进较多劳动投入的产品——总之是简单的、大众化商品。

事实上,在以往几十年内,工业民族的福利几乎是持续不断增长。当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相互隔绝的铁幕坠落以后,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人对市场经济模式的优越性提出疑问了。

新的未饱和市场是与热心购物的消费者、廉价劳动力同时出现的。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受到自由主义的诱惑。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债务危机的惩罚,他们曾关闭商品进口的大门,希望自己生产所有的商品。

然而,突然之间,这些政府要以世界市场为取向。跨国公司,原来是作为剥削者受到痛斥的,现在则在许多地方受到高规

格的欢迎,他们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资本和技术。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报告说,首先是第三世界和东欧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在4年内总计通过368条法律,为投资者打开大门。

整个地球都失去了贸易控制,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自1995年以来规定了新的贸易准则,把对工业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降到5%,50年以前,这些国家还曾要求关税率为40%。在金融市场上资本所遇到的障碍也越来越少。具有决定意义的竞争仅仅在欧洲联盟、美国、日本这三角形之间进行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康采恩公司把整个世界都看作它们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如戴姆勒公司老板于尔根·施莱姆普所说,主要想获取的一样东西就是“利润!利润!利润!”跨国公司以前所未有的飞快速度购买场地、进行跨越国境的兼并,并且策划电讯业、航空业中的战略联合。他们不停地寻找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快的供应商——无论这些人员来自西班牙、萨克森还是新加坡,反正都一样。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国界、没有任何顾虑的垄断权。美国经济学家瑟罗说:“在这种垄断中人们并不预先规定要与世界的某一部分建立温情脉脉的固定联系,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使成本降到最低水平,使利润增加到最大限度。”

生产被减肥,同时被国际化,泊西·巴恩维克在1982年接收了一家名为阿西亚的公司,当时这是瑞典的一家电气公司企业,它的技术人员95%都在瑞典国内工作,它同瑞士的勃朗—波威力公司合并以后,变成了“全球明星选手”ABB公司。

在经理族中,巴恩维克被看作全球化事业的榜样。他把ABB公司的管理中心移到苏黎世。令他高兴的是,在西欧和北美已有54000名工作人员,今天在东欧和亚洲又有了46000名

新工作人员。他收购了 200 多家公司,把大约 5000 家独立的赢利单位编入一个世界范围的经营网络。ABB 公司下属的各工厂企业为了争夺外国的定货单彼此之间激烈竞争。

171 名职员从苏黎世控制着拥有 212000 名工作人员的各分支康采恩的业务工作。巴恩维克,这位全球公司的老板,坐着喷气式飞机此时正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进行视察。他到哪里,哪里就是行政管理中心。因此“在我用电传把重要的信发送到我刚刚离开的地方以前,我的信件已经到了这里。”

这样一种公司几乎感不到自己与原来的祖国有什么联系。他们用美元结算自己的经营业务,而不再使用本国货币。它们尽可能地向税率较低的地方纳税,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大约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康采恩内部进行。如果子公司之间彼此提供预付资金,那么财会人员就会通过价格结算把利润随便转移到哪个地方,而受损失的是通过高额征税为本国社会福利网络筹集资金的国家——如德国或瑞典。

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公司从科技成果中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好处。首先是电传、光纤电缆和电子计算机使人们能够对于迅速扩大的公司网络进行管理控制。运输成本直线下降。在上个世纪,人们用马车翻山越岭把出口商品运到国外,今天,石油通过输油管道,软件通过超速数据传导系统实现了令人吃惊的快速输送。专家们同时使工业变得更为灵活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钢铁厂要建在煤炭基地,纺织厂要建在多数顾客居住区附近,铁路工厂要建在必要的技术力量 and 资金齐备的地方。

世纪转折之际,经济才开始紧密结合。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工业巨头和欧洲商贸公司开始打入非洲和亚洲,他们把殖民地仅仅作为原料来源,而不是销售市场或工厂生产基地。铁路、电报局、还有轮船推动着全球化的前进。这种趋势伴随着一次

巨大突发事件,即纽约交易所黑色星期五而结束,在随之而至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各个民族国家再次自我封闭起来,经济效益直线下降。

当时全球化涉及的是贸易,而今天涉及的则是生产,而且,前提条件也完全不同。今天出现了无须任何土地资源的未来产业部门,公司企业可以从世界范围内的各家银行或交易所得到资本贷款。

但是,如果工厂实现灵活化,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工资水平悬殊很大的局面就越来越难维持下去。一名工人不再仅仅因为他住在欧洲就会比别人挣得更多些,这是与以前所不同的。任何一个垄断资本家都已不再能保守技术秘密。长期以来,印度班加罗尔已崛起为仅次于硅谷的庞大软件中心。西门子公司的老板皮勒尔说:“世界范围之内的各种知识随时都可以通过国际信息网络掌握到手。”

科学知识成了关键性的生产因素,它比劳动和资本都更为重要。在通往 21 世纪的道路,那些使用脑力劳动、不再被束缚在它土生土长的地区的产业部门将起到领导作用。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可以被迁移到几乎任何一个地方。还有原材料工业、电子通讯、飞机制造、电子计算机工业都是如此。生产制造电子计算机的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把它的康采恩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而它的网络遍布世界范围的医疗机构中心却设在美国东海岸,它的个人用计算机中心在瑞士,玻璃仪器中心在德国,激光照排印刷中心在新加坡。

菲亚特公司也把它最新式的帕里奥牌小汽车同时在 13 个国家的流水线上制造,包括厄瓜多尔、阿尔及利亚、印度、委内瑞拉。有一台电子计算机设在都灵,在这里通过人造卫星对整个物质生产流程进行集中管理,对小汽车的组装进行遥控。

这些到处安家落户的企业不可遏止地制造出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区域性的爱好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商业贸易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决定着人们的感受和观察。

好莱坞借助阿诺德·施瓦辛格和莎朗·斯通使成千上万电影观众感到兴奋,吉列刀片在大半个地球上成为男子汉的必用商品,万宝路牛仔在安第斯山策马而行的广告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德国人看来就像在洪都吕克山上一样。而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的味道到处都是一样的。

一批数目有限的帝国主义康采恩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新形象。20家世界最大的公司企业——其中包括三菱公司(排名第一位)、戴姆勒—奔驰公司(第17位)——的总营业额超过80个最穷困国家经济产值的总和。

它们所控制的商品总量大幅度增长。美国《幸运》杂志一年一度发表的专家鉴定说,全球500家最大的公司企业1995年营业额增长11%,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四倍,在利润方面,这些跨国公司增加得更多,1995年几乎达到15%,在这以前的一年甚至达到62%。

此外,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组织登记注册的40000家企业同样也可划入跨国公司范畴。其中包括米特斯丹德公司,它在国外只雇用几十名职员。这些企业总计控制着大约250000家国外子公司,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判断,这支国际战斗力量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而德国人也越来越积极地投入这场竞争。去年德国的公司在海外投资500亿马克,几乎是前年投资的2倍。

赫希斯特公司仅仅为在美国进行医药生产的马里恩·梅里尔·道芬公司的开支就高达71亿马克。董事会老板于尔根·多曼毫不掩饰地说:“赫希斯特已不再是仅仅在国外拥有为数不多

工厂的德国公司了。”更重要的是,它正走上一条成为全球化经营的医药化学康采恩的发展道路。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德国公司特别喜欢在工资低廉国家,如匈牙利或者捷克进行生产。对于巴伐利亚的米特斯丹德公司来说,香港就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

西门子公司的老板冯·皮勒尔计算说,改革国家工资低于德国工资 80% 至 90%。即使在法国或者在意大利,它支付给工程师的工资也只相当于慕尼黑普通工程师工资的一半。

然而,不仅有工资问题,德国汽车制造商把生产纷纷迁出德国,为的是在美国或者拉丁美洲赢得新的顾客。他们想像本茨·梅塞德斯工厂一样,避免美元波动的风险,或者直接消除贸易障碍。慕尼黑人所以把他们的汽车组装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只是因为,在进口汽车零部件时无须像进口整部汽车那样交纳高额关税。有多少劳动岗位被移出德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声称,在 5 年内总计有 30 万。而德国工会联合会却相信只有 75000 个。无论如何,国外经营的企业间或也能保住一些国内劳动岗位。

事情的反面就很令人忧虑,外国公司经常回避向德国投资。1995 年他们向设在德国的工厂投资贷款 140 亿马克。日本人或美国人都喜欢把企业迁移到纳税很低、官僚主义障碍比较少的地方。再讲一点英国的情况。在那里韩国的乐喜一金星集团推动着一项大规模直接投资,投资 40 亿马克兴建一家拥有 6000 个工作岗位的电子工厂,这是西欧从来未有过的规模。这些韩国人说,在威尔士的生产基地的工资部分地比韩国国内工资还要低,成千上万的威尔士人为每小时不到 6 马克的工资而工作。

在全球化方面,人们的思想要比企业发展速度更快。德国

人从日本人那里学来了“精简经营管理”，“严丝合缝地组织安排生产程序”，从美国人那里学习到“修改设计”和“减少消耗”。这样不久以后，每位“股东”就都会获得他的“价值”，也就是说，每位股票持有者就会获得他的高额利息——这种发展趋势似乎对于全球化已是确定无疑的了。它是连接跨国公司和更为强大的资本市场的中间纽带。

现在，国际股民到处都在要求获得同样的收益，从南卡罗来纳公司获得与德国施瓦本地区公司同样多的收益。为此，企业主到处都在削减工资成本昂贵的劳动岗位，到国外创造廉价劳动岗位，因为这会使利润上升。

这样德国康采恩逐渐陷入了对于大投资者的依赖。这些大投资者通过自己的笔轻轻一划，就可以决定股票行情的涨落，此外还可以决定劳动岗位设在哪里。谁要不顺从就会受到撤资的威胁。在美国已经显示出他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这里各种持股机构掌握着数额庞大的股票，各种投资信托公司十分得体地运用着这种权力——如果它对股票行情不满意的话，有时 would 向康采恩写一封解职通知书，然后毫无掩饰地建议关闭这家或那家分支机构。忠诚投资信托公司经营管理着 5480 亿美元，纽约交易所交易额的 8% 都来自这家公司的老板“内德”（克罗斯比·约翰逊）的账户。这家世界最大的投资信托公司目前也在德国争取小股民。

退休养老基金会的影响也不稍逊。因为美国政府几乎不为本国公民的未来操心，成千上万的教师把他们的财产寄存在一个名为 TIAA-CREF 的基金会中，它拥有 1360 亿美元和全世界的各种股票资产。《幸运》杂志最近问它的读者：“这全球 500 家最大公司企业都是属于谁的呢？”回答是：“都是属于你们的。”尽管如此，金融市场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却越拉越远。价值

15000 亿马克的庞大交易额日复一日地通过数据传输系统快速流动。在这背后潜伏的并不是公司和商品,而是对未来的赌博。互惠货币贸易、期货、期权交易,只能部分地抵御其他生意经营活动中的风险,但它们自己本身经常又成为一种风险,如巴林银行尼克·李森事件所表明的。

银行的密密麻麻地挤满掮客、经纪人的商贸空间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宇宙。无论什么地方也没有像这里如此强烈地醉心于全球化,如此热情地迷恋于现代技术。以前路透通讯社用信鸽传送交易所牌价,今天,一台多媒体股票行市自动收录机就可以提供“实时”的各种信息,使每个人都立即知道同一时间的所有牌价、所有公司信息、所有价目表。谁早一秒钟做出反应,也许就会挣下几百万,或者输掉几百万。通过电脑联网,小股民越来越向一个潜在的未来交易所靠拢。

在这个全球赌场中,就像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样,从来没有下班的时候。清晨,东京交易所开门,接着就是香港,然后是欧洲,包括法兰克福与伦敦,最后是纽约。这是一个永远不停的循环,在这里每天交易总额几乎是所有国家中央银行货币储备的两倍。

国家不得不向这支力量投降,无论它是否情愿。它们最终总是要通过资本市场为自己的债务负担筹措资金。如果一个政府在这方面要求过多,股民们就会立即要求支付一种贴水,为高额风险支付高额利息。资本市场不断向政治家们证明后者是毫无力量的。1992 年秋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几位金融巨头使英格兰银行陷入危机。外汇交易者所掀起的投机浪潮使英镑贬值、里拉疲软,整个欧洲货币体系陷入困境。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斥责说:“这些投机活动家是世界经济的艾滋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歇尔·卡姆德萨斯认为:“世界就掌握在这些人手

里。”莱斯特·瑟罗清醒地总结说：“到处都是市场在统治，只有市场在统治。”

政府能够退出舞台吗？它们难道对它们自己通过自由化和放松控制政策而召唤来的怪物，即市场丧失了权力吗？难道只有掮客经纪人、投资基金公司和康采恩才能决定全球的未来吗？

国家变得可以被人任意敲诈勒索，如果康采恩提出要求，它们就会获得补贴或税收的照顾优惠，否则的话，它们就要迁往邻国。耶拿光学仪器厂的老板洛塔尔·施帕特说：“竞赛者们自己会决定，他们在什么地方嬉游玩耍，如果他们对场地不满意，就会搬迁到别的什么地方。”生产基地的竞争恐怕会成为补贴竞争。在美国，公司企业属于最强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而在德国有些法律可以由于工业界的联合反抗而无法付诸实施。所有为了环境福利而试图征收一种生态税的尝试（也许在欧洲仅此一家）都悲惨地失败了。事后工业界代表，如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首脑亨克尔警告说，如果征收这种税的话，生产基地的处境将更坏，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中解雇将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波恩立即变得十分顺从。

各个国家可以向企业发布法规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美国劳动部长罗伯特·赖克因此谈到“国民经济的终结”。公司老板们着眼于全球范围的思考，而政府考虑的则是本民族国家的事情。

因为国际资本的联系日益发展，民族国家政府的卡特尔管理局的权力就越来越小。赖克说：“把企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越多，各国政府向它们发布指令、进行监督的权力就越小。”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缓和未来的冲突的锋芒，然而，类似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几乎算不上真正能够采取

有力措施的工具,因为:

第一,美国不断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切基本原则频频发动以政治为动机的贸易战争,同日本是汽车战,同欧洲是由于与伊朗的关系。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控诉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工业国家在迅速揭发社会倾销和生态倾销的同时对它们的廉价商品关闭了边界。

第三,德国人尽管凭借反倾销法保护了本国的建筑工人,但与此同时,他们暗中阻碍了欧洲统一市场目标的实现,因为借助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他们间接地阻止了欧盟国家工人的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许多经济领导人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对祖国应尽什么义务,他们在德国从高级知识、名牌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中受益,然而他们却把利润转移到国外。这个曾经是团结互助的共同体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他们却对此不闻不问。

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一次高级经理联席会议上激烈批评了这种立场:“一家不断削减在德国的生产基地和劳动岗位、几乎不向德国政府交纳分文税款的公司,居然在它的名称中经常地用德意志这个词,我决不承认它还是德国公司。”

政治学家约翰·卡瓦纳警告说:“在政府、公司、企业和雇员之间传统的社会契约不可阻止地要最终破裂。”以公司企业为一方,以社会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鸿沟已显示出来。西方民主制正经历严峻考验,很有可能被推翻。英国亿万富翁、欧洲议会议员詹姆斯·戈德施密斯认为工业国家正在掉进一个“陷阱”。他坚持不懈地劝告人们重返贸易保护主义。他说,自由的世界贸易正在吞食着社会,“而它自称是为社会服务的”。

戈德施密斯判断说,全球化的获利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

能够使自己从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中收益。但是他们使人想起扑克牌赌博中的大赢家”——他们很快也会同大输家一样面临毁灭。得到收益的还有这样一些国家,他们能吸引未来行业,因为他们拥有高级熟练技术劳动力,他们能够支付高额工资。

美国经济学家瑟罗说:“今天知识和技能是各种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惟一胜利泉源。”“一个国家的技术政策就是它的工业战略,它决定着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进行竞争。”

他的同事杰米里·里夫金断言:“科学工作者和信息分析专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催化剂。他们始终能了解高技术科学的最新状况。”明天的精英是管理人员或科学研究人员、生物化学家或工程师、企业顾问或电脑程序设计专家。然而,他们与失败者、非技术劳动力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努力赶上这次工业革命,或正走上这条道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迈克尔·卡姆德苏斯说,其余国家则受到被排挤到边缘的威胁。

这些一无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第一世界所需要的商品,也没有钱购买这些商品,投资者也不肯进来。卡姆德苏斯说:“现在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这些国家被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远远地抛在后面。”

富者和穷者之间就这样失去了彼此之间的接触联系。联合国最近计算,全世界 358 家亿万富翁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人类所挣得财富的一半。

就是在西方世界,收入差距也在增长。在美洲,中间阶层已经消失,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已接近于 70 年代水平,而老板的薪水却在上涨。

在工业国家,现在有 3000 万人没有工作,人数之多是世界

经济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阶级，“有工作的贫民”，即虽有工作、但工资几乎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差无几。新兴工业国家正在崛起，它们向教育大量投资。在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有许多比欧洲人还优秀的高度熟练专业技术人才在工作。然而，社会福利网络还在阻止欧洲人陷入真正的衰落。但这个始终与增长的生活水平紧密联系的网络正在为自身的破裂铺平道路。医疗保险、退休保险都在缓慢地滑向崩溃。

生产基地的竞争就这样变成了社会福利制度竞争，各国政府到处都在削减社会福利金。瑞典曾作为自由主义国民经济的替代模式而欢欣鼓舞，现在在高额债务的压迫下政府不得不削减医疗保险费，取消对于短时劳动的补贴。对于患病时领取医疗补贴的资格，即有资格领取补贴的患病天数作出规定。

在德国，这样一种信念正在潜滋暗长。共和国——至少部分地——必须适应世界市场变化了的现实。经营供暖设备的维斯曼公司的3700名就业人员声明，他们愿意在保持原薪条件下实行每周30小时工作制，借此阻止产地迁移到捷克。

而在别的地方，企业之间也在劳动问题上结成联盟。接近工会的经济社会科学研究所警告说，过于频繁地挥舞“全球化”大棒的背后经常隐藏着“蓄意拆毁社会福利国家的险恶企图”。

仅仅节省开支对德国的生产基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因为这场辩论中德国人已经忘记了要为未来投资，如果他们大规模地削减教育科研经费，而不是通过教育和科研保持竞争优势和与此相关的较高工资和福利，那么他们就会像莱斯特·瑟罗对某些工业民族所作的预言那样：他们将像古罗马那样，缓慢地走向衰落。

（张世鹏 译）

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二)

——民族斗争,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进攻*

《明镜》杂志记者

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把工厂企业和劳动岗位推向全球各地,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同样也不受国界限制,在长期着眼于全球考虑的公司企业领导和一心只关注本国福利的各国政府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在围绕生产基地的竞争中,国家究竟能做些什么?

来自墨西哥联邦国家恰帕斯山区的一封信被及时地送到了首都。反抗武装力量的副司令马尔科斯向新当选的总统欧内斯托·齐迪洛发出直截了当的通牒“欢迎你进入一场噩梦”。

这位隐藏着的反抗部队的领导人没有料到,他信中的恫吓很快就被现实所超越。几个月来,他和他的战士把这个国家折

* 本文发表于德国《明镜》杂志 1996 年第 40 期《全球化》栏,未署名,文章另一标题为《像一台吸尘器一样》。

腾得精疲力尽。恰帕斯人向士兵开枪,向政府机关投掷炸弹。他们为了反对贫困、反对墨西哥市场开放而进行战斗。

真正的噩梦不久果真来临了。但它来自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1994年12月19日开始了大规模货币外逃。总统齐迪洛了解到,仅仅在这一天,他的国民就把10亿美元转移到国外——这是出于对反抗者即将发动的新的起义攻势的恐惧。受到多方关注的经济奇迹面临急转直下的威胁。近10年来,墨西哥成功地摆脱了债务危机,并努力与工业国家接轨。现在,所有这一切都陷入危险之中。

于是这位国家首脑在12月20日宣布了一项卓有成效的决定,比索贬值13%——这样一来就抑制了货币外流,使经济恢复了平静。而在10天以前,政府还安抚世界各地的交易所,声称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步骤呢!

这种突然的改弦易辙击中了纽约交易所股民最敏感的部位。各家银行、退休保险基金会、投资公司曾向这个国家投资数十亿。现在墨西哥呈现衰弱趋势,难道崛起腾飞仅仅是海市蜃楼吗?金融交易人只知道一个口号:抛售!抛售!再抛售!从博尔萨——墨西哥城的交易中逃出来,抛售手中的墨西哥政府长期债券。在9天内,他们把80亿美元转移到国外,比索降到前所未有的低谷,与美元相对照,贬值35%,有一段时间甚至贬值40%。

这场令人神经紧张的闹剧持续了5周,墨西哥金融混乱把22000家公司推向破产,使几乎200万人失掉他们的工作。墨西哥事件的效应波及拉丁美洲,阿根廷和巴西的交易所胆战心惊。就是美国也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向南美的出口被取消,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失业者。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最终启动了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的一揽子援助计划。美国提供200亿美

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了 178 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资助 100 亿美元。

有影响的权威者就这样又一次阻止了更糟糕局面的出现。他们使世界避免了如 20 年代那样的命运,当时美国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之后,接着就是世界经济的大萧条。

墨西哥的兴衰起落示范性地说明,在全球化经济中一个国家会如何迅速地陷入衰落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歇尔·卡姆德萨斯说:“比索大崩溃是 21 世纪的第一次大危机,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危机。”美国经济学家伊桑·卡普斯坦诅咒:“全球化资本主义注定失败。”他警告说,世界似乎正无可挽回地被推入这一悲惨时刻。以后的历史学家将会发问,人们为什么不及时地加以阻止?然而,提出警告者毕竟是少数。人们对全球化的渴望始终依旧。有报告说,墨西哥又伤痕重愈,最近增长 7%,一连串的国家在它一样,跃入这个没有国界的市场——一个诱人的进口和投资的世界。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态度对本国经济制度进行改造。迄今的世界经济的统治者自身也未能摆脱这种变化。他们充满恐惧地看着新的竞争对手蜂拥而至。第三世界的劳动大军真的要侵吞第一世界的财富吗?福利水平突然受到挑战,所有居民阶层都受到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社会福利国家,这是福利社会的重大成果,现在变成了单纯成本因素。

生产基地的竞争全面爆发。《经济学家》杂志预言这是一场“世界战争”,经济世界的战争。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宣布,每个民族都犹如“一家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民族展开竞争”。

《时代》杂志说,人们现在对自由经济、放松控制和私有化大唱颂歌。法国人、巴西人或匈牙利人同样都在拍卖不赢利的国

家企业。印度向外国投资者打开了大门。而中国人则把他们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巨大实验场。

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没有这种经济学说,全球化几乎不可设想。自 80 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决定政策,它是 90 年代涡轮资本主义关键性的催化剂。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是推行这个战略的先锋。他们遵奉像芝加哥大学众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家的建议。芝加哥学派的信条认为,政治应与经济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一个摆脱束缚的市场会安排好一切,与被提出过分要求的国家相比,它具有更高的效率。

这个学说从根本上与 60—70 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策相对立。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鉴于大萧条而创立了他的学说,他认为国家应该是市场内的重要活动家。在形势恶化的时候,它应通过扩大开支和降低利率启动宏观经济,在形势好的时候再进行抑制。这被称作反周期的需求政策。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宣布:“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里根主义与此已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新总统规定国家退出经济生活。他降低了所得税,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金,打破了电讯巨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垄断,在这个原来受到保护的行业中,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岗位。

下降趋势之后接着就是第一次就业奇迹,增加了 1700 万个劳动岗位。比尔·克林顿创造了第二次奇迹,自他进入白宫以后,美国经济创造了大约 1000 万新的劳动岗位。

这期间,美国工业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好地武装起来,投入全球竞争。自 1994 年以来,在洛桑的国际行政管理与发展

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竞争排名榜上,美国又居榜首。如许多作者指出的,这种超越后进者的跃进正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日本曾在长达9年的时期内位居榜首,现在排名滑到第7位,居新加坡和香港之后。德国勉强维持第6位,后面是荷兰、新西兰、丹麦、挪威和台湾。

美国人支配着未来广有前途的行业,如电子计算机和软件生产、生物工程和飞机制造。“然而,美国模式的社会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洛桑研究所的报告说,美国模式能否出口到世界其余地区“在这10年的最后几年内将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建议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地区像拉丁美洲实行得如此彻底。通货膨胀率曾高达2700%,两年前在巴西这还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消失。由于1982年债务危机而开始的“失败的十年”已告结束。

智利经历了非常残酷的休克疗法。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毫不含糊地遵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失业率曾高达30%,国家陷入一场严重的萧条之中。顾问们安抚说,这是剧烈疗法所产生的暂时后果。

而继此之后的几届非军人政府依旧坚持新自由主义路线,同时努力设法缓解一些社会后果。这期间,智利工业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连国家财政也步入正常状态——这在拉丁美洲是罕见的。对于吸引大宗投资来说,安第斯山区国家的市场自然是过分狭小的。这些大投资者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阿根廷,首先是在巴西四处查考。通用汽车公司在这里制造销往整个南美地区的奥波型小汽车,巴西大众汽车公司生产大众牌小汽车。菲亚特公司也在这里制造帕里奥牌小轿车。旨在保证对美元保

持一种固定汇率的 1994 年货币改革帮助外国康采恩获得稳定利润。

与此同时,巴西也经历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纺织工厂借助来自中国的工资低廉的纺织女工尚可勉强维持。而其他行业则推行合理化。那些没有受到很好教育的人几乎无法找到一份工作。连新兴工业国家也大量需求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实际操作技术的科技工人。

《维亚》杂志在关于全球化的专题文章里写道:“圣保罗工业工人两耳听到的是他们的老板关于重新改善质量和实行新技术工艺的咒语,而他们在实践中所经历的,就是被解雇。”圣保罗的德意志普雷萨斯—舒勒公司同德国国内格平根市的舒勒母公司联合,生产汽车制造业的液压机。这家子公司的就业人员已从 1300 人压缩到 700 人,汽车液压千斤顶的批量生产几乎全部停止,因为国外竞争者工资低廉。公司经理埃尔玛·卡姆皮奇对国内公司工资附加成本颇有怨言:“向他们支付的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

但这个世界第五大国的生产大多比欧洲便宜,它为各家企业提供 16000 万名消费者。自两年前通货膨胀率直线下降以来,经济再度回升。当地的梅里塔分公司老板欧文·维埃拉欢呼说:“巴西像一台吸尘器一样吸引着投资。我们很快就会紧紧追上被称为亚洲虎的那几个国家。”

仅仅在今年这一年,恐怕就注入资金 70 亿美元,几乎是 1990 年的 8 倍。长期以来,西门子公司、德国电讯公司、法国和美国的电讯跨国公司都表示愿在帮助巴西电讯市场私有化方面提供资金和技术。

这些新兴国家还在其他方面从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中获得好处。债务危机期间,他们还要与最强大的世界银行、一些大型

金融信贷机构打交道。现在各种公司、投资信托公司和股票交易所的私人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一支不可轻视的投资者队伍往往宁愿直接投资于新建工厂或者需拍卖的国家企业,而不是贷款给政府。

去年,这些康采恩在全世界的跨国投资数额之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总计 3250 亿美元,后又追加 1000 亿美元。其中 1/3 的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或改革国家,总数是 5 年前的 3 倍。仅在东欧就注入 120 亿美元。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成了“热点地区”。

没有一个门槛国家比得上中国,吸引来数额如此巨大的资本。跨国公司在华建立了 40000 家子公司和合资公司,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他们仅在 1994 年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 340 亿美元,是投给在欧洲获得外资最多的国家——英国的 3 倍。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简单扼要地宣布说,“全球投资之后接着就是经济繁荣”。崛起国家因此获得一种附加推动力,世界市场重心移动得更加迅速了。

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下去,到 2004 年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总量上将超过所有工业国家。现在中国凭借繁荣的经济特区也成为第三经济大国。在最近的 5 年内全部社会生产总值迅速向上增长 74.5%,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呈现类似形势。

然而这种漫无节制的工业化也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在中国出现了几百万流动民工,官方公布失业率为 3%,估计有 200 万人没有工作或者是冗员。

在韩国,分配斗争日趋激烈。这个繁荣国家平均每年工资增加 14%——许多康采恩认为目前这种增加幅度太大了。亚

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竞争者支付的工资都比它少。9月中旬30家大型企业联合达成一致意见,要明显减少它们的职工数目。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加藤认为,尽管如此,门槛国家的向上崛起“将把世界一个地区的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计算说,第三世界的12亿人口很快就会承担起工业国家85%的劳动。肯尼迪问道:“那时候,我们岂不是要经历一场社会爆炸?”

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刚刚逐步建立它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时候,西方国家的人们已有几十年之久习惯于安逸舒适的福利结构。但恰恰在目前,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它却面临崩溃的威胁。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断言:“福利国家已经破产,在许多国家已经达到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

图宾根的教授约阿希姆·施塔尔巴蒂声称,欧洲人“只有利用全球化的强制力量对已支付不起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方针调整”才能维持下去。

然而政治家们长期以来拒绝这样做,他们对于社会福利国家发动的进攻逐渐具备具体化的形式:

荷兰首相威姆·科克削减了失业福利金,改革了社会救济,自3月1日废除了法定医疗保险,以一种私人保险的模式取而代之。前任首相鲁德·柳伯斯就曾把荷兰描绘为“生病的国家”。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几周以前取消了对于60岁以上老人的社会救济制度,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压力下,大大削减贫苦人的社会救济金,虽然这笔钱原来就比欧洲少得多。

新西兰取消了对于农场主和特许折旧的所有补贴,国家企业被私有化,工会被剥夺权利,罢工受到限制。在猛烈的休克疗法之后新西兰成为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中“发挥作用最好

的国家”。人们从这样的一些例子中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出什么经验教训呢？全球化真的要把社会福利国家变成竞争国家吗？

甚至一度是无法伤害的日本也密切注视着遥远欧洲的辩论，而且深为忧虑。《日本经济新闻》警告说：“对德国的痛苦我们不能麻木不仁，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把自己的经济奇迹归结于社会共识原则，如果德国制度陷入危险，这也会成为我们的问题。”

症状都是一样的。企业凭借实力打入外国，日本劳动成本超过美国 40%，超过瑞典 14%，资本外逃的首要目标是亚洲的低工资国家。

松下电器公司 3 年内在中国建立 28 个新厂。在马来西亚，这家康采恩控制着全部国内生产产值的 4%，本田公司在今年的生产经营中第一次使用国外生产的小汽车数量超过国内。

如在德国一样，公司老板敦促人们改换思想。丰田次郎，这位丰田康采恩的幕后指挥者认为日本几年处于停滞状态之后，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点，他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

新一代具有自我意识的经理不会向本国政府让步，或者受制于通商产业省。他们在 90 年代初还用出口斗争对经济萧条作出反应，现在他们却从国外不仅向第三国，而且向本国提供商品。昔日日本社会的成功方案现在已变成康采恩的桎梏，如雇员的终生劳动岗位保障或按年龄晋升制度。战后时代，东京借助一系列严格的国家规章保护自己免受国外竞争的伤害，现在这些规章却使日本公司感到讨厌。企业迁出日本加重了社会福利体系的负担。自从日本公布失业统计以来，失业率第一次上升到 3.5%。在共识思想的作用下，康采恩尽管避免实行解雇，但被强制提前退休的老职员加重了退休保险公司的压力，何况

到 2035 年,65 岁以上的职工比例几乎要增加一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高额的退休金开支将使日本在未来 35 年内,每年国家赤字上升到相当于经济产值的 20%。

东京将如何战胜危机,人们至今还不知道。曾任麦金西公司总裁的大前健一判断说:“日本经济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的逻辑要求。”日本梦已经破碎。“长期以来,日本公司认为它们的胜利成就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今天它们不愿、或者说不能承认,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秘诀再也无法长期地维持下去了。”

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相信,只有废除阻碍市场的各种规章制度,本国生产基地才能再度加强实力。但是这个国家仍旧在逐渐对外开放。1989 年日本与美国及一些太平洋国家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个组织还是一个柔弱无力的形象,它的很不明确的目标是直到 2020 年,亚太组织才能完成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另有一些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建立跨国商贸集团,完成了一体化。瑟罗认为,它们利用这种联合,“作为进入一个导向真正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过程的跳板”。

1994 年,当时还只包括 6 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达成一致意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名为亚洲自由贸易区。此前不久,出现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东欧国家努力挤入欧洲联盟,(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目前梦想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即一个跨越大西洋的集团,把美洲和欧洲联合起来。

1991 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联合建立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拥有 2 亿人口的贸易空间,各国之间几乎所有的关税限制都被取消。这四个国家的成功联合是令人吃惊的。不久以前,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贸易往来。今天,在阿根廷和巴

西之间跨越边境行驶的载重车队挤满公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圣保罗的飞机座位大多被从事商业旅行的乘客订满。

仅仅5年之内,在这个集团的两个大国之间商品流通量从40亿美元上升到144亿美元。以前只有20家巴西公司在阿根廷落户,现在则增加到400余家。

现在这个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超过大吹大擂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原来一心要挤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智利,现在反而在6月间同它的邻国签定了结盟协定。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也都打算仿效。

现在已经有有了一个共同的货币计划,准备尽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的开端付诸实施。这个目标是建立一个从巴西直到火地岛的幅员广大的统一的经济空间。

但是世界范围的各种跨国集团组成本身隐藏着一种危险,在这个联合体内部商业贸易活动是自由的。对外部,这些集团则努力把自己不喜欢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

欧洲联盟在法国人的压力下,利用香蕉法规完全有意识地使拉丁美洲供货者难于进入它的市场。美国和欧洲之间不断爆发激烈的贸易战,或者由于大豆问题,或者由于对飞机制造业的补贴。

大前认为,存在一个危险的循环:“认为一个自由的世界市场会使日本、美国和欧洲沦为最大的衰落者的这种设想是完全错误的。失败者将是对这场变革关闭门户的国家。”

对于那些萧条地区国家来说,闭关锁国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首先是黑非洲各国正面临完全丧失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危险,他们得到的发展援助越来越少。全球性康采恩对这里的私人投资平均每年减少30亿美元。跨国公司仅仅对廷巴克图(马里)和哈拉雷(津巴布韦)之间的少数项目感兴趣。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猛烈抨击饥饿与贫困现象。他说：“在有些情况下，冷战的终结导致了有违常情的结果。在一些大国的战略利益考虑中，地球上的一个部分似乎突然消失了。”

工业国家更多地埋头操心于自己的事情——失业与社会保险机构的危机。瑟罗问道：“谁愿意把这些世界的经济失败者接纳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呢？”

这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社会福利制度的专家们警告受排挤者可能会进行反抗，一无所有的穷人可能会浸入福利岛。右翼民众主义者，如美国人帕特·布坎南和罗斯·佩罗特就紧紧抓住了这个题目，并且要求：封锁边境、禁止移民和被他们认为有害的廉价商品入境。

就是在欧洲，也总是能够一再听到保护主义的声音，首先是法国。例如，在里昂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前夕，雅克·希拉克激烈反对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总统认为，应当借助发展援助更多地关心共和国原来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欧洲人力求为贸易规定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标准。儿童工作问题、最低工资和工会问题都应受这一标准规定的制约。工业国家希望把这当作世界经贸组织的第一次部长联席会议的一个主要题目。这次会议将于(1996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有来自120个民族的3000多人参加。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善意的原则背后闻到了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味道。它们的论据是，贫困民族不可能达到富裕民族多年以来所实现的社会福利标准。社会福利制度规章使商品昂贵，归根到底它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将大于它的好处。

此外在新加坡可能出现公开分歧。特别是亚洲集权主义国家可能对工业国家的某些无理要求进行反抗。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要求：“世界经贸组织应当避开那些与商贸

活动毫不相关的题目。”

认为一纸国际协定就可以遏制所向披靡的涡轮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恐怕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即威胁别人的工业国家、充满前进动力的崛起国家,以及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完全失去明日机会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

无论国家之间还是许多国家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姆德萨斯警告说:“市场不应当是最后一言”。当从富国向穷国,从富有居民集团向贫困居民集团的社会福利划拨在所有地方都被削减的时候,他要求世界上的富裕者更多地具有“社会团结互助精神”。

卡姆德萨斯是现实的。他知道,全球化是不可阻止的。而国家却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参与这个全球化进程。

这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说:“没有任何做法会比拒绝与世界经济相适应导致更高昂的社会福利成本。那些坚决果断地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会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好处。”

(张世鹏 译)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

——从民族的国民经济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狄特玛尔·布洛克

引 言

全球化这个术语是一种概念集合体的一部分，人们用这些概念给主要是传统工业国家在经济现象和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

* 本文发表于德国《议会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33—34期合刊第12—19页。作者狄特玛尔·布洛克，1947年生，博士，现任赫姆尼兹技术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重点为“现代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变化趋势贴上各种标签——以便产生舆论效应：涡轮资本主义、纯净的资本主义、经济恐怖、五分之一居民的社会^①等。在这些光谱中，全球化成为描述民族国家和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建构的社会在主权方面急剧衰落的代用语。

本文将研究导致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急剧变动的原因与后果。只有当人们把今天的变化与从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全球化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特别重要的是，要把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与历史上早在欧洲“漫长的 16 世纪”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区分开来。

如果把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那么，人们就可以区分出两次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截然相反效果。在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瓦勒斯坦证明已形成“现代世界体系”的那一历史阶段中，^② 民族国家产生了。全球劳动分工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至少是导致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个根源。今天相反，我们所碰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却使民族国家，至少是以社会福利国家形式出现的民族国家受到威胁，并且被挖掉基础。为了理解这个似乎悖论式的事实，我建议把这两个历史上可以明确区分的全球化过程也从概念上划分出来。为简便起见，我在下面将分别称它们为第一次全球化和第二次全球化。

① 参见《明镜》1996年9月23日第39期；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德·舒曼：《全球化陷阱》1996年莱因贝格出版社版。安德烈·戈茨：《经济理性的批判》1994年汉堡版。维维安·福勒斯特：《经济上的错误》1996年巴黎版。

② 参见伊曼纽尔·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圣迭戈版第1卷。

一、第一次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的国民经济

我首先谈的是第一次全球化，也就是老的、已经过去很久的全球化过程。19世纪传统的民族国家不仅如弗里德里希·滕布鲁克所确认的那样，^① 受到种族、文化、民族、国家共同作用的影响，而且还是在与“漫长的16世纪”中现代世界全系的形成的紧密联系中出现的。根据瓦勒斯坦的看法，当时出现了一次发展断裂，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瓦勒斯坦的著作之所以令人发生兴趣，是因为它的作者被安东尼·吉登斯^② 推崇为研究全球化命题的先驱。这固然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瓦勒斯坦所研究的是与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并且也是吉登斯所看到的全球化不同的另一个全球化过程。

瓦勒斯坦分析的基本命题是拥有内部经济循环的庞大帝国如何向一个处于全球化经济体系框架内的民族国家体系过渡。

16世纪以前经济循环始终被理解为一种内部机制。一个国家的实力归根到底取决于这种经济循环的强弱，也取决于它是否完善。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也努力尽可能地把整个经济循环，至少是贸易通路、战略上重要的商品或生产基地并入自己帝

① 参见弗里德里希·滕布鲁克：《社会学思想中的社会的诞生》，载于《社会学杂志》1984年第10期第348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主义的后果》199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页。

国版图之中。贸易活动的兴趣集中在如何设法搞到被他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商品,价格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做法的缺点在于基础设施的发展、行政管理,还有保卫不断拓展的疆土越来越多地牵制了自己的力量。

从15世纪末直到17世纪前期的欧洲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的、使这个问题得以消除的格局。逐渐出现了一种劳动分工的世界经济,在它的内部,各国的国民经济只集中在经济活动的调色板上某一个部位,它们的实力要通过国际贸易来补充。

为了实现这种经济分工,为了使北欧发展成为经济中心,瓦勒斯坦认为有两个过程是很重要的。^① 第一是北欧中心与东欧的谷物贸易,第二是从南美殖民地到欧洲的贵重金属进口。谷物进口使得这个中心的农业能够集中于高价值产品的生产,首先是肉类生产和蔬菜种植。贵重金属的进口特别提高了流通支付手段。通过这些途径,这个中心借助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了进行专门化生产的机会。此后,这种模式不断被重复。在这个中心产生了解放性的效果,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不合算的活动被各种成本相对有利的资源取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得以逐渐进行。但是在边缘地区,与此相反,没有出现这种效果,例如在与东欧谷物的交换中主要是为东欧大地主进口奢侈性商品,并不能因此产生经济现代化的效果。这种跨国界劳动分工的新模式不仅产生了经济上的依赖性,而且还导致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分配。经济中心的解放性效果是通过边缘地区的原料生产和农产品过剩的形式获得的。

导致这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瓦勒斯坦强调,当时欧洲政治地图已不再允许建立一个传统模式的世界帝国。这个论证至

^① 《现代世界体系》第301页。

少是需要作很大补充的。至迟从 17 世纪起,在西欧和北欧开始出现的那种文化发展也导致了人们对于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价。当时人们对于这两个职能领域以一种今天依然有效的方式重新评价。人们认为前现代化国家本身就是目标,但它在现代化阶段就需要获得合理辩护。与此同时,对于经济体系也是如此。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早已论述了为国家进行辩护的重要论据。在一个由相互竞争、追求各自的个人利益的国民组成的社会中只有通过国家的权力垄断才能有力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并从而实现社会进步。国家权力机关只有坚决地实行权力垄断,才能为自身的存在辩护,这种权利垄断必须仅仅为“提高人民福利”^① 这个目标服务。但是专门执行权力的国家机构始终只能间接地实现这个目标,如霍布斯所强调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对于个人进行严厉管束,努力维持法律与秩序。伴随着向一种民主法制国家的发展,保证自由的法律保障成分日益增加。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这种保障最终扩大为一种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物质福利保障。^② 保障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例如货币政策),以及在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被推向前台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交通、大规模通讯交往、教育制度等)也都属于这个利用间接手段实现福利目标的内容。

在国家机关把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作为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国家从一个不需要其他辩护理由的目标本身变成了一个运用权力手段的服务组织。而经济却相反,获得了作为强大的进步推动力的重要意义。亚当·斯密早在 1776 年第一次出版的《国富

①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980 年斯图加特版第 278 页。

② 参见于尔根·哈贝玛斯:《交往行动的理论》199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4 版第 2 卷第 524 页。

论》一书中就已经为这样重新评价经济活动提出了重要论据。在(应由国家保障的)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经济的自然法则就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法则表现为一种劳动分工体系,在分工中大家都要在具备最优惠的条件和前提的地方进行生产。依据这条途径可以产生一种优化的劳动分工,使劳动产生最大限度的效益,并因此创造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这种论据基础也未遭到尖锐批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评家卡尔·马克思的驳斥。它的含义在于,经济体系不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而只能是在全球框架范围内才会得到优化发展。

在瓦勒斯坦所分析的跨国的、全球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在经济中心地区逐渐地发展起民族国家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这些体系建立在经济与政治紧密协作的基础之上,而外贸关系则具有一种侧翼保护的意义。这种向民族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本世纪 50 和 60 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争取一种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成功方案并不在于促进工业商品的国际贸易,而在于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它的核心是工业产业部门。它是由进行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自动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拥有大量就业人员的大企业构成的。这些大企业只有在持续地实现计划规定的生产产量的时候,才算是能够有效生产的典型企业。只要能把较高的工资和一种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这种生产机构就能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很好地发挥作用。^①从洗衣机到娱乐消遣电器,日新月异的消费浪潮以及不断提高的妇女就业比例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经济与政治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制度化的解决冲突

^① 米歇尔·泊勒、卡尔勒斯·沙贝尔:《大规模生产的终结》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的出现。它们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整个制度的成功——建立在这样的意识基础之上,即大家都坐在民族国家国民经济这同一条大船上,所以也要依赖于冲突的调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与民族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民族国家是在与跨地区的市场关系发展、铁路建设、大众媒介的渗透,以及一种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标准化的教育事业的紧密联系中出现的。民族国家固然是在古老“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在这里不容忽视的是出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前现代主义的民族文化被转移为现代民族文化,并且以这种方式实现了现代化。^① 这些传统因素的模式化和固定化并且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扩展无论如何都是相对较晚的事情。这个进程是在与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发展紧密联系中进行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紧密结合,主要在19世纪导致了传统民族国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还使那些大型的、在国际范围内活动的经济公司与民族国家实现了一体化。

虽然不仅是经济,还有科学、艺术,以及其他职能体系各自依据其本性而越来越多地趋向全球化、趋向全球的网络结构,但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纽带在一定范围内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还有对于民族福利成就和富裕水平的自豪感,包括它们的象征性标志都成为这样一种纽带,它们与现存的、跨国的联系网络有效地叠加在一起^②。

① 参见埃伦斯特·格尔纳:《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年汉堡版。

② 参见罗伯特·莱西:《新的世界经济,民族经济的终结》1993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版第19—80页。

二、新的全球化浪潮：第二次全球化

今天,当人们谈论全球化的时候,一般来说,指的不是那个老的、在空间范围内比较僵化、比较稳定的劳动分工体系。相反,这里指的恰恰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由那些经济行为主体(所谓全球运动选手)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所操纵和控制的世界经济的出现和那个旧体系的瓦解。下面一个玩具公司的例子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新的现实情况。这个公司售出“价值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小商品,它们是由独立的发明家和礼品公司创意设计,独立的工程师制图,由香港的零配件公司进行生产制作(香港方面又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程序转交给泰国或中国)和包装,由美国的独立的玩具公司进行营销”。^①

所谓新的事实情况首先是指人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以及越来越低廉的成本跨越空间距离。而这些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由于交通运输体系、通讯交往体系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大规模工业生产成为一种能够由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实践的、常规的能力。第三世界扫除文盲计划和其他发展计划所取得的成功比较突然地被发现。如果说劳动成本始终只是一种成本因素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那么,由于可以

^① 参见罗伯特·莱西:《新的世界经济,民族经济的终结》199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版第107页。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进行生产,围绕这种成本因素所进行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这也是确定无疑的。从这种经济理由出发,由于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从纯技术的角度加以复制^①,对于经济价值的创造来说,进行工业生产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次要了,这就是在全球化方面出现的真正的新事物,它肯定使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

工业化开始时,农业(不是手工业)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当时在交通运输能力方面发生了一场革命,结果使农业变成了一种例行的生产活动,它在国家没有采取关税保护主义措施的地方,到处都陷于价格竞争的压力之下。正如当时廉价的基本食品成为工业生产的前提条件一样,今天工业生产的能力似乎也以类似的方式成为一种促进科学知识发展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在经济上,这无非意味着工业生产——就像农业一样——在国际交换关系中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就像几十年以来为了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到一台冰箱,或一台某种类型的机器,不得不生产越来越多的香蕉和热带雨林木材一样,在未来人们将不得不用越来越多的传统工业产品来购买以设计蓝图、遗传技术专利权、(电影)分镜头剧本,或营销方案等形式出现的实用知识。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察和对其他一系列完全类似现象的观察总结起来,那么可以说,第二次全球化是以经济体系方面的一种动力推动为特征的。经济体系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性、灵活性在飞跃增长。如果企业的成功不再主要是依赖大型工业结构,也就是不再依赖各种生产因素的

^①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计算机软件,参见乌韦·霍伊瑟尔:《无数的世界,数据控时代中社会的瓦解》1996年柏林版第1章。

传统组合,而是取决于各种知识因素的组合,那么,传统形式的资本约束就变成完全多余的了^①。但在凡是仍旧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这种固定投资的地方,它们到处都在衰弱的生产低潮条件下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生产基地竞争。鉴于地方基础设施这种日益削弱的约束,企业可以更多地摆脱民族国家的,或者地方的社会福利标准的束缚,摆脱高额税率的束缚。与此相反,它们对于知识的依赖性却不断增长。掌握革新的科学知识是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这种成功条件并不能通过企业的总部设在这个世界的科学大都市里就一定可以获得绝对保障。

作为对于这种不断提高的灵活调遣能力的补充,这些生产与服务的提供者对于市场的依赖性似乎也大为加强。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些全球性行为主体要努力适应全球化的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的内部推动力似乎也在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激烈的价格竞争。就像约瑟夫·熊彼得早在30年代论述一流企业形象时所证明的,^②在充分的价格竞争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企业的一流效益才能获得大规模的利润。这个使企业获得一流效益的战场已经从生产转移到实用性知识的发明创造^③。因此罗伯特·莱西认为在未来企业中要把三种重要的工作职能联合起来:技术专家、营销专家和战略经纪人,后者负责搜寻和提供合适的人才和可以综合运用的重要的专门知

①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计算机软件,参见乌韦·霍伊瑟尔:《无数的世界,数据控时代中社会的瓦解》1996年柏林版第1章第91—170页。

② 参见约瑟夫·熊彼得:《宏观经济周期》1961年格丁根版第2卷。

③ 已有人对于这个方向进行论证,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197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识。^① 这种相互激发促进的推动力也许能够在时间数轴上最好地反映出来：一方面是产品样式和发展趋势的迅速变化，另一方面是依赖于时间因素的利润差额（在这里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的革新过程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当经济成就由这个全球网络决定的时候，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国家首先搬出为了提高社会福利和福利水平必须进行权力垄断的理由，为自己进行合法性辩护。从历史上看，这起初，只不过意味着使本国领土与其它国家相对而言的特权化。现代民族国家在这里继承了独立城邦国家的传统，例如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推行了贸易垄断政策，然后又把这种政策变为对于威尼斯这一生产基地的垄断。“现代世界体系”的传统统治者——荷兰、英国，最后还有美国都准确地体现了这种特点。它们之所以处于中心地位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公民富于发明精神思想，还由于一种国家的结构化政策，使他们本国公民获得开拓特权化的市场机会。这种市场机会首先是从解放效果中产生的，从现代化观点看来，每一次不平等的贸易结算都包含这种效果（例如用机器出口来换取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进口，或者用专利知识或其他特权化知识的出口来换取工业产品的进口）。从对于战略上重要贸易通道的掌握或垄断中产生的特权化机会也进一步提供了这种解放效果。由此能够一方面“人为地”维持自己产品的特权化地位，从当年荷兰人禁止出口郁金香球茎，到20世纪禁止战略上重要的工业产品出口（机械、电子计算机等）都属于这样一种战略。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对于凭借特权搞到的原料或成品作进一步的加工使本国的财富不断增加。

^① 《新的世界经济，民族经济的终结》第100页。

这种鼓励本国生产基地并使之特权化的政策归根到底是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把它自身利益变成国家目标,也是以国家活动与协调合作的私人经济活动的共同作用为基础的。但这条战略也是以这些行为主体与政治发生固定联系为前提条件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城邦国家的商人就已经拥有民族意识。^①

社会共同体、国家和经济界之间协调合作的基础在于,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渠道和通讯联络技术能受国家基本条件的制约。毫无疑问,对于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还是可以这样说的。在像铁路这种运输工具方面,领土的边界也可以通过例如铁轨的不同宽度很好地标示出来。各国的航空公司也执行着这条传统路线。相反,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在放松控制的金融市场上、在私有化邮局、铁路,或者航空路线上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通过国家权力垄断使本国国民经济特权化的重要机会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对于固定设在某个民族国家的大的和中等的企业都产生了反作用。人们必须把“全国冠军”(罗伯特·莱西语)这个称号的终结,即企业的民族性的终结也纳入这个语境之中。

进行上述考虑之后,也许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今天我们用全球化这个主题词所说明的究竟是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中的哪些变化。这第二次全球化过程并不涉及一种制度变化、一种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变化。第二次全球化不如说是描述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种重心转移,这种转移对于在这一关系领域的选择权和行为可能性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自从“漫长的 16 世纪”以来致力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达到了网络化的程度,这种网

^① 参见费尔南德·布劳代尔:《15—18 世纪社会史,日常生活》1985 年慕尼黑版第 561 页。

络化使经济体系对于各个民族国家和这些国家背后的社会共同体的政治战略具有一定的抵抗力。由于今天不再是以生产,而是以应用为取向对科学知识的综合掌握对于经济价值创造具有中心意义,在这一层面上为了本国国民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干预的能力也随之失去,因为现代知识在原则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来的,摄取知识的障碍最多不过是语言界限。世界上没有什么德国物理学或美国物理学,但是人们用德语或英语公布研究成果。与商品出口相比,对知识传输的阻碍或疏导要困难得多,今天这在许多领域都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如何制造原子弹的知识已经无法保守秘密。只有对获取某些技术能力的途径人们还可以封锁。另一方面,经济行为主体越来越多地获得对于各国经济基地的选择权力。这首先是与下述情况相联系的,即对于各个民族国家不仅要根据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而且还要根据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测试。如果通过选择权无法实现这一点的话,就只能进行生产基地的竞争了。总之,这是世界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依赖关系的一种颠倒。下面从几个方面简略描述自70年代中期以来就逐渐形成的经济与政治之间依赖关系的这种颠倒的重要内容,但不能说是全面的。

第一,从全球性行为主体的角度提出了国家的价格—效益关系问题。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条件下主权国家要抛掉负担,在第二次全球化的条件下它变成了选择决定的客体。只有存在与自由的资本转移相联系的可供选择的生产基地,这种选择才是可行的。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对生产基地的特征,如基础设施、劳动力潜力、税务立法以及其他的国家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并使它们成为选择决定的对象。在各国国民经济之间,围绕投资机会和现代化机会进行着一种竞争。这种竞争自然削弱了一个民族国家推行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或就业政策的所有能力。民

族国民经济这条大船和它的团结互助基础都失去了它的边界,这种团结互助的基础是把大家都约束在领土之上。这个人所共知的国民经济船队的形象必须要用一支快速的护航舰队来补充,这支船队上的人把一切对于民族国民经济前进具有中心意义的东西,如发动机、船帆、动力原料等等,都从一只只民族经济大船上拆卸下来,搬到护航舰队,并在那里重新安装起来。

按照欧洲联盟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区域性跨国经济空间难道不是对于经济全球化过程所作出的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答案吗?就在这里创造出拥有大量居民和庞大购买力的一元化市场而言,这肯定是一种恰当的反应。但欧洲的例子还表明,这个效果往往必须要以政治灵活性的丧失为代价,这也会削弱反应能力。而一个政治上有行动能力的欧洲市场也已经无法按照一种与这些全球性经济行为主体相对立的、老的再分配政策或稳定政策模式进行政治上的纠正工作。

第二,民族国民经济不断地被社会学家分析为以各种利益的组织力量为基础的权力交织体。赖因哈德·克雷科尔示范性地阐述了联邦德国这样一种不均衡分配的组织力量模式,它的中心是由有组织的企业主、有组织的工人和国家所组成的一种职团主义的三角。^① 这样一种模式的前提条件始终是,在围绕一大锅资源——本国的社会生产品——进行分配斗争时,参加斗争的各方都一致同意,不能由于分配冲突而使经济循环的运转能力受到过大的损害。^② 但是这恰恰已不再是全球性行为主

① 参见赖因哈德·克雷科尔:《社会不平等的政治社会学》199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第16页。

② 参见拉尔夫·达伦多夫:《摆脱乌托邦的道路》1986年慕尼黑版第271页。

体的竞赛规则。他们运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再要求团结合作的权力,这就是选择权力。这种选择权比组织力量更加优越,因为它可以把后者作为工具来使用。对于全球性行为主体来说,一国范围内利益冲突的结果只不过是仅供选择决定的生产基地特征和数据。选择权力的基础是一个“全球神经中枢系统”,它保证使资本转移就像原料资源转移一样尽可能地畅通无阻。在这里所谓效率可以解释为把时间上的拖延、空间上的障碍减少到最低限度,把跨越空间距离的资本转移、信息转移以及商品转移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对于这个新的现实情况来说同样典型的是,一国范围内的利益冲突,例如劳资伙伴之间的冲突被排挤到全球化活动舞台的后面,它使得谈判和分配的活动余地变得越来越狭小。

第三,民族国民经济是受到文化传统影响的,而对于全球性行为主体来说,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他们必须摆脱这类条件的限制。但是他们不能因此而不受任何约束,而是例如要被纳入一种全球化的专家文化的关系网络之中——只要他们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的人”的话。罗伯特·莱西认为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富人居住区的发展趋势,在它的周围又形成了日常服务行业人员的移居地带。^①人们也可以设想,特别是在那些全球化大都市,这样一些居民区通过人际关系在全球范围结成网络。其他类型的网络至少也有可能变得重要起来,即凭借宗派成员、凭借对于黑手党组织或者前现代意义上的宗族忠诚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人们对于全球性行为主体的这样一种约束和忠诚之所以发生兴趣,就是因为对于全球化问题所作的常见反应是呼吁团结互助。至于这种呼吁在新的精英那里能否受到欢迎,

^① 《新的世界经济,民族经济的终结》第301页。

则是很成疑问的。

第四,第一次全球化已经被描述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区域性的权力不平衡和市场现代化程度不平衡。古老的帝国突出地显示出这样一种努力,要在它所统治的全部版图上建立一种尽可能相同的、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条件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完全集中在处于经济中心地位的国家。在这个狭窄的领土范围内,实行的仍旧是建立一种区域性均衡的基础设施的理想,如联邦空间法规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但是自70年代以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明显地恶化。在第二次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必须考虑到进一步集中化的趋势。对此,全球性大都市已成为一种模式。萨斯吉亚·萨森证明,目前,那些发展得非常好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例如纽约、伦敦,或者东京这种全球性大都市中。^①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论述得并不十分清楚。人们可以设想,在这里,很古老的空间集中化机制仍旧发挥作用,尽管在数据高速公路的时代,它的强制运转能力会逐步失去。对于这个发展趋势绝对不能低估,所谓“近海中心”的未来,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海中心是些岛屿,也许还是一个自然天堂,无论如何是一个逃税的天堂。存在着促使它们出现的确确实实的利益。在这里集中了资本,将来也许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行为主体把他们的住所移到这里,他们从这里指挥着那些变化不定的生产基地的工作。对于这样一种近海中心的公民权利自然必须以一种新奇的方式作出规定。例如,今天只有在一个人能够证明有50000英镑可支配的年收入时,他才可以获得马恩岛的居住权。

① 参见萨斯吉亚·萨森:《世界市场的大城市,全球性城市的新作用》199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这样一种空间集中化的现实合理性首先在于,在这里基础设施现代化以及业余文化现代化的轮子可以旋转得快得多。两次全球化的阶段——第一次全球化与第二次全球化——都与这样一种通过空间集中化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密切相关。例如战后繁荣正是以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脱钩为前提条件的。这条通往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道路很可能导致与几个庞大的西方工业社会脱钩。与战后繁荣完全不同的是,那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这种发展中获得好处。

第五,在收入分配方面,一批新的高薪精英似乎已经固定形成,他们不再与我们熟悉的传统职能权贵,即政治界、经济界、行政管理机关、军事界的高层人物有什么关系。罗伯特·莱西把这些新精英的特点概括为信息分析家。^① 他们显示出强烈个人主义化的生活风格。从莱西的描述中人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信息分析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个人主义化生活方式的典型物质资源,而且他们的劳动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非常符合个人主义化特征:在加工信息和面对各种机会时所表现出的很高的选择性,个人生活的开放性,积极进行各种时间有限的联系等。对于这些新精英来说,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很典型的,即在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过渡几乎无法固定下来。

第六,直到不久以前,专业人员还十分肯定地认为,劳动的前途在于发展服务业。难道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不能够实现服务社会吗?哈尔穆特·豪泽曼和瓦尔特·齐贝尔的调查研究证明,服务工作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可调控的量。^②国家的

① 《新的世界经济,民族经济的终结》第251页。

② 参见哈尔穆特·豪泽曼、瓦尔特·齐贝尔:《服务社会》1995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

活动或经济上的放松控制都是在服务行业中创造劳动岗位的非常适当的手段。然而,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恰恰是那些与公共部门和大宗需求有关的活动余地大大缩小。鉴于变化了的基本条件,关于第三产业化的辩论可能会再度展开。

(张世鹏 译)

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

乌尔利希·贝克

“您是干什么的？”在一次社交晚宴上——独具特色的平房小别墅，意大利风味的烤羊腿，交际气氛充满了嘲讽的意味——对这个问题人们不是用业余爱好（如“色情文学”）、黄道十二星座（如“白羊座”），或者如迄今流行的那样，用自己的职业称谓来回答，而是用自己目前所处的失业等级来回答。人们在劳动局相遇时也已经分不出什么阶级界限了。

这些“效率精英”的成员们（自由民主党的专业术语），努力以嘲讽的态度对待失业后寻找工作时所遇到的荒唐事和屈辱。一位女教师向她的听众诙谐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劳动局要求她去听“我怎样写一封求职信”的讲座，而她自己恰恰不久前还在开设这一讲座。一位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生物学家笑得流出了

* 本文发表于《明镜》杂志 1996 年第 20 期。原文副标题为《乌尔利希·贝克论政治神话，全球化经济与民主的未来》。作者乌尔利希·贝克，51 岁，德国慕尼黑社会学教授，《风险社会》一书的作者。

眼泪。他模仿接待他的人事头头,这个人说起话来洋相百出,毫无条理。而故事的关键内容在于由于他的专业水平过高而被拒绝给他安排工作。

长期以来,在劳动市场上没有保障的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下层阶级”。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谋生的职业”正面临灭绝的危险。一个价值世界——以职业劳动为中心的社会正在随之消失,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资本主义正在取消劳动,失业不再是边缘阶层的命运,它潜在地威胁到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但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摆脱自己对于就业和民主制度的责任时也就会挖掉它自身的合法性。在一位新的马克思把西方从沉睡中唤醒以前,人们还是要捡起早已过时的思想和模式来研究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契约。对于这个超越了劳动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前途,人们必须重新论证。例如曾是就业乐土的英国目前只有三分之一有就业能力的居民是在传统意义上充分就业的(在德国,这个比例始终还在60%以上)。而20年前,这两个国家充分就业人员比例都曾在80%以上。被当作灵丹妙药的劳动就业灵活化只能掩盖和拖延失业病,而决不会使它痊愈。相反地,失业和无法清楚了解的部分时间劳动、无保障的就业关系和还属隐性的失业后备军——所有这一切都在增长。换句话说,职业劳动总量在急剧减少。我们正在快步跑向一个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而且在世界上所有后工业国家都是如此。三个神话遮住了人们的眼睛,阻碍了对这种形势所作的公开辩论。第一,所有这些都太复杂了——无法看透的神话。第二,即将来到的服务社会的繁荣将会使劳动社会得到拯救——服务产业的神话。第三,我们必须,而且只要把工资成本降下去,失业问题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成本神话。

一切东西都互相关联(即使不那么密切),并且就这一点来说是无法看透的。这种说法对于全球化强制下的劳动市场发展肯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对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特别是迈因哈德·米格尔向在德累斯顿举行讨论大会的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自由州未来问题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国际纵向比较研究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这一研究报告,劳动因素在若干世代是不断升值的。70年代中期发生重大转折。自此以后到处都可发现职业劳动在消失。这或者直接表现为失业(如德国),或者被指数不断增长的“混合就业形式”所掩盖(如美国和英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的供给上升(也是由于全球化)。标志职业劳动日益减少的两个显示器——失业和非规范劳动——已发出了警报。

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已不再是劳动的再分配,而是失业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也被失业与就业的一种新的混合形式所掩盖。因为官方把这种新的混合形式当作“(充分)就业”(有期限劳动、微量劳动、部分时间劳动等)。所谓就业天堂的美国和英国恰好也是如此。在那里,生活在劳动与失业之间的灰色区域的、经常不得不满足于一种饥饿工资的人长期以来已构成多数。

许多人自欺欺人,避而不谈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劳动社会这碗汤变得越来越稀薄的事实。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居民不过只是一种无保障“劳动岗位”的拥有者。对于他们来说,几乎谈不到什么(长期的)生活保障。

政治家、各种机构,还有我们自己都总愿意在充分就业这个虚幻的概念世界中思考。甚至建设储蓄银行、保险公司的各种协议也都建立在人们都“从事就业劳动”,并且拥有一份长期收

人的假设之上。而迅速扩散的“既不一也不”的情况——既不是失业者,也没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却不能纳入这一刻板公式。

母亲为了照看她的子女而放下了劳动岗位,然而,她所遵循的三阶段模式已不再适用。第三个阶段——在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家庭以后,母亲重新回到职业工作,这是以充分就业的幻想为前提条件的。我们抱怨“大规模失业”,并且假定,一个成年人的自然状况是直到退休年龄,一生都能从事整日制劳动。民主德国正是在上面着重说明的一个劳动社会。而今天人们却不得不宣布这些新的联邦州存在成片的失业。

许多人相信,希望并且祈求服务社会能够拯救我们摆脱失业恶魔的威胁。这是第三产业的神话。各种计算与反计算还要经受未来的验算。肯定会出现新的劳动岗位。但是目前却恰好完全相反——如社会学家沃尔夫冈·博恩斯所证明的——在服务业领域,传统的、有保障的就业核心正成为一场刚刚起步的自动化浪潮的牺牲品。例如电子计算机系统控制的银行支付流通将导致许多银行的分支关闭。电讯局希望通过扩大供应面节省大约 60 000 个工作岗位。整个职业集团,如文书、打字员、速记员都可能消失。

即使出现了新的劳动岗位,在信息时代这种劳动岗位很容易向各处转移。许多公司——美国快递公司是最最近的一个例子——正把全部行政管理部门迁移到工资便宜的国家(这里指南印度洋地区)。

信息社会的预言家宣称,甚至对于仅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来说,支付高薪的劳动岗位将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令人清醒的现实却是,从事数据加工的大量劳动岗位都是工资很低、单调乏味的工作。国民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劳动部

长罗伯特·莱西写道,信息经济的步兵是一大群数据加工人员,他们坐在与全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库联系的计算机终端面前工作。

目前辩论中的关键性幻想还是成本神话。越来越多的人被一种已经受到激烈批评的信念所传染:即只有急剧地降低劳动成本和劳动工资,才能走出失业的苦海。在这里,“美国道路”正在闪耀着光芒。

但是人们只要把美国与德国相比较,就会看到美国的“就业奇迹”的破灭。高级熟练技术的、目前仍是有保障的、而且薪金很高的劳动岗位在美国只有 2.6%,这个比例与德国这个工资最高的国家相同(经济合作与发展国家组织 1996 年 4 月统计);差别就在于非熟练技术的、低薪劳动岗位的增加。但是(!)在我们这里,比方说,如果人们白天为了每小时仅仅 7 马克而工作,晚上睡在厚纸板箱里——这是要作为“社会问题”看待的。而且如果拿劳动生产率来比较一下,美国“方案”的魔法就会被全部解除。劳动生产率在美国近 20 年来只增长 25%,相反地德国增长却高达 100%。最近,一位美国同事问我:“德国人是怎么搞的,你们的劳动时间最短,生产却最多?”

这准确体现了信息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导致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条件——这就是高失业率的生长。然而,谁也不要上当。这个“唯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只以赢利为目标,它要把就业者、(社会福利)国家、民主制统统排除。这个资本主义也就取消了自己生存的合法性。在这些全球安家落户的公司之间利益冲突日益增长的时候,这些公司使自己从两个方面摆脱了与费用昂贵的国

家的关系；劳动岗位与社会福利税。把失业和发展文明的代价都推给别人。只有两只患了慢性病的臂膀——国家的这只臂膀和就业者私人的这只臂膀——为富人得以参与享受的事物承担经费；第二次现代化的奢侈——高度发达的中小学与大学教育、高效率的交通系统、自然风景保护、安全的公路、五光十色的上流生活。

如果高度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的价值核心瓦解，它也就摧毁了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之间的历史联盟。在欧洲和美国，民主制是作为“劳动—民主制”而问世的——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民主制是建立在参与职业劳动的基础之上。公民们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劳动方式挣钱养家，然后才能够使政治自由权利获得生命。职业劳动始终不止是私人生存、而且也是政治生存的基础。总之，这根本不是“仅仅”与几百万失业者有关的事情。这也不是仅仅涉及社会福利国家的事情，或者只涉及阻止贫困化的蔓延，或者只涉及到实现社会公正的可能。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大家。它涉及欧洲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制。

西方把资本主义与人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的做法，绝对不是一个人手头较紧时可以节省的那种“社会善行”。涂上社会福利色彩的资本主义不如说是作为对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经验和共产主义挑战的回答而争取到的。这是一种实用的启蒙行动。这一行动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之上，即只有当人们拥有自己的一所住宅、一个有保障的工作岗位，并从而具有一种物质前途时，他们才能成为公民，学会运用民主，并使之生气勃勃。这个简单真理就是：没有物质保障就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制，大家就会受到新老极权主义的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威胁。

人们必须使充耳不闻、毫不吸收历史经验的新的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自由的伪民主主义者牢牢记住,他们崇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民主育的一种形式。市场本身恰恰不能为它自身提供辩护。这种经济方式只有在它同物质保障、社会权利和民主制度交互发生作用的时候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谁只关注市场,谁就会在毁掉民主制的同时,把这种经济方式也摧毁掉。

今天,没有人还在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谁敢这样做呢?资本主义唯一的潜在敌人——就是这个惟利润是图的资本主义本身。劳动市场的噩耗在华尔街被当作胜利消息。在这背后的算计是很简单的。如果劳动成本降下来,利润率就会升上去。

然而,这种“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变得很明显了。跨国康采恩的经理们把行政管理机关移到南印度洋地区,却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家资助的、欧洲最好的大学里。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自己搬到他们创造了劳动岗位、并且付低额税款的那些地方去。

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有资格享受昂贵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基本权利,但是他们又破坏了维持上述基本权利的国家财政。他们进剧院,他们享受花费大量金钱才得以保护的自然风景,他们在相对说来没有暴力、没有刑事犯罪的欧洲大都会游来逛去。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自私自利的经营和以赢利为目标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这种欧洲生活方式日趋衰落。是否可以请问一下:如果欧洲的国家制度和民主制度在财政上已无法维持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打算在哪里生活?

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用越来越少的劳动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而是由于它阻碍缔结一个新社会契约的倡议而剥夺了自己的合法性。谁在今天对失业问题作了深入思考,那么他就不会在关于“第二劳动力市场”、“部分时间就业攻势”、所谓“非

保险福利”(指事先没有按规定按期交纳保险费,而由政府或保险机构特别批准发放的社会保障福利金。——译者注),或者关于患病期间工资是否继续支付的斗争中沦为旧观念的俘虏,迷失方向以至失败。而是必须质问说:怎么可能会有脱离劳动社会保障的民主?对一些似乎是终结和衰落的表现,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为 21 世纪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开辟道路的新思想和新模式的诞生时代的征兆。

已经过时的工业社会世界中两个雇主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与国家。而未来两者都将缓慢地失去这种职能。资本主义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并将日益成为“没有劳动的”。对于国家的财政金库来说,“空虚”二字甚至是一种亵渎神明、打了很大折扣的说法。人们可以为此悲叹,否则就得建立、塑造使民主的生活形式生气勃勃的新的活动中心和认同中心:公共工作。如果说,公开性是一门艺术,能使不知情的人们卷入一场关于他们自身事务的长期讨论的艺术,那么公共工作就是一种在这些言语之后继之以行动的艺术。它指的是什么呢?

积极的同情心:他们自称“醉心于废气问题的傻子”、“清除生态污染的扫帚”或“装尸体的罐子”。推动他们的与其说是对毁灭和衰落的忧虑,而不如说是对多数人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深入思考这一情况感到愤怒。这种积极地反对社会冷漠的斗争拥有多种目标和表现形式:帮助老年人、残疾人、无家可归者、艾滋病患者、文盲、被社会所抛弃的人的工作,以及妇女之家、绿色和平组织、国际大赦组织等方面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公共工作”即是一种政治,即对他人的关怀,也是一种日常的合作。

实践的批判活动:许多律师、税务顾问、医生、经理、行政管理专业人员希望有朝一日换一个方式来发挥他们的职业能力,

对公众意见和立法施加影响,为自助小组起草经济计划,调查逃税情况,向负债者提供咨询,揭露隐藏的危险等等。为什么不用奖金和勋章去奖励公民反抗运动(当然这应该委托男女公民们来颁发)?

积极的民主:公民参与、分散化——许多城市和乡镇的行政管理机构中爆发了一场小型的文化革命,它不仅许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会加强民主。一位市镇议员指责说:“这些公民不过是建立了一个附加的议会。”然而关键恰恰在这里:民主是一种越吃越有滋味的东西。自由会创造、加强和扩大自由。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投资,必须授予它各种职权和权利,而且在所有的方面:技术的(信息媒介)、经济的(基本资金筹措)、高等教育的(颁发文凭证明、而且是在劳动市场生效的证明)。

“职业劳动社会”与“市民社会自我组织”各自不同的价值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两者兼顾的关系。关键在于未来应允许正式职业工作与自愿的自我组织相互混合渗透,减少两个部门之间法律上的流动障碍,创造退出和改换工作部门的可能性(以一年、几周、几个月为周期)。

由于这种方式而出现了两种可能。第一,那种把很有意义的、得到公认的公共工作与职业劳动等同起来的垄断将被打破。对劳动市场的压力得以缓解,失业得以减少。第二,由于公共工作而在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内建立起对抗这一四分五裂社会的、新的政治行动中心和认同中心。于是就会产生一种“团结互助的个人主义”的(物质的与文化的)基础。而在不久以前还流行“你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你的民族(你的阶级)高于一切”这种口号的国家里,这种团结互助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这个积极社会模式中并不会像人们不断建议的那样用无偿劳动取代有偿劳动。这种模式最终还没有脱离劳动社会的禁区。它只是向前跨越了一小步。取代职业劳动的是另外的劳动(包括在家工作和家务劳动)。

与此相对,汉纳·阿伦特以前所做的一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他提出商贸活动来与劳动对立,后者的目标和产品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它在日常消费中被消耗掉了。而商贸活动却会使我们回忆起历史,它在与他人的共同作用下启发思想并且创造政治机构。按照这种看法,正如亚列克西斯·托支维尔在150年以前所预见的,对于这个分化解体的世纪,必须不是通过削减自由,而是通过取得更多的自由而加以反对。因为正是政治自由,才会促进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团结。对此有四种反对意见。它们却使这一年看起来是毁灭性的、美好思想的棱角更加鲜明,而且更加符合实际。

第一,这个建议不是由于这个陷入自私自利的社会而已经失败了吗?第二,谁会为此慷慨解囊呢?第三,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还能实现吗?第四,“创造性失业”(伊凡·伊里希)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幸吗?摧毁了职业劳动难道不会最终把人本身的特征完全毁掉吗?

这个受到多种责难的“自私自利的社会”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呢?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伍特诺指出,没有对他人的自愿的热情关怀,整个现代社会将立即崩溃。现在有8000万美国人,也就是说,45%的18岁以上的居民平均每周拿出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投身于自愿帮助他人的工作和社会福利目标,从货币价值角度来看,这也就是说,这些工作量每年折合1500亿美元。

这个研究同时表明,有75%的美国居民把团结互助、帮助

他人的愿望、共同幸福的价值取向与自我实现的动机、职业成就、扩大个人的自由范围放到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也就是当那些事实上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即自我实现和为他人而生存互相排斥的时候,才说得上“自私自利”的社会。

只有那些错误地把这种热情和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等同起来的人才会认为在我们这里情况是不同的。青年人和教会、政党、工会及各种协会组织越来越疏远了(例如英国保守党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但是恰恰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公民倡议活动却由于大批青年投身参加而受到鼓舞。

这样一些青年人,他们努力逃避各种枯燥无味的集体组织,但是热情投身于耗费精力的环境保护(超过80%)。有73%的青年人认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是中心社会问题,并愿意自己为此能做些事情。有71%的青年人要求给残疾人更多的权利,有71%的人对女权主义给予积极评价,并且相信,它对于双方——男子和妇女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至于说到柏拉图早就批评过的青年人的那种“价值衰落和冷漠态度”,那么这种态度也是以制度性的“热情封锁”为基础的。青年人是被赋予权利的,但一旦他们想利用这些权利,它们就受到了限制。公民倡议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的压力。政府没有真正授予权利。“热情封锁”是指:许多人之所以不热情投入,是因为他们有了经验,“在这方面反正是劳而无功”。

谁想投资于“社会资本”,对这个“积极社会”解囊相助呢?我们联邦共和国私人家庭户头上总计有4万亿马克,分配是极其不平等的。10%的家庭占有将近49%的私人财产,还有50%的家庭仅占有2.4%的私人财产。

企业主发现了点石成金的秘诀。新的咒语是：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加上没有税收的资本主义。政府从公司税、企业利润税中所得收入从1989年至1993年下降了16.8%。它们在国家全部征税收入中所占比例几乎减少了一半（从6.4%下降到3.0%）。与此同时，企业利润率却经常以超过10%的比例增长。这也反映了全球化权力竞争。许多企业主成为虚假的纳税人。

资本是流动的，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相反地，国家总是要受到领土的束缚。跨国公司的产品被分解为不同的生产阶段，被分散到许多大洲和国家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地方化日益成为问题。但与此同时却为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的战略开辟了道路。

生产国际化向企业提供了两种战略好处，一是在昂贵劳动力和便宜劳动力之间进行一种全球性竞争。二是各国的纳税标准和税务监督人员相互竞争，相互拆台。人们可以把企业的这种新权力看作是把市场经济法则成功地移用到政治领域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形势是非常有刺激性的。由于对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基金的利用（昂贵的大学、医院、交通系统、司法审判、科研经费）并不受纳税地点的约束，许多公司企业因此能够把纳税负担减少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又可以在提供最好基础设施的国家安家落户。

可以相互毫无关联地自由选择投资地点、生产地点、纳税地点和居住地点。许多企业利用贫困国家很低的纳税标准，同时享受着富裕国家的高级生活水平。他们在税金最低廉的地方纳税，但生活在最美好的地方。他们成为昂贵的基础设施福利的搭便车者。

由于产生了导致巨大社会冲突的诸多因素。第一,出现了假纳税人和真纳税人(包括就业者、没有这种新的流动能力、无法摆脱税务当局传统控制的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对立。后者是“蠢人”、是全球化的输家。

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些被政界所宠爱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斗剑士却在暗中破坏国家权威。他们要求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却逃避向国家纳税。这些新的在纳税时玩弄手腕、技术高超的专家——以一种合法的却又是非法的方式暗中挖掉了公共福利、政治和国家的基础。就此而言,这种死心塌地地相信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前状况与那些推行合理化的人一样,具有自杀的讽刺意味,后者为自己的被解雇作了充分准备,并且予以执行。

结论只有一个,对这个社会不公正源泉的禁忌必须彻底祛除,而且为了政界自身的利益,甚至应使它成为公众辩论的对象。分配问题已被提到日程之上。这些全球化的获利者必须重新对公共福利承担义务。社会保障体系在若干方面需要改革。但结论却是悖论式的:不是减少钱,而是要增加。但是这些钱要正确使用和分配!对公共工作的投资应当是:用少量的投资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社会繁荣起来,使公共财富增长起来。

这里很清楚,我们需要对“财富”重新做出界定。它必须也包括诸如社会参与、政治自由等项指标。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它的经济很繁荣,但却因此使人们大量失业,被排挤出局,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富裕社会”,而只是残缺的“富人社会”。

这里的秘密是,谁应当为此解囊支付资金?对此有四种实验性的考虑。

“减税模式”。对于那些热心投入公共事业的人必须(较大幅度地)减少纳税数量(就像现在已经做出公益捐献的人,或者

公益团体都会得到免税承诺一样)。反对意见则认为,这种模式在家庭收入层面上是以从事职业劳动为前提条件的。在这一方面那些工薪收入本来就很高的人有可能由于热心投入公益事业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以税收作资金的基本保障”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对那些参与自愿的自我组织的人应颁发某种“公共奖学金”(萨克森已经开始这样做)。

“在失业与参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选择”的模式。据此,失业者在未来可以有一种新的选择。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或者继续失业,或者参加自愿的自我组织工作。这种模式的效果是令人吃惊的,它最终将导致消除失业,不是借助于创造新的(部分时间)工作岗位的办法,而是借助于使自我组织团体活跃起来和长久维持下去。

如果说,“美国模式”的结果是充分就业与“有工作的贫民”相结合,那么德国的(欧洲的)模式的目标则是把职业劳动与得到基本资助的对市民社会的参与结合起来。热心投身于自我组织的那些人不再受“劳动市场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不再是失业者。他们是热心投身于普遍福利的积极公民,为此获得一种(时间上有期限的)基本保障。

通过税收筹集“向所有人发放的公民金”的模式。人们必然会对公民金(也称作“负收入税”,是一种把社会划拨福利与征税结合起来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工薪较高的人要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收入税上交,对于低收入者和没有收入的人,为了保障他们最低限度生存,可获得一笔作为“负收入税”发放的福利金。——译者注)的数额进行争论。许多人担心这种基本保障方式注定地要把那些受到威胁的人——妇女、穷人、残疾人排除到劳动与社会之外。因此,重要的是,公民金不是无条件发放

的,而是要和积极参与社会所提出的各种活动相联系。

这样一种世纪性的改革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首先开始吗?如果前面所做的基本诊断正确的话——资本主义变成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并且造成失业,那么它涉及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挑战,所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或迟或早都会面临这种挑战。但是,对这个问题首先做出切实可行的回答的那个国家,也就是正在应付民主所面临的威胁的国家,从长远来看,无论在任何方面(包括经济方面)都会领先。

最后是如何理解所谓职业劳动的认同垄断问题。今天经验研究已经证明,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立场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寻求两者兼顾,即除了职业劳动以外还能热情投入其他事业。如果这种努力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奖励,并与职业劳动协调一致,那么毫无疑问这将促进人们对它的认同和社会团结。

本人所做的上述背景说明最终要导致这一辩护性结论:必须把社会自助行动和自我组织这种看不见的实践活动变成看得见的。必须赋予它们以经济的、组织的和政治的实力。只有在我们对市民社会进行投资,并可以说使民主制进一步民主化时,才能办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支持市民社会的联盟——必要的时候要反对劳动与资本。但这个联盟应当包容一切关心民主制的人。

(张世鹏 译)

面临金钱与自然挑战的劳动社会*

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

一种趋势,而且是巨大的趋势,以相当严密的规律性^①显示出未来劳动社会将如何发展。在劳动生活的进程中工作越来越少,失业却越来越多,手工劳动越来越少,“对脑力的投资”越来越多,^②非物质性的服务越来越多,物质生产越来越少。在不可遏止的全球化进程中劳动过程失去空间制约(生产基地的固定性),劳动岗位经常变化,由于必然产生人员流动化,必须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任务,终身的不断学习成为发展前景。在“2000年的工厂”中高技术普遍推广^③——因此旧的熟练技

* 本文发表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15期第16—24页。作者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1938年生,博士、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评论员,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专业政治经济学教授。

① 沃尔夫冈·克劳德:《劳动的未来,经济与社会基本条件》,载于《工会月刊》1994年第12期第764—775页。

② 《脑力投资》,载于《明镜》杂志1995年第3期第86—98页。

③ 彼得·布罗德纳:《2000年的工厂,在未来工厂中替代选择发展的崎岖道路》1986年柏林版。

术贬值,工业社会的集中“大批劳动力”的生产场所变成了分散化、电子技术网络化、囊括世界的协调合作体系。由于设在家里的劳动岗位明显增多,工作与居住的传统分离状态消失了,加强了协调合作和个人的责任;作为现代主义机遇的个人主义化;那些拥有自主计划、处置职权的人工作内容更加丰富,而由于“电脑同事”、“优化操作”的统治,创造性劳动的范围缩小了,因此另一些人的工作日益变得单调乏味。

对这种发展趋势的描述可以继续下去,可以更细致,还可能由于出现反向运动过程而作出修正。结果是一幅关于“明日劳动社会”的令人喜忧参半的图景。如果关于未来失业增长的预言是正确的话,那么把这个明日社会称为“失业社会”也许更为恰当。“劳动社会”的主要角色,蓝领工人、白领职员在这期间——如《资本论》第三卷所说——难道不是要被精明的“货币财富的占有者”所取代吗?后者是可以“让金钱为自己工作”而不再弄脏自己双手的。

事实上,自70年代中期西方工业国家结构危机开始以来,劳动关系就发生了引人注目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对变化的原因、现象和发展趋势作出鉴定是很困难的,也因此是并非毫无风险的。例如德意志银行用多页广告在联邦范围内广泛宣传关于“劳动的未来与未来的劳动”的辩论就是一个证明。^①它对银行声誉的贡献肯定要大大超过对于未来劳动社会的科学认识和政治启蒙所作出的贡献。

^① 参见沃尔夫冈·弗兰茨、赫伯特·吉尔施、汉斯·金格、里查德·拉亚德等人1994年11—12月在几家跨地区的日报上发表的专题报告,或者这些报告的文集,即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国际交流公司主编的《未来的劳动,劳动的未来》1994年斯图加特版。

一、劳动概念的维度

对于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即对于劳动概念取得一致意见有时还是有益的。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描述为劳动社会并不错(我们必须作出补充,因为对于这个命题来说,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它还被描述为“矿物燃料化社会”^①)。自从威廉·配第或大卫·休谟以来,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都把劳动看作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福利和财富的来源。1776年亚当·斯密从关于劳动分解和劳动分工、关于可以使生产率极大提高的劳动社会组织的详细论述入手,开始了对“国民财富”的研究。这项研究成果成了大卫·李嘉图为自由贸易即劳动分工跨国扩展进行辩护的、不容置疑的基本论断。他认为,深化的劳动分工会提高所有参加自由贸易的民族的富裕程度,不管他们是技术的先锋还是落伍者,也不取决于一个民族配备了什么样的(生产)要素。直至今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还是经济学理论的最受尊崇的、最少受到质问的基础。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生产性劳动”概念作了更加准确的界定。^② 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并非任何劳

① “矿物燃料化社会”或“矿物燃料化”概念是指现代工业社会对于矿物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依赖性。它们是工业社会技术系统的“动力材料”,也是它的社会组织的一个成分。“福特主义”工业社会的标准产品——汽车就证明了这一点。详细参见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福利或掠夺环境的代价与新的世界(无)秩序》1992年明斯特版。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

动都是生产性的,即对财富生产作出贡献的,只有那些生产剩余价值,并由此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理论上揭示劳动的二重性——通过劳动使原料和能源系统地变成使用价值,并且形成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它使人们能够对劳动的逻辑作出更加贴切的界定。劳动不仅仅是人们与自然的积极斗争,即有意识和目标明确地使用工具,从而把自然原料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借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它同时还是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的,即具有某种特殊社会特征的增值行动。在这种特点中,第一,劳动要受异己因素的支配;第二,它诱使人们对于劳动的自然条件,对于社会交往形式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鉴于这种情况,汉斯·伊姆勒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即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经典作家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是“无视自然的”^①,但是,在这里他没有把与自然界打交道并使自然界日益退化的社会形态同对于批判对象本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批判者充分区别开来。

总之,第一,劳动是对于自然材料和能源所进行的一种目标明确的、工具化的改造。第二,在劳动分工中,它是社会化的、积极的交往活动。^② 第三,在资本主义意义上,劳动是增值行动、生产性活动。所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工人在再生产资本时总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即工人自身的依附性。工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收入,才能赡养他的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是谋生工作,劳动在正常情况下是雇佣劳动,不是某种

① 汉斯·伊姆勒、沃尔夫·狄特里希·施密特:《马克思与自然问题,一次科学争论》1984年汉堡版。

② 于尔根·哈贝马斯:《技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1968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

为自己的工作或为公共事业的工作。

劳动的这些不同侧面之间的相互关联是高度动态的：由于使用工具的活动使人们外在的和内在的特性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工具越强有力，这种变化也就越大。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近几十年内，“环境”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①——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工具化劳动的影响程度的扩大既涉及雇佣劳动的谋生性质，也涉及作为增值行动的劳动本身。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随着原料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增长），提高工资的余地也在扩大（在每一轮劳资协议谈判中，这个论据都被拿来应用）。^②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资本的生产率、对于利润比例和经济增长都施加着积极影响。在国际比较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件产品的工资成本不断降低，因此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会相应改善。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它是劳动社会中工会、企业主和政府这三方活动主体之间共同的“生产利益”的基础。^③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改革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在本世纪内，在保守的顽固立场面前，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超越制度的企图面前，这种改革政策已被证明具有历史性的强大力量。

① 参见克莱夫·庞廷：《绿色的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1991年纽约版。

② 参见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在欧洲范围内面临挑战的工会》1993年明斯特版。

③ 胡果·辛茨海莫尔：《劳动法和法社会学》197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科隆版。

二、手工工场、工厂、“福特主义”

如果在一个给定的劳动分工制度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到限制,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例下降,如果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恶化,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显然,在这种形势下必须打破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桎梏。通过技术革新、劳动组织变革、提高生产的紧张程度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并最终形成一种“生产率的奇迹”,如专家鉴定委员会在70年代中期危机以后关于整个经济发展所确认的那样。^①然而,在大危机爆发时,人们能把对劳动社会进行深刻有效变革的任务提上历史日程。那时,为了创造一种“劳动生产率的奇迹”,单纯技术和组织方面的改善已经很不够了。必须对劳动社会进行改组,对它进行“改造”,以便使所谓X效率的潜力发挥出来。^②

① 参见《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196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鉴定》斯图加特版第50—54页。

② 与资金分配所产生的效率不同,X效率描述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改善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参见哈维·莱本斯坦:《资金分配效率与X效率的对比》,收入埃伦斯特·迪尔主编的《增长理论》1978年达姆施塔德版第331页。在新近发表的关于“系统的竞争能力”的论文中,指出了所有能够对现有制度劳动生产率施加影响的诸多因素的总和以及为了实现这些因素所必须满足的除技术效率和组织效率以外的许多前提条件。参见克劳斯·艾塞尔、沃尔夫冈·席勒勃兰特等编的《系统的竞争能力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与对政治的要求》1994年柏林版。

马克思在分析协调合作的各种形式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写道：“手工工场”作为协调合作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够“不费资本分文”提高劳动生产率。^①手工工场的劳动分工自然完全建立在主体因素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熟练和工人与生产过程打成一片的基础之上。但手工工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极限同样很快就显露出来——首先表现为缺乏纪律，而技术革新与社会革新则历史性地产生出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分工。起初机器是在手工工场中用手工工艺制造出来的，但现在则成为工厂体系的基础，“大工业”的基础。

此时劳动分工以及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可能性与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对劳动的投入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少了。这一原则已经被并入作为一个体系的“客观生产条件”、生产手段之中。手工工场所缺乏的劳动纪律现在由于机器的强制而严格得“像兵营一样”。机器是劳动过程和操作的最好监督人。原来手工工场制度中的熟练技术工人现在降级为工厂和机器统治下的“人手”。^②机器不仅预先确定了生产过程的速度，而且也规定出日常生活的节奏。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随着妇女、儿童投入生产过程而陷于瓦解。这个瓦解过程长期持续下去，直到社会能够适应工业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统治的这些新的挑战为止，直到人们通过生产建立起保护劳动力的社会机构，并且在这以后“以改良主义方式”对它们加以捍卫为止。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70页。

② 参见哈里·布拉菲尔曼：《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197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里查德·艾德瓦尔德：《现代生产过程中的统治》199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然而工厂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飞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步伐日益变小。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内在限制可以通过把合理化原则扩大到活劳动方面的办法来消除。这是本世纪初由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的一场变革。^① 阿尔弗雷德·佐恩-莱特尔把“泰勒主义”解释为“在极端悖论式的伪装下进行的一种劳动充分社会化”。^② 因为泰勒主义借助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把人的劳动理解成这样：人的劳动和机器“劳动”都遵循同样的逻辑，只有一种“概念货币”在发挥效力。^③

泰勒制由于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生产(亨利·福特),后来借助支持群众消费的有效需求政策(约翰·凯恩斯)而进一步完善为一种高效率社会模式。社会学中以福特主义为标题对这个模式进行论述。^④ 福特主义劳动社会“体系的形成”绝对不是受到一只强有力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手操纵成的,而是一个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程度进行的、受偶然事件制约的过程,因此是完全非系统化的。在调节理论中,^⑤ 为了强调这个过程中历史因素所占的份额,人们把一个最终聚合在一起、因而颇有效率的劳动社会组织的各种历史形式的总和描述为“捡来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职能条件逐步得到实现,形成了一个

① 参见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企业领导的基本原则》,瓦尔特·福尔佩特等译,1977年魏恩海姆—巴塞尔版。

② 阿尔弗雷德·佐恩-莱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7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55页。

③ 同上,第157、164页。

④ 这个概念在20年代曾为安东尼奥·葛兰西所使用。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196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⑤ 参见米歇尔·阿格里塔:《资本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1979年伦敦版。

协调一致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求规则,以惩戒为手段,强制人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作法都融合进技术预先确定的生产过程中。这个制度吸收了“技术理性”,并非每一次都必须由上面的合理指示、由泰勒主义行为来保障这种理性的贯彻^①。而且已成为战后几十年内工业国家特征的那种工业关系制度的各种机构也出现了:中间层次经济空间中强大的自觉的工会、微观经济中的各种代表机关、宏观经济层次上密密麻麻的关于工资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各种规章,它们在欧洲,伴随着欧洲一体化,部分地在跨越国家的范围内扩展开来。^②

工人与福特主义制度的一体化必然涉及这些工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特点,福特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大规模生产需要有大规模的需求:“如果工人不是理应获得高额工资,也不会支付给他们的。”但低工资也不是改善经营的保障。以上可以说是亨利·福特的座右铭的概括。^③ 没有对工人在两个方向上的社会控制,高工资也不会产生什么好效果。这两个方向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效率,同时把他们培养成好的消费者和公民。流水线和福特主义劳动组织在19世纪中期芝加哥的屠宰场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典型产品就是罐头。它们的大批供应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经济并从而也极大地改变了两性关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于汽车工业,福特主义才声名大振,汽车不像其他任何一种产品。它是新生产方式的核

① 弗·冯·哥特尔-奥德里费尔德:《福特主义,工业与技术理性》1926年耶拿版。

② 然而还没有达到在欧洲联盟内建立一个社会福利联系的程度。参见阿尔特法特等所著的书(并见本书第137页注释②)。

③ 亨利·福特:《我的一生和事业》1923年菜比锡版第139页。

心,新的生活方式——“汽车社会”的焦点。

为了使“经济与技术理性的综合”^①能够成功,也必须发展把收入转送到消费需求中的相应机制。借助科学方法,通过市场调查和广告进行了秘密诱导的尝试。^②但这些秘密诱导者只能动员现有购买力,并且根据供方各家广告战略技巧的高低而在他们之间进行这种购买力的分配。只有通过收入提高,或者储蓄倾向的变化,或者如果同时建立一种信贷体系,使消费者能够预先动用未来收入,才会出现新的购买力。商业消费信贷(除了具有久远历史的消费合作社以外)开始于20年代。但这个制度在二次大战以后才繁荣起来。

大规模的购买力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动员起来的:以前在家庭中所进行的(个人)服务和小规模(生活必需品)生产被在市场上由生产者所出售的、而消费者必须用货币才能买到的商品排挤。^③所有家庭越来越依赖于工资收入。因此正式的职业工作的意义极大地增长。在微观、宏观,及中间经济层次调节劳动与工资的机构也建立起来,它们使工资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一方面与收入增长,也就是消费增长这另一方面协调发展。在目前对高工资和高额工资附加成本的批判中,这一“适应比例”具有很大意义。如果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能在家庭范围内以所谓的自给经济方式进行,如果因此并不是所有生活日用品都必须

① 《实践哲学》第27页。

② 范斯·帕卡德:《秘密诱导者,对一切人的下意识的控制》195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③ 然而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家务劳动所占的比例(首先是妇女所进行的劳动,这在统计学创造价值计算中被折算为收入)是很高的。但绝大部分是对工业制造的商品(超级市场出售的食品等)的继续加工。

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购买的话,货币工资和其他由社会福利国家以货币支付的福利可以比较低一些。因此,只有当生产条件与再生产条件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时,工资成本的国际比较才有意义。工资成本的差别,例如在联邦德国与葡萄牙或波兰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不同的劳动再生产条件、社会的不同的现代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

福特主义是一种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它包含同外部自然界进行新的交往。自然界被人类和他们所制造的工具以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予以加工和破坏。“更加猛烈地使用能源”^①,即能源和(矿产的和农产的)原料的高投入以及福特主义的技术性和社会性能源转换机制是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比例明显上升的手段。福特主义只有作为“矿物燃料主义”才能发挥它优越的动力机制。

只有从事劳动才能挣到获取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收入。甚至经过逼迫才出现的社会福利国家机构也把他们提供的福利金与(正式的)劳动联系起来。从多种多样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中产生了“标准的劳动关系”。对劳动与工资的社会调节并不能阻止福特主义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于是出现了一种悖论式的结果:劳动作为“起系统化作用的”量,它对于社会机构、经济机构,以及对于文化的意义正在无条件地极度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福特主义的矿物燃料化的特点,工人的生物能源越来越多地被使

①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美国制度与 modern 管理》,收入奥托·迈尔、罗伯特·波斯特主编的《美国企业》1984年华盛顿版第154页。

用“人体之外的”^① 矿物能源并以相应的复杂能量转化机制而运作的机器所取代。福特主义的悖论在于,它是彻底矿物燃料化的,却同时具有“劳动集中化”的特点。

三、“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的发展趋势

福特主义劳动组织体系自然如同以前阶段的手工工场的、工业的和泰勒制的组织形式一样,也会变成束缚劳动生产率的桎梏。从前各个时期的桎梏总是能够通过熊彼得所说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② 而被消除,为什么今天就会是两样呢? 一个“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将展示出什么样的前景? 在福特主义危机中社会的“系统化”将指往什么方向? 由于未来的不可知性,预测发展趋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还是应当在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乍一看,这三个方面与目前流行的对劳动社会的

① 体内能源的概念描述的是人的器官在劳动中所能够释放的人体能量。体外能源和工具概念描述的是为了成倍增加“体内能源”而使用的非人体所固有的、例如矿物燃料中所蕴藏的能量。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人们自己生产制造的“体外工具”,从刀具、铁锤、船舶到复杂的机器系统。人的劳动所发挥的作用的程度——劳动生产率——就是这样得以提高。参见尼古拉奇·乔格斯库·罗金:《熵规律与经济过程》1971年马萨诸塞州剑桥—伦敦版第2卷第306页。

② 通过对起推动作用的领先企业进行革新——革新过程,而创造经济推动力的设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得。

理解很少有什么关系。第一是金钱与劳动的关系,第二是自然界与劳动的关系,第三是政治与劳动的关系。

1. 金钱与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种(前面已经提及的)悖论式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它使劳动集中化,另一方面它又使劳动变得多余。在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有5 000万人不得不离开欧洲,因为他们不再被需要。^①他们到北美和澳大利亚,部分人到南美和非洲进行殖民活动,为世界的欧洲化、为世界市场的扩大、为生产模式的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给土著居民带来悲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后果。

而今天呢?今天我们在经历了充分就业的“黄金时代”以后到处都是大规模失业。尽管很难对国际范围内的失业率进行测量,但是我们仍旧能以国际劳工局公布的数字为出发点:90年代初有12 500万人没有工作,还有70 000万人处境艰难,也就是说,在非正式的劳动岗位上就业,或者工作时间不足。^②由此可见,资本积累意味着对劳动的排斥,即使在经济发展动力很强的“黄金时代”解雇可以通过重新招聘得到补偿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现在单是出于生态原因就已经再也不能以这种方法持续刺激经济增长率了,即再也不能在不缩短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对劳动的解雇进行平衡了。

在全球性经济中,劳动是否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在表面上离开这个题目,把注意力放在金融体系上的时候,才能提出一个答案。因为资本不仅具有取代劳动的发展趋势,而且

① 参见海科·科尔纳:《劳动的国际流动》1990年达姆施塔德版。

② 国际劳工局:《1993年世界劳动报告》1994年日内瓦版。

在全球性竞争中还要使用最好的、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机会,也就是要趋向以高度流动化的投资取代流动程度较小的投资。所以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情况的特征不仅是技术工艺的革新、社会的革新,而且还有全球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金融革新。

在世界范围内银行中的外国存款从1980年的1836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70210亿美元,总之增长到4倍。^①在可以短期流动的资金达到这个规模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再也不能如凯恩斯所期待的那样,通过降低利率取得使实际投资有利可图并以这种方式创造劳动岗的效果。在资本具有可兑换性和高度流动性的情况下,把本国利率降到国际利率水平之下,无异于对资本外逃发出友好的邀请。经济学原则战胜政策调控的结果就是失业率的增加和劳动集中化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民族国家的空间被全球性的、高度流动的、易变的,即不断外逃的金融关系穿透。这是福特主义劳动社会危机的一个基本因素。它再也不能保护自己不受失业率不断增长趋势的伤害,因此也就失掉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令人信服的制度内聚力。

从世界贸易的结算来看,1993年全年的世界出口总额达到36860亿美元,每天大约100亿美元。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在全球性计算机化的金融网络中每天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货币财富在更换占有者。为了使金融投资和金融交易获得“将来的保证”而发行的新的有价值证券(期货期权交易等)在1993年底在世界范围内名义总量为140000亿美元。与此相比,1987年底仅为13000亿美元。在联邦德国从1990年至1994年中期这种“金融衍生物”的名义数额平均每年增加53%(同期内全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94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华盛顿版第62页。

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2%),达到51000亿马克。此外还要加上31000亿马克的“传统的”外汇期货交易。^①

这种投机性的纸房子,只要有一块纸板支撑不住,或者被撤下来,它就会倒塌(18世纪前期“南海泡沫”和“郁金香投机”时代的约翰·劳会对此感到高兴的)。^②即使经济上最有实力的民族国家最强大的中央银行面对金融衍生物的投机压力也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是“超级市场”说了算,而不是“超级大国”说了算。^③即使当许多国家或国际金融机构像在墨西哥危机事件中那样,在最短期内动员了几百亿的款项来拯救金融体系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对金融市场内在的危机趋势作出反应。

① 参见德意志联邦银行:《1994年11月的月度报告:金融衍生手段的加强使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意义》第41—57页。

② 关于现代历史中的投机危机,参见卡利斯·金德尔伯格、马尼亚斯·帕格里斯、克拉斯海斯等人所著《金融危机的历史》1978年纽约版。上面提到的约翰·劳,18世纪初曾在法国根据法国在北美的海外领地以及与塞内加尔进行的奴隶贸易的预期收入而发行一种有价证券,它们又成为其他私人的和国家的债务的基础,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信贷金字塔。它在经历了1719年一次投机高潮之后,在20年代初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在令人羡慕的“约翰·劳”体系的鼓舞下,在英国根据南海公司预期收益而发行的股票也成为一场疯狂投机活动的对象。直至1720—1721年“肥皂泡沫”最终破灭。金德尔伯格引证南海投机时代一位银行家马丁的话说:“当世界其他地区都疯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们”(第29页)。这种情况在几乎300年以后的投机危机进程中毫无变化。郁金香投机是此后不久在荷兰爆发的。因为它是在出售郁金香球茎的预期收入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投机活动。事实上所获收益还不足以偿付公众手中的有价证券。

③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1月26日。

革新的金融衍生物是如此具有魅力,交易是如此容易。因为技术革新,电子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取代了动作缓慢的工人和职员。它在一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之内随时都能对“实时”内国际货币市场最微小的变动作出反应。劳动作为交往行为和增值行为消失在计算机的程序中。这不会给货币财富占有者带来任何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关键不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来使资本升值,而是在于利用流动资金进行利息最优惠、最安全可靠地获取财富的投资。德意志联邦银行曾指出,在一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活动中,一位货币财富占有者所赢得的利润就是另一位货币财富占有者的损失,总之,这是一种(可以使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得失所系的牌局”。这种赌博的结局是——只要货币财富还没有贬值——负债者就要向国际货币财富占有者划拨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墨西哥的例子清楚地说明这绝对没有解决、也绝对没有过去)与由于持有国家有价证券的货币财富的占有者的利息要求而产生的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日益增加的国家债务一样,都证明了上述情况。因此,国家的财政政策危机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

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颇为引人注目。例如,德国向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在 1984 至 1990 年期间从 16 亿马克降到 6.6 亿马克,向拉丁美洲开曼群岛(加勒比海)的直接投资从 4.07 亿马克上升到 9.3 亿马克。货币财富占有者通过国际资本的运动根据自己的意图来调控国际劳动分工,选择“生产基地”,而且肯定不是根据李嘉图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原则来作出选择。因此各生产基地作为资本投入的吸引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它们努

力提供尽可能便宜的劳动。^① 它们在与其他地点的利率比较中向资本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差额税金”。

结果是今天对于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运行来说,全球化的货币关系似乎变得比“当地”的劳动关系更为重要。上面提及的悖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一个劳动集中化的社会,却同时又使劳动完全过剩,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上达到极点。

2. 劳动与自然

这种不受空间和时间约束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在生产过程的技术变革中,生物的、也包括人体的能源越来越多地被矿物(体外的)能源和它们推动的物质转换系统所取代。除了汽车以外,还有其他运输和通讯工具是在以矿物为主的能源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并且都成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飞机、高速铁路、一条龙的货物运输系统、世界范围的电子通讯网络,它们在过去几十年内使劳动和生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未来的劳动社会也将依赖于非生物能源的顺利提供。矿物能源载体(石油、天然气、煤炭)的矿床在地球上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矿物能源取代生物能源的趋势要求一种波及全世界的与此类似的相应体系。它以许多技术的和组织的能力、金融资金、经济的专门知识、运输能力和政治关系为前提条件,在无法预见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才能做到。因此,全球化的趋势绝对不仅仅产生于与实际积累相脱离的多变的金融关系,而且产生于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能源体系的发展逻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以及阻碍它发展的所有

^① 参见霍尔斯特·阿夫海尔德:《不属于任何人的福利》1994年慕尼黑版。

限制的消除,事实上赋予非生物能源以它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① 亚当·斯密只看到煤炭可以使空间变暖,却没有想到它会成为复杂机械系统的动力能源。

然而,上述现象会产生一系列后果。第一,在工业国家(能源原料的主要使用者)和“患双重经济病孤岛”(原料出产国)之间出现了矛盾,它在世界社会上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南北矛盾、生产经济与能源提供经济之间的矛盾、世界上的贫富矛盾等。如果一个人醉心于一种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的技术乌托邦的话,那么对各种关系进行总体观察是十分必要的。保障能源提供的方式方法表现了未来劳动社会的典型特点。

第二,矿物能源推动的运输系统和能源系统由于在时间上尽可能加快速度,空间上扩大活动范围,也使人类的劳动和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它不仅使远程旅行成为富裕工业国家居民所争取到的一种日常生活领域的利益,而且它有着双重影响。劳动关系失去了空间的约束,实现了全球化。因此为了改善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跨洲际的发展工作和劳动计划安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世界产品”是由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经过及时生产和组装的零部件组合起来的。但是这种现代的“全球化能源利用”和“全球化生产”完全依赖于能源的可支配性和低廉价格,因此从原则上说是受到威胁的。

这种危险越来越成为现实,尤其是由于矿物能源载体的燃烧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更不用说运输系统网络(公路、

^① 关于人类历史的能源系统可参见让·克劳德·德贝尔、让·安保罗·德莱格等人所著:《泰坦巨人的普罗米修斯——能源系统的历史》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飞机场等等)对生活空间的破坏以及对能源系统的不完善的风险管理所造成的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知和影响能力的“正常灾害”了。^① 生物能源(首先是人体能源)为矿物能源所取代,结果导致自然界的退化。由于使用工具的劳动被界定为有目的地消耗原料和能源,也由于交往只能在自然媒介中进行,因此生态的摧毁对于劳动并非毫无影响。在这里构成了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的这个还不是所有方面都已完善形成的“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中阻止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自然界限。如果对矿物能源的燃烧不得不进行限制,从而也限制了生产的话,那么这对于所有社会活动主体的生产取向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越过尚属遥远的后福特主义社会化的地平线,完全可以设想,对于现代交往所必须的电子终端能源主要将从再生能源载体中获取,例如从源源不断的太阳光能源中提取。一种“日光社会”的劳动组织当然是今天人们很难设想的。但是与福特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组织相比,它在空间上更加受到限制,“速度放慢”,生产率降低。对于作为创造价值行为的劳动来说,这些都是消极的。因为每个劳动单位和时间单位的价值生产将不会提高,甚至很可能下降。但对于劳动和生活的质量来说,难道这一定会是一种绝对的缺点吗?

3. 劳动与政治

如果说,福特主义劳动形式如人们所强调的那样已陷入了一场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拉尔夫·达伦多夫语)时代的劳动组织并非毫无影响。因为与这种劳

^① 查尔斯·佩洛:《正常的灾难,高技术不可避免的风险》198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动形式相适应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它也同劳动社会一样受到“改造”。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作为福特主义调节方式整体所不可缺少的政治方案(充分就业)在全球化金融市场面前,由于民族国家主权受到侵蚀而不得不屈膝投降。当利率主权丧失的时候,关于“一个自由社会中充分就业”^①的许诺被破坏了。^②所以,政治还是不得不充分领会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劳动在资本主义中作为创造价值的行为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与此同时,随着使用工具活动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也成为多余的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就业是一种例外,并不是常规。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充分就业政策。

如果社会福利国家的、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基础上的机构系统被迫面对长期失业的困扰,那么后果对于它来说是十分残酷的。享受福利的要求与保险金的交纳必然会陷入比例失调,成为呼吁“改造或削减”社会福利国家调节的理由。显然,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必须与变化了的劳动关系相适应。收入与劳动(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密切依存关系已无法维持,因为不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职业)劳动。“正常的劳动关系”已退出历史舞台,在关于福利国家的讨论中一种新的劳动概念正在形成。

对于工会来说,福特主义劳动调节机制的瓦解所造成的后果是惊人的,甚至可导致方针危机。当失业者对劳动岗位占有者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也造成压力时,工会作为劳动市场组织被

① 威廉·贝弗里奇:《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1946年纽约版。

② 参见弗里茨·沙尔普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危机政策》198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削弱了。但不仅如此,如果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被冲破,^①因此对社会福利国家的福利进行平衡已不再容易加以限制,如果此外作为劳资协议伙伴的“资本”借助全球化和大量外逃而放弃了它植根于地区的做法(这里开辟了选择生产基地转移和逃避工会的可能性),那么工会就会失去它在传统工业关系内部的“伙伴”。工资自治制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基本制度也受到了威胁。放松控制的话语推动劳动市场上市场一方作用的加强,这使卡尔·波兰伊关于不受调控的劳动市场是“魔鬼磨房”的名言成为现实,至少对于那些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排挤出正式劳动岗位的人来说是如此。因为他们对于创造价值来说已不再需要。所以他们必须在使用工具方面和交往方面都在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从事劳动。这种“非正式化”不应被忽视,不过它也能开辟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劳动社会的新的选择可能性。

在后福特主义劳动社会中对劳动进行政治调节之所以对于工会来说非常困难,也是因为工会已不再限于仅仅充当劳动的代表并且可以对全球化金融系统和自然界不管不问。他们必须把上面所提及的全球化金融系统的深刻变化包括在自己的政治方案之中,并且对于生态问题作出回答。只有在僵化的政治利益代表机构被为了塑造政策而进行对话的灵活组织^②取代的时候,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对已经发生变

① 约翰·拉吉:《领土所有权及其他,国际关系中很成问题的现代化》,载于《国际组织》(第47卷)第1期第139—174页。

② 参见于尔根·霍夫曼、赖纳·霍夫曼、乌尔利希·米肯贝格、狄特里希·朗格等著:《决策形势的彼岸,作为未来工作场所的工会》1990年科隆版。

化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外部的强制”政治化,以便建立起抵御放松控制趋势的新的调节机制。这就是说,随着劳动世界中的变化,明确表示利益的政治形式也应发生变化,如果要想在未来劳动社会中成功地维护这些利益的话。

(张世鹏 译)

团结互助与全球主义*

约什卡·费舍

用什么把劳动生产率高度发达的市场社会以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在这个全球主义时代，西方民主左派的方案对此作出了答复。

在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和整个苏联集团崩溃的时候，西欧社会福利国家还被当作西方针对现时存在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替代选择的装饰品。人们在西欧谈到“社会民主主义世纪”并不是偶然的。

西欧社会福利国家是围绕两个核心领域组织起来的：第一，为了防御重点的生活风险，如老年、患病、伤残、失业、无家可归和贫困而实行国家保障的关怀救助，而为此支付的经费来源于雇员与雇主所缴纳的保险费，以及通过税收对相当大一部分社会生产进行的再分配。第二，为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教育以及使所有

* 本文发表于德国《明镜》杂志 1997 年第 4 期，文章副标题为《约什卡·费舍论社会福利国家的未来》。

居民阶层获得同样的受教育机会,国家所进行的资助和关怀。

由此可见,在战后年代的西欧,从来没有把创造经济财富作为目标本身,而是使它首先服务于社会团结,通过对雇佣就业者群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实现一体化。市场经济、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国家意味着取得胜利的魔笛。

这个时代精神现在发生了急剧变化。现在人们宣布了“社会民主党世纪的终结”。各国的市场经济不仅围绕着它们各自对福利所起的作用进行竞争,而且围绕建立卓有成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进行竞争的时代似乎已经最终成为过去。

今天,取而代之的是围绕尽可能有效地摧毁上述这个社会福利国家保障而进行的竞争。

让我们拿出一点时间回忆一下西欧“社会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原因。这一次世界大战中资产者世界的自我摧毁和工业时代的大规模贫困导致了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解体。在欧洲大陆曾以两种可怕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即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对这种解体作出回答。为什么欧洲在1945年以后人们以难以置信的努力贯彻马歇尔计划、重建国民经济、实行有效的民主制?这是出于对斯大林和制度竞争的恐惧,还出于对希特勒和欧洲30至4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回忆。

为什么今天在欧洲联盟内失业者人数超过1800万的时候没有出现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这是因为这个西欧社会福利国家抵御了这种危机,把社会凝聚在一起,把紧张的社会对立化解为社会共识。这就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无论是美国还是英伦三岛,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遭遇过法西斯主义危险,虽然如此,如果在民主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国家一体化不再起作用,那么今天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就会立即再度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新秩序。由于仅仅依据市场标准和利率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作出投资决策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各民族国家的经济空间最终失去了它们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全球化对西欧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导致长期失业者的数目持续上升,它又加重了对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资源的压力。由此产生的资金筹措问题加剧了涉及社会福利国家成本的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同共产主义进行制度竞争的时代,为了保障西方工业社会的内部稳定而作为社会福利投资被接受的那些内容,今天则越来越多地被看成单纯的成本因素,因此日益被人们所拒绝。

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方社会内部社会共识基础的丧失,这一情况又由于社会内部的个人主义化过程而加剧。后者是 50 至 70 年代之间充分就业时代的直接结果,也是西方消费社会的实现、成功的社会福利国家一体化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进步的直接结果。

在民族国家对各自的国民经济政策具有塑造能力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民主右派与民主左派之间传统的分工。右派所关心的是财富的生产,左派则关注公正的分配。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分工不再发挥作用。因为第一,在全球竞争中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税收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从而对本国政治直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每一个国家或经济空间所处的位置,而不是政治上的多数派。第二,民主右派受到全球竞争的成本压力、内部团结互助的瓦解和个人主义化过程的制约,越来越倾向于从单纯的成本观点观察社会福利国家,从而步步紧逼地向它提出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右派不仅出于生态的理由,而且还出于社会福利的理由,不得不对财富的生产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如果他们希望在未来也能使他们的社会福利国家分配获得保障的话。

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真正危机在于就业危机,对于它的解

决直到今天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答案。这种就业危机带有结构性的和非周期性的特点,而且它绝对不局限于某一区域之内。这种失业的结构性的原因基本上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劳动生产率的革命、新的市场和新的生产基地的开拓引起的劳动岗位的丧失。尽管优化生产和服务、对基础设施进行生态革新都很重要,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办法是不能在反对失业的斗争中取胜的。

缩短平均每周、每年、以至一生的劳动时间是人们最先想到的答案。例如在德国实行缔结劳资协议缩短工时的作法虽然并非完全毫无成就,但鉴于日益增加的结构性失业,人们无法对它迄今为止的形式作出很高的评价。因为劳动生产率的革命实际上涉及西方资本主义百余年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用越来越少的人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所以必须对这个社会中劳动世界与生活世界、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传统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并且进行相应的深刻变革。

缩短每周、每年的劳动时间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达到它的极限,尽管如此,人们与劳动生产率革命进行的赛跑仍将以失败告终。为什么?第一,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除了把劳动作为关键性的生活内容、作为实行社会参与的最重要的途径、作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以外,没有其他的替代选择。所谓的业余时间社会是劳动世界的派生职能。第二,如果想通过缩短每年、每周劳动时间来很快地发挥消除失业的作用,就必须附带地削减部分工资。

现在恰恰是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利益倾斜,有利于老年一代、独身者和无子女夫妇,而加重了青年人、有子女家庭和单身抚养子女者的负担。在经历了基督教民主党政府 13 年的统治之后,德国社会福利体系和税收体系的纯输家始终是有子女的

家庭和单身抚养子女者。婉转地说,这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

劳动世界和生活世界传统关系的平衡和保障很大一部分是由社会福利国家和劳资协议双方承担的,这种传统关系的本质就在于,多数人在他们一生中要经历一些同样的人生阶段,因此,对与这些阶段相联系的各种机构产生了大致同样的需求,而且在同样的人生阶段向这些机构作出大致同样的贡献,并期望由此获得大致同样的福利。这些阶段是:学前时代,中小学,职业教育,或者继续求学和大学,活跃的职业工作时代,建立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最后是达到退休年龄直至去世。

由于个人主义化、全球化和技术变化,未来劳动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传统关系将与这些一成不变的人生进程脱钩,政界和劳资伙伴必须针对这种多样化的生活方案和劳动生涯的可能性作出新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答案。

这个新的社会福利国家结构不再能够按照把人的一生明确划分为各生活阶段的形式组织起来,它必须更多地具有一种网络的性质(在这里网络概念指的不是救济社会弱者的社会福利网络),它应该允许在各种不同的职业和劳动之间、全日制劳动和部分劳动之间、劳动与业余时间之间、家庭与继续教育之间、独立经营与雇佣劳动之间、退休与老年工作之间随时进进出出,相互变换,而不会因此使得有关人员的社会福利地位和职业地位下降,或者甚至完全丧失社会地位。

这个新的社会福利国家不仅要适应各种差别很大的劳动生涯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的需求,而且还要通过它所提供的福利促进这种差异和作出各种不同答案的可能性,以便一方面减少对劳动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的有效运作,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如果说,一个全球化、电子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必须灵活地作出反应,而且由于高额的资本成本还需要延长机器

运转时间的话,那么就必须以允许每个就业人员拥有时间主权作为报答。灵活化不能是仅仅有利于经济利润的单行线街道,它必须同样给就业人员带来更多的塑造个性的自由。否则的话,这种经济改组就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剥削率的直线上升,从而加重就业人员的负担。总之,是否可以把这表述为一个方程式:以灵活化与增加个人的时间主权相交换?

今天,对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的组织要求首先是男子、然后是愈来愈多的妇女在他们或她们最好的、对于家庭最重要的年代里在职业工作中耗尽精力,然后作为提前退休者也许去参观埃及金字塔。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组织一生的劳动时间呢?即通过在所有的就业层次实行真正的部分时间劳动,使得那些处于成家立业年龄的男子和妇女有可能就子女和家庭作出决定,同时却不致在这方面存在对职业和职位晋升的依赖,也不会被人们看作放弃事业成就的人而受到蔑视。为什么不能也给予人们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增加劳动量而节省时间,使人们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放弃薪金收入,去做劳动以外的其他事情,同时又不会因此彻底地脱离职业劳动。这些都要以雇主和雇员树立完全另外一种文化价值等级观念为前提条件。如果人们不想陷入失业的话,在成年时期持续不断地接受继续教育就会是一件完全正常的事情。这一点已经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教育政策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德国,目前所有这一切仍都属于市政成人教育或社会福利政策的范畴,由联邦劳动局管辖。对于缓解国家财政状况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部门。教育系统必须组织持续不断的熟练技术培训和内容不断更新的成年人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满足在这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未来最重要的“原材料”。

西欧社会日益老龄化,而退休时间在德国恰恰由于大量的

提前退休而变得越来越长。因此,不仅青年一代承受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一种具有职业经验、拥有熟练技术的强大的生产性资本干脆被浪费掉了。

确实,如果劳动生活是30年、40年以至更长的在极高劳动生产率之下的苦役,那么,人们为什么喜欢提前退休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条件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劳动生活,使人们在积极从事职业劳动的时期就有可能中断或改换职业工作,那么难道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吗?

在一个老年人越来越多的社会里,赡养老人会导致青年人的负担日益加重,或者导致老年人贫困化的增长。第三个选择方案就是延长老年人参加职业生活的时间。为什么不应有一种可变动的退休机会?设立专门的老年人劳动岗位难道不会使社会负担日益减轻吗?使老年人转移到另外的活动领域,在那里传统经验介绍和对社会事业的投入能发挥作用,这些难道不都会减轻社会负担吗?

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需要一场迫切的效率革命,如果它要有前途的话。而它必须有前途。然而,除了进行效率革新之外,它还必须对自由与团结互助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重新加以界定,并进行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保障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对于千百万雇佣就业人员在公正、安全和社会地位提高方面的需要所作的回答。西欧的中间阶层社会在经历了50年的和平以后大家也决不再是贫困的了。如果人们注意观察私有财产的数值和收入状况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点。

总之,对于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必须重新作出调整。但是,在这方面左派必须问一问自己,借助他们旧的税收政策指导原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不公正的税收制度?这一制度名义上向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税款,但实际上,这

些收入最高的人长期以来已经摆脱了必要的团结互助的义务，却把主要负担转嫁给那些逐渐习惯于累进税制的人。在这里关键性问题是：社会福利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强自助和相互帮助，也就是加强共济思想和团结互助精神以削弱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福利国家结构的核心是不能放弃的。尽管必须对它的官僚主义进行批评。同样对于这些富裕社会中社会公正与遗产继承权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重新作出规定。

对社会劳动的原则上的重新分配要求对基本保障模式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一场变革。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的新的变动不定的性质不致于把人排挤出社会和降低社会地位。自然，这是不会与社会福利国家再分配的扩大同时发生的。因为即使人们认为这样一种扩大是合乎愿望的，但是在实践中将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每个社会福利国家都有它的财政资金的极限，要依靠经济效益。但它归根结底要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即社会团结互助将会保障国内和平、可靠的经济框架条件、政治稳定和民主制的前途。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欧洲也不应放弃它的民主成就和经济成就中的这些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允许放弃。但是，破坏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本身等于玩火和用斧头砍伐民主制的根基。

(张世鹏 译)

分裂的社会*

《明镜》杂志记者

在基督教加利达斯平等福利联合会举办的债务人咨询会上,越来越经常地碰到这样一些当事人,他们很久以来从没有出席过这种会议,他们是一家之父,月薪曾达到 7000 至 9000 马克。

他们自以为十分安全,直至他们被解雇。

暂时的失业已经足以使一名分支部门领导人或一名工程师从社会上和经济上跌落下来。许多跌落下来的人要保住幸福家庭的面子,甚至在困难的时候不惜借贷。目前已经有大约 200 万家庭负债累累,他们已经无法偿还所借债务和利息。

-
- 本文发表于德国《明镜》杂志 1997 年第 40 期,未署名。文章按语中写道:“一些人陷入失业,另一些人在交易所,或凭借高额薪金,使他们的财富不断增长。在德国贫富截然分开,中间阶层中对于社会地位跌落的恐惧不断增长,这种恐怖情绪的蔓延会带来十分危险的后果。民主制度还能承受多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

国家保险公司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经济破产的边缘。”所有那些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与社会边缘阶层代表打过交道的人都感到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他们突然之间面对的是不久以前还属于中间阶层的人。科隆社会福利局局长乌祖拉·克里斯蒂安森在描写那些努力寻找一栋社会福利住宅的人的时候写道：“现在我们的申请者来自所有职业”。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惊慌不安，现在冲击到了中间阶层：功名心极强的职员，精明能干的独立经营者，还有收入可观的专业工人——几十年来，他们构成了德国战后社会的支柱。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奇迹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许诺（“大众福利”）已经兑现。他们曾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中感到心满意足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都可以依靠这个作为社会中坚的社会集团。这些公民对于左翼极端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者都曾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

交易所的繁荣与大规模失业打破了昔日的静力平衡。富人越来越富，而且人数众多。而穷困者大军至少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中间阶层，这个庞大的正常消费者集团正逐渐地受到侵蚀，一些人还在上升，但是有许多人跌落下来。

一个人在经历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以后就会成为这个社会受到相当优惠照顾的一部分成员，这条昔日曾被看作确定不移的信条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社会学家注意到，在公民中对于社会地位可能下跌的恐惧正日益增长。德国社会调查研究所的专家说，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今天，贫困风险已经深入到中等收入阵营之中”。

于是，出现了一个矛盾对立的共和国。上层的人在工作岗位上，在交易所中经常能挣到几倍的钱。而那些为了一份工资辛苦劳作的人，目前只有在费了很大力气的情况下才能支付日

常生活开支。

辛勤工作不再受到奖励——这对于许多以前曾相信，一份工作就能够保障生存，哪怕是节俭的生存，而福利水平是会不断增长的人来说打击特别沉重。净工资越来越少，因为毛薪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它比物价、交纳的社会保险金和各种税收的增长要缓慢得多。政府的政策似乎无法从富人那里把合法应得的那一份要过来。虽然税率很高——简直是太高了——但是逃税的花招多种多样，恰恰是那些生活优裕的富人能够逃避国家的征税。

而普通工薪人员却没有这种逃税机会，他们交纳的税金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税务负担在日益减少的劳动岗位拥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长期以来，对于劳动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新的出售时髦商品的小商店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城市中心地区，城市边缘以外整个卫星区陷入贫困。城市林荫大道上密密麻麻地行驶着胜利者的高级小汽车，在地下是一些装载着被排挤出局的失落者奔向新的竞争场所的地铁行车路线。

在以前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城市郊区，现在发生了一种场景变化。漂亮的住宅楼房的背景前，越来越多的把全部财产家当装在两个塑料袋里的穷人步履缓慢地穿过大街。

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在报告他们的人数增长：领取社会救济者的人数在一年之内增加了 25 万。威斯巴登联邦统计局在最新调查中说，在 4 年之内（1989—1993）百万富翁的财产增加了 25%。德国几乎是在静悄悄地进行社会分裂——全部出自国家之手的社会福利预算每年超过了一万亿马克。但是，对联邦德国经济制度的信任——如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所说——“正跌入深谷”。43% 的东德公民和 27% 的西德公

民此时对经济制度的判断是否定的。

在西德这种批判性的评价越来越厉害。今天,大多数的人都相信,多数雇员十分怀念这样一种社会观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古老公式对于描述社会的与经济的现实似乎又变得非常恰当了”,阿伦斯巴赫的研究员莱纳特·科海尔做了如此分析。

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是第一位公开谈论“新的社会差异”的政治家。基督教会也发出警告说:“很深的裂痕正在穿透我们的国家。”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动下,数月以来反对仅仅维护高级医生和其他百万富翁利益的税收改革的斗争已经结成了战线。而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政府也抓起了这个题目。联邦劳动部长诺贝特·布吕姆最近在基督教民主联盟执委会上抱怨说:“上涨的利润,下降的税收收入,和越来越多的解雇”简直无法协调起来。这涉及到“我们社会中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公正问题”。

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持如此看法,他对他的顾问说,目前总理府的战略家相信,这个题目在下一次竞选斗争中将产生特别的影响——也许甚至是关键性的。《法兰克福汇报》担心说:“社会风险,还有社会嫉妒,可能会使人们在下一次选举中寻找政治出气阀门。”柏林的政治学家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警告说,汉堡的市长选举已经使各个政党“预先尝到了滋味”,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汉莎城市被自己的基本选民工人所抛弃。极右的民主人民联盟只差 238 票就能坐上市长宝座。阿尔特法特说:“如果不平等继续扩大,那么民主就要陷入危险。”

这个国家将面临一场关于富有与贫困的新辩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超然于传统的左右政治模式进行:这个蜗轮资本主义难道要强制性地把这个社会推向分裂吗?

也许一种巨大的不平等会使市场经济干得更好？金钱的诱惑会使人们去创办企业，进行革新。把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开也许会使一个正在僵化的社会重新动员起创业精神？

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它可以被政治家和劳资谈判伙伴所改造。对于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党领袖来说，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这种收入差距在多大范畴内是允许的？为了减少这个过程的野蛮性，为了使这个根据公正标准尚且可以认可的福利落差不要产生摧毁性的消极影响，国家与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国内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它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货币财富、不动产、企业资产都集中在一个人数相对很少的阶层手中。百分之五的私人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平均每个这种家庭拥有价值 200 万马克以上的财富。占这个社会一半的下层居民只拥有价值不到百分之十的私人财富——平均每人不到 5.9 万马克。由于收入差异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从 1980 年至 1995 年期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在平均收入比较中增长了 54.3%，同期间雇员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10%。

然而这还算不错，因为至少还有一个工作岗位。德国人始终是旅游世界的行家里手，节日之前预定往返机票，一次付清的旅游者陡然增多，而且为此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节省，所以自 1992 年以来零售商店开始抱怨营业额下滑。

这个剪刀一样的差距毕竟已经打开——在越来越有与越来越没有的人们之间打开。简单劳动的薪金直线下滑，与此同时一个数量很小的职员集团收入提高到意想不到的水平。

谁有了一个正当的职业，就能在年轻的时候挣到许多钱。最近，经济杂志《资本》用了“35 岁——150000 马克”的通栏标

题,并且报告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领导人越过了这个无形的屏障。但是,98%的德国雇员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身兼公司顾问与人事顾问的约亨·金鲍姆证实说:“不,就是在德国经济界最上层也不会直接碰到这么好的机会。”而罗伯特·科勒,威斯巴登 SGL Garbon 公司的老板说:“只有高智商的人才能冲破这个屏障。”

处于领导岗位的国民经济学家在 35 岁的时候很容易挣到 17 万马克,司法学家在大学毕业以后晋级升迁平均拿到 74000 马克,金鲍姆声称,在大康采恩中干到 35 岁甚至有希望拿到 20 万。

对于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说,公司发出的信号是十分清楚的:有成就就会受到奖励。谁要是以独立经营者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在甘冒很大风险的情况下——收入自然会有很大的飞跃。

为了超级效益,一个市场经济是不能放弃高级薪俸的。在波鸿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艾伦斯特·乌尔利希·胡斯特说,财富是“培养企业风险意识的先决条件”。

这些高收入者把很大一笔金钱收入流入交易所,并且在那里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小小的挫折,例如在上一周出现的挫折,被人们十分轻松地接受下来。谁把他的金钱投入美国标准股票,谁就能自 1987 年 10 月危机至今天把所投入的资本提高 325%。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所的火箭也在我们这里点燃。达克斯(Dax)即德国股票指数,直至不久以前还不断打破新纪录,在 7 月的第二周,交易所的气压表跨过了神秘的 4000 点大关。自 1996 年初以来,德国大型股份公司的股票指数上涨了 82%。尽管在同期内发生了汇率混乱,许多有价证券价值甚至增长了 4

倍。SAP上涨了110%，博施上涨了300%，赫西斯特上涨了500%——在德国成为百万富翁从来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只有那些挣钱很多的人——公司经理，企业主、律师、建筑师、或者医生——才能强有力地参与股票市场的竞争。恰恰是不到百分之六的德国家庭占有今天的全部股票。

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最近警告说，“两个阶级的社会”正在发展形成。大量的德国人必须依靠“数量很少的”资本收入生活，而对于人数极少的少数人来说，财产收入则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高级劳动岗位的薪金不断增长的时候，广大就业者群众正在进行反对减少实际工资的斗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工资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许多工人来说，目前的收入几乎无法养活一个没有社会福利金补贴的家庭。

与此同时，国家这只手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国家残酷无情地从相对低收入那里的攫取不断加码。工资税与社会福利税在平均劳动工资中所占比例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5%，达到35%。与此同时企业收益税在全部的税收中所占比例从16%降到5%。

越来越多的就业者从工资等级台阶最后一层的终点跌入贫困。如在美国一样，逐渐产生了一个“在劳动中日益贫困”的阶级。汉斯·贝克勒基金会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克劳斯·舍费尔说：“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在劳动中贫困却不断增长。”

自1978年以来，那些进行全日制劳动而收入不到德国人平均收入——5万马克——一半的人增加了11%。一个国家全体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流行的相对贫困线范畴。在10个行业中，1995年劳资协议的最低工资是1600马克，在其它的13个行业中是1800马克。在莱茵兰-普法尔

茨州皮革商品工业和咖啡工业中劳资协议规定的最低基本报酬是每月总计 1252 马克。受到贫困冲击的首先是单身抚养子女的人和失业者。法兰克福研究社会福利的教授里查德·豪泽尔说：“在这两个集团中可以看到一种贫困比例明显增长的发展趋势。”在西部,在所有至少拥有一名失业者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被算作贫困家庭。而独身抚养子女的人只要失了业,几乎没有不陷入贫困的。

在许多城市,正常的工薪人员,如警察或邮局公务员已经无法承受在工作地区居住的负担。他们不得不以长时间的往返上下班为代价,以保住他们的薪金,维持他们的生活。

自从大康采恩在整个等级层次上进行合理化裁减人员以来,越来越多的担任过经理职务的失业者出现在各级劳动局。在那里谁的年龄超过了 45 岁,他就很少有机会再找到一份相同的工作。

富人对于别人的问题没有太多剩余的——至少是没有钱。他们有其它需要操心的事情。为了阻止国家的再分配干预,保住自己的财产,许多人做了许多,甚至尽了一切努力。在许多富裕的城镇和城市地区,近几年税务收入急剧下降。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太穷困,而是因为他们国家的帮助下正在巧妙地致富发财。

这些钱流入了财政部长所支持的折旧模式中,流入了东德的固定资产中,或者不久以前流入了船舶投资中——为他们在卢森堡建立银行户头铺平道路,流入了(英国)海峡群岛的托管局,或者流入了利希腾斯泰因的匿名基金会。

联邦德国的税务监督员相信,成千上万的富人以上述这些方式把金钱转移到了国外——经常是借助银行的帮助。最突出的嫌疑人是沃尔夫冈·吕勒尔,已经下台的德累斯顿银行监事会

主席。杜塞尔多夫的律师团推测,在一个十分秘密的、进行地下活动的名叫卡路梅纳基金会的后面是强有力的银行家,在这个基金会中,一名托管人掌管着几百万瑞士法郎。

正是这些名流显贵示威性地把他们的居住地点转移到纳税标准比较低的地方。他们向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告别,永不想再见面。

在瑞士经济杂志《总结》最近在金色的标题下刊登了200名最高收获者的排名榜。最前面的是罗西药品康采恩的三名大股东,每人的资产在120亿法郎以上。下面几个位置由最近刚从德国迁居到此的富翁占据。

迁居到邻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有老牌花花公子京特·沙克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盖尔特·鲁道夫·弗里克、米克与木克兄弟,巴尔森饼干家庭的遗产继承人,生产草药甜烧酒的胡伯尔蒂娜·温特尔贝格夫人。在瑞士有四分之一的大富翁来自德国。

在后面的的是来自摩纳哥的一名“比较穷”的迁居者,带来了不到两亿的资产。米歇尔·舒马赫在日内瓦湖畔购买了一栋高级公寓。

在这里财产分配从来没有像今天倾斜得如此厉害。在战后重建中,在东德人们按照苏联的榜样进行了生产资料社会化。而在西部,多数人开始手中几乎一无所有,许多大楼和工厂都被摧毁,一切从零点开始,即从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开始,每人发给40马克的“人头费”。

战前年代的货币财产几乎不值分文,银行的储蓄户头贬值到100帝国马克兑换6.5新马克。在战后年代当西德人开始占有200亿货币财产的时候才离开这段艰苦岁月——今天仅仅阿尔狄·泰奥兄弟或卡尔·布莱西特家族就拥有这么多的金钱。

帝国马克兑换德国马克使经济奇迹开始起飞。路德维希·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之父”兴高采烈地建设了一个“自由与平等”的社会。而且事实上，多数德国人依靠勤奋与更多的投入，使自己的收入在十年期间增加了两倍。许多企业主在这期间财富增加了三倍或者四倍——有谁受到干扰了吗？经济开始以12%的凯旋似的比例向上增长，多数人都从中得到好处。

西德人凭借刚刚挣到的钱开始购买长期耐用的消费性商品。他们很快地就对50年代再度成为他们最喜欢的美德——节俭进行充分的反思。于是出现了大宗的私人货币财产。

60年代，经济奇迹开始失去活力。多数人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样地获得福利。那些在纳粹时代大部分财产被摧毁的家族现在被拯救下来：弗里克斯、克鲁伯、蒂森家族。

很快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德国企业主王朝。著名的飞黄腾达人士有邮政大楼的无冕之王约瑟夫·内克尔曼和古斯塔夫·西克坦茨，制造汽车的卡尔·波尔格瓦尔德，或者电气工厂主马克斯·格伦迪格，他们利用了这个繁荣年代建立起他们的帝国。

至少从70年代起这批第一代富人被第二代所取代。开始了大规模遗产继承。幼年在幸福中成长，然后在当时还没有多大干扰的中学中接受高等教育，这些生活优裕的孩子们从他们父母创建的成就中获得好处。

他们作为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自己挣的并不少，再加上不动产、贵重首饰、股票，以及经常得到的大笔非法金钱。

这种大规模的遗产继承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一个平均年龄日益老化的社会里，这种继承涉及到数目越来越多的楼房、有价证券、贵重首饰和中等规模的公司。目前联邦德国四分之三的货币财产和不动产属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进入世纪之交以前的这两年内他们将要把大约2.7万亿马克的财产传给他

们的儿女和孙子们。五分之一的遗产在 40 万马克以上,四十分之一的遗产在 100 万马克以上。恰恰是工人家庭从这种货币遗产继承中所获无几——贫富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由于石油危机,许多工人被迫第一次尝到劳动岗位失去永远保障的滋味。在他们使用利息很少的储蓄簿节衣缩食存钱的时候,70 年代的高额通货膨胀率使他们的存款贬值。

有产业的人可以进行自我保护,现在他们购买有价证券、不动产,以便获得比银行储蓄更高的利润。联邦银行注意到在这些富有的投资者中间的一种新方针:“更大的风险意识,首先是更高的利息要求正逐渐渗透。”威利·勃兰特与赫尔穆特·施密特领导的社会党—自由党联盟政府努力进行一种利益平衡。为那些处于福利等级底层的人们通过了大量新的社会福利法,或者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修订。对于退休年龄灵活界定,大幅度提高了失业金和失业救济,在建筑业实行冬季补贴,在医疗保健业领域实行各种优惠。然而,自从大规模失业广泛流行以来,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措施都已成为过去。昨天受到优惠照顾的人现在要反过来交钱,成为赤字财政经济政策的牺牲者。

为德国统一筹集资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因为很大一部分负担是动用社会保险金支付的(失业保险与退休保险)。独立经营者依旧未受触动。

从此以后数以万亿的马克从西部流入东部。从 1991 至 1995 年私人财政预算必须另外增加 880 亿马克,其中 370 亿是由于提高了税收,280 亿是由于应交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量提高,230 亿是由于压缩开支。这种财政紧缩的后果大多冲击到三分之一的社会下层居民。从社会保险机构筹集资金首先加重了中间等级的负担。

与此同时这样一支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安的力量在德国开始发挥作用：全球化。这里的工厂、工人与南朝鲜，泰国，巴西等国家的工厂、工人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劳动岗位被转移到国外。长期以来不仅是缝纫女工们不得不与远东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许多正在崛起的国家在教育中加紧投资，已经拥有了一支高科技力量的大军。他们越来越多地夺走了德国生产基地上高度熟练技术雇员的劳动岗位。

技术进步造成了一种劳动力的剩余。成千上万的劳动岗位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被合理化节省掉。这种合理化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信贷机构，银行，保险机构，行政机构和零售商店中进行。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够逃脱这种发展趋势。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贫富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法国经济学家让·符拉斯蒂埃说，欧洲的社会模式在美好的30年内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统治了欧洲，这种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对于社会一致的强烈向往。由于加紧了对于社会弱者的帮助，阻止了社会排挤过程。在社会对话中对于增长的丰厚果实进行分配。

美好的时光真的已成为了过去？人们经受着大规模失业与马斯特里赫特标准的折磨。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总书记米歇尔·汉森纳说，欧洲人正回首翘望一个“失去的天堂”。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就警告说，全球化的世界将分化为胜利者与失败者。

胜利者是未来的知识工人：企业顾问、工程师、经理人员，他们多数有很高的才能，经常得到很高的工资。

失败者首先是没受过教育的辅助劳动力，很廉价，但是比机器还是要贵一点。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担心说：“我们的经济并不需要一个数量很大的公民集团。”

就是在瑞典,这个最早达到标准优秀水平的社会福利国家,精细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正陷入崩溃。斯德哥尔摩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的学者约翰·弗里特采尔说:“到80年代初以前我们还曾拥有西方最均衡的收入分配。自那时以后事情就转入另外不同的方向了。”因为国家的金库已无钱提供,斯德哥尔摩的政府不得不削减通常所喜欢的社会福利金,这涉及到那些没有财产的穷人。于是处于最下层收入等级的瑞典人在6年内实际净收入减少了30%。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工业社会的未来进行辩论,英国首相和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最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一个只关心股东福利的控股社会中如何能够产生出一个对所有公民进行公正分配的控制风险的社会?

在德国,盖尔哈德·施罗德,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推举出的富于远见的总理候选人,也谈到了要对“参股社会”重新进行评价。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经济部长沃尔夫冈·克雷门特正努力推行一种“协调合作的经济政策”,应在经济与社会之间组织平衡。

克雷门特,还有联盟党的很大一部分成员具体思考了全体职工股份制。当工资减少的时候至少可以部分地借助股票利润有所弥补。储蓄工资代替现金工资——这个主张在德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

诺尔贝特·布吕姆认为,把雇员变成小资本家是不成问题的,“今天的雇员已不再是昨天的雇员”。

但是,这位劳动部长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允许股份公司的职员从这种新的工资形式中捞取好处。他坚持建立可与投资基金相比的跨企业基金,要使所有雇员都能参股。“否则的话,仅仅一个财政局的几名职员就能把钱掏空。

在波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斯卡·拉封丹对传统的左翼路线进行调整,几个月以来要求进行一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再分配。社会民主党人同意征收财产税,这项税收于1996年底曾被联邦宪法法院废除,他们认为至少应当部分地恢复,作为向百万富翁征收的特殊税,特别要向大型私有财产征税。这笔财产估计要有3万亿马克。

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纳税人越富有,税率应更高。每100万的财产应当增加1%的税率——扣除高额人头免税金额,1000万以上应当增加2%的税率,5000万以上增加3%。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负担平衡”工作小组在一份文件中说,这样就可以最终从高额私有财产所有者那里借到钱,而目前他们对于国家财政资金的筹集毫无贡献。

科伦大学的一份研究结果说,荷兰与英国要求他们的公民为他们的财产交纳更高的税金。根据全部征税收入总数计算,在英国财产征税收入所占比例为13.15%,在荷兰为6.33%,而在德国1996年只占4.99%。如果1998年再不提高工商业资本税,德国就要远远落后了。

在总理府人们吃惊地注意到,旧口号如何对新口号发生作用。也许,社会学家洛德·拉尔夫·达伦多夫鼓吹的“社会主义世纪的终结”是完全错误的。

而进行启蒙宣传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阻止建立一种“胜利者拿走一切的社会(The - Winner - Takes - All - Society)”,如美国人所说,一个只为胜利者服务的社会,为不被人们所承认的人服务的社会。他们担心群众的消费力量,担心政治稳定。

美国汽车工业创始人亨利·福特早在世界经济危机年代以前就承认:“汽车是不能购买汽车的。”今天一些著名的经济界人士正努力效法他的做法。

最近,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也开始咒骂“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思想”,并且警告说,如果没有一种再分配机制,也许在什么时候社会不平等就会达到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规模,这种富人鼓励的“成就崇拜”威胁到“稳定的根源”,还威胁到乔治·索罗斯最喜欢的领域——财政金融市场。这种恐惧使许多人感到烦恼。西方社会还能承受多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宣传要对于公司企业进行严厉的限制,警告富人不要玩火。他相信,工人很快就会进行反攻,要求更多地参与分享社会福利,今天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繁荣的股票市场会由此受到损害。他的警告是:“投资者的天堂正处于危险之中。”

(张世鹏 译)

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

——当前的社会危机及其后果*

约阿吉姆·希尔施

一、理论阐述原则

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不是通常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而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危机,这种观点现在已为几乎每一个派别的经济学家所接受^①。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数现在已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后退而向货币主义和

* 约阿吉姆·希尔施,德国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教授、博士,长期从事社会结构与生产问题研究。本文发表于德国《政治季刊》1985 年第 2 期第 160—182 页。

① 参见德国经济研究所大多数关于经济结构的近期报告:K.D.施密特:《退入适应过程,面临新挑战的德国经济》1984 年蒂宾根版;W.盖斯腾贝尔格:《恶化的基本条件下的结构转变,1983 年结构报告》,经济研究所编,1984 年柏林—慕尼黑版。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在结构转变中提高的行动需求,1983 年结构报告》(柏林)。

供应学派阵营靠拢)对危机的诊断大致如下:导致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过去多年工资增加过多,以及国家“消费性”(即广义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开支极度膨胀和因此必然造成的国家债务的极度膨胀;国家作出的代价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定(如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以及劳动保护、保护雇员免于解雇的立法)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要素”的成本;这种发展的结果是通货不断膨胀。鉴于收入和预算政策之间“缺乏协调”,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摩擦加剧(如提高利率会引起银根吃紧);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使资本的可赢利性从60年代末以来持续下降,只有1975—1979年短暂期间除外。^① 资本可赢利性的这种下降被视为西德经济投资疲软、增长率下降甚至负增长及失业增加的基本原因。

投资下降的结果是设备老化和推迟采用技术上更先进的新机器,从而导致技术革新速度放慢。企业家们越来越不愿冒险,他们似乎正在失去熊彼特所描述的那些品质,这一事实使情况更加恶化。革新受阻还与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因素有关,如自筹资金在财政上的障碍,劳动力缺乏“灵活性”,国家限制公司活动的规章,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章也限制了劳动力的活动。同时所谓“门槛国家”的工业化一直进展迅速,因此随着这些国家作为工业商品供应国的崛起,联邦德国的国际竞争地位显著恶化。联邦德国在高技术产品领域已经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现在正承受着正在工业化的低工资国家在普通标准技术领域越来越大的压力。鉴于目前危机波及全世界,工业品的世界贸易总的来说处于停滞状态,联邦德国在这个处于停滞状态的市场中

^① 施密特:《退入适应过程,面临新挑战的德国经济》1984年版第33页。

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从1962年的17.4%下降到1982年的15.6%)。^①只有门槛国家和日本仍然能够增加它们的份额。目前基于美元升值由出口带动的繁荣只能暂时掩盖联邦德国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利地位。

因此,工资成本增加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从国内外的条件来看,工薪阶层的“要求”正在使经济陷入危机。可是在德国经济结构技术变革的步伐危险地放慢的情况下,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了维持劳动岗位,对于那些没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工业部门扩大补贴,阻碍了产业结构适应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变化。

因此这场危机在本质上被视为政治性危机,这样说并非指个别的政治决定(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之间“不协调”是难免的),而是指整个国家政策的活动范畴。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强大的工会、任凭有组织的(雇佣劳动者)利益集团的摆布而刚愎自用的政府、强大的社会官僚机构和福利压力集团、以及广大民众已经养成的“伸手索要的态度”。所以仅仅政府更迭是无济于事的。更确切地说,这涉及对社会政治体系的制度结构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结构进行根本变革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遏制工会、减少要求、改变消费方式、解散和重新构建福利国家、完全放弃国家干预、重新激活市场力量。

在得到承认的“资产阶级”学派和重要的左翼学派对危机的诊断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一致和分歧。(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凯恩斯主义”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销声匿迹,这些理论基于

① 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在结构转变中提高的行动需求,1983年结构报告》1984年柏林版第10页。

这样的设想：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由国家干预加以引导，不间断的充分就业和相对来说不受干扰的经济增长（因此就可以扩大改革政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已经过时。60年代，这种理论在全世界流行，但是它们已被实际的事态发展毫不含糊地证明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又为“长波理论”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①长波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基础，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定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危机机制的决定性的基础。简言之，这个理论认为，在积累的过程中，只要同时存在的一系列“相反趋势”（如技术发展、实际工资下降和剥削加剧引起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资本构成的变化）继续不起作用，资本的有机构成必然会提高，而这种提高会导致利润下降、资本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和危机。

这种危机形成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间歇，它们只有通过对于技术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对于劳动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结构性改组才能克服。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出现的原因。长波涵盖经济周期紧要关头的通常变化，一般长达数十年，在长波的转折点上会爆发“异乎寻常的”、与社会变迁相联系的世界规模的危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目前的危机）。

与此相对立的是危机理论的左翼变体。人们可以大致将其称为“利润榨取理论”。奇特的是，这个理论与上述“资产阶级”理论一样，认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斗争的胜利和对工厂里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与日俱增的抵抗是当

^① E.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80年伦敦版。E. 阿尔特法特：《资本主义面临一场繁荣吗？关于长波与阶段理论》，载于1982年《经济与社会》杂志。

前危机的原因。这个理论也认为危机是“异乎寻常的”，即使不见得是长期的和周期性的；当前危机是战后长期繁荣的结果，在此期间，工人阶级能够从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战争和战后的困难中恢复过来，加强自己的组织，再次扩展政治活动的空间。^①

这些不同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解释危机时，它们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强调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关系、既定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化的形式。当前危机被视为战后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危机。这可以被看作试图构筑更加一致的诠释框架的开端，这种框架要避免现存理论的各种矛盾和差错。

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和优点是能够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中大危机周期出现和资本主义再生产长期周而复始的循环。对这个理论来说，危机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于历史偶然的外部条件，而在于资本关系内部。这意味着资本关系内长波和异乎寻常危机的不可避免。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困难之一在于其仍未解决的价值理论基础问题（特别是所谓“转型问题”）。^② 这同样是与其竞争的理论的公认弱点。困难之二在于理论自身的构成：只要按照趋势和反趋势对立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危机，这个理论的含义就没有界定清楚。一个人假设基本趋势（资本有机构成增加）价值逻辑的正确性，那么要确定一次具体危机（即打断积累的正常过程的利润率下降）出现的时机和表现形式就需要说明“反趋势”有效的条件。然而这些都不能从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结构条件

① S. 鲍尔斯、D. 格登和 T. 韦斯科普夫：《超越荒废的土地，代替经济衰落的民主模式》1983年加登城—纽约版。

② 参见《价值理论》，载于《社会，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9年第13期。

中“推导”出来,它们不过是社会、技术、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条件(技术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国家干预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历史的特定综合表现而已。

从根本上说,资本可以根据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采取不同的积累战略,以国内市场为重点或以国际市场为重点的战略、“内涵式的”(主要以加快技术发展和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或“外延式的”(主要依靠将新的领域或地区纳入资本关系、削减工资、延长工时)战略。^①一种特定的积累战略或积累模式的实现总是与强制推行一种合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支配结构、恰当的政治体制形式、镇压工人阶级和将阶级关系制度化的方式的可能性密切相关。^②然而对于“战略”这个概念不应从行动理论方面发生误解,某种积累和支配的结构实现总是由结构所决定的冲突的阶级和集团行动的结果,因此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

资本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形态的性质是由一定的积累战略、即积累模式与其相应的统治结构来界定的。简而言之,当在某一特定的积累模式和统治结构的框架内已不再可能调动足够力量形成遏制利润率下降的相反趋势,当实现资本的进一步增殖要求改变这个结构,即要求强行采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时,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就会历史地爆发。因

① M.阿格利塔:《一种资本主义管理的理论,美国的经历》1979年伦敦版。

② B.杰索普:《国家形式、社会基础和支配计划》,载于《资本国家》1983年第10—11期。约·希尔施:《国家疏导之后,对于一种唯物主义国家理论改良的注解》,载于《马克思论据的现实化》特刊,1983年柏林版。

此,异乎寻常的危机是整体性的、集合紧密的和结构上已经确立的社会形态的危机,是葛兰西所说的“历史板块”的危机,其作用在于使这个结构发生“革命性剧变”到如此程度,以致积累过程能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再次继续进行。^①

这就是福特主义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关注战后资本主义结构上的特征和政治经济调控机制及其当前的危机。^② 该理论赞同这种观点,即决不能“客观主义地”或“经济主义地”误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误解为机械主义的崩溃论。在用危机理论说明危机的性质和过程的同时也需要分析具体的社会条件,因此也需要分析积累战略和统治结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最终是具体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虽然这种斗争总是在斗争的参与者背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确实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而不是经济主义或客观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利润榨取”理论不是用资本关系内在的矛盾性,而是用从政治的阶级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分配关系来论证“结构性”危机过程原因的。雇佣劳动者在分配方面的(政治)斗争中取得的物质上的胜利和他们对强化剥削的成功反抗降低了资本的利润,从而导致“投资疲软”、停滞和危机。于是利润榨取论者发现他们的理论与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诊断十分吻合。因此,利润榨取论也与那些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具有一些共同的弱点。例如,在这些设想的框架内,难于解释在联邦德国工资

① 约·希尔施:《国家与资本的再生产》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P.马蒂克:《马克思与凯恩斯》1971年伦敦版。

② C.帕罗伊克斯:《资本主义机体的危机》,收入C.多伊右纳主编的《资本的国际化》197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率自 1975 年以来一直下降和按国际标准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利润率没有相应增长,也没有出现新一轮经济“回升”。鉴于该理论的前提,用工资相对下降幅度太小来解释^① 难以令人信服。相比之下,用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解释下降的实际工资、下降的利润与危机之间的平行运动则显得毫无困难。

如果将对危机的不同解释集中起来,就会发现对导致复杂的危机局面的不同因素孰轻孰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因素甚至被排除。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和利润榨取理论都侧重于某些“反趋势”及其被排除的条件(实际工资的增长、剥削形式的发展和技术工艺)。这样他们就只强调危机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没有从总体上加以把握。然而有一点是所有理论所共有的,这就是“异乎寻常的”危机的紧要关头被视为两者之间矛盾冲突的时刻,一方面是其特性被特定的阶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利益集团和“价值”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既定结构,另一方面是变化的资本增殖的要求。当资本增殖的进程到了它原本在其中顺利进行的社会化历史形态的极限时,异乎寻常的或结构性危机就会爆发。危机起到解决问题的转折点和实现资本增殖所要求的“社会重建”的手段的作用。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发展和确立起来——完全是目前危机的“外部”原因。他们不得不这样说,因为他们不能抓住资本关系的矛盾。他们的理论弱点表现在他们只能将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社会组织问题理解为政治调控问题。

^① K.D.施密特:《退入适应过程,面临新挑战的德国经济》1984 年蒂宾根版第 40 页。

这样,他们的理论就将危机归因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失败,并且可以说已经在纯理论的基础上无可挽回地接近一切政治色彩的专制主义观念和制度。由于这种理论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危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危机的反应是彻底改变其理论范式: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处于支配地位。(异乎寻常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相应的理论危机。

因为完整而准确的(也就是既非经济主义的,也非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更加广泛和全面,所以我们将把它作为出发点。然而,绝对不应忽视它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只是在它的普遍形式中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它有助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社会形态及其危机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没有阐述任何具体的历史危机,而只是阐明一种社会结构的总体危机关系,这种关系采取了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形式,运用这个理论就可以说明具有“长波”和“异乎寻常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个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结构性的、不依赖于阶级活动家行动而独立存在的周期性危机的必然性。它避免了将经济和政治割裂开的“经济主义的”和“只讲政治的”误解。最后,它能够把相互竞争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原则天衣无缝地整合在一起。

二、福特主义形态的结构特点

我们用“福特主义”这个术语来命名从本世纪30年代至50

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形态。这种资本主义形态的渗透的基础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地位和在这种霸权地位下得以发展和保持的战后繁荣。福特主义的“长波”在60年代达到顶点,以70年代中期新的“异乎寻常的”世界性危机阶段而告终。福特主义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用分析方法理解和把握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以及刚刚结束的这个发展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性结构特征。辨别资本主义形态历史发展的通常的阶段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多种多样的民族特征和发展的不同步性。如与美国相比较,北欧和中欧国家以职团主义为支柱的国家调控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而意大利和法国在这方面相对落后,更不用说日本的“特例”了。这些区别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福特主义形态自身内部国际竞争关系和依附关系的结果。因此它们不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但却使区分和比较研究成为必要,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行这种研究。在这个总的理论概念框架之内,我们基本上局限于分析联邦德国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然而,这种分析并非要描述民族特殊性,而是要纳入和确定通过世界市场中介作用促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性结构变化。

福特主义形态以一种集约式资本主义积累战略为基础,这种战略基本上依靠对劳动过程按泰勒制重新组织。^① 泰勒制的推行意味着剥削的确实无疑的强化,这种强化的基础是意义深

^① H.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劳动地位的下降》1974年纽约—伦敦版。R. 爱德华兹:《争夺的地带,20世纪工作场所的变迁》1979年纽约—伦敦版。P. 斯泰阿伦斯:《工人生活,欧洲工业与日常生活,1890—1914年》198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远的非技能化过程、摧毁传统行会形式的工人权力和引进有效的企业管理监督技术。按泰勒制组织生产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使批量生产廉价消费品成为可能,从而为建立新的关键性技术(汽车制造、家庭用具、大规模的电子通讯交往手段)的推广创造了先决条件。这种情况还使实际工资逐渐地以能被觉察到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由于泰勒制而产生的从事批量生产的工人能够成为工业产品的大众消费者。这样就创造了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基础。按泰勒制重组劳动过程与社会加速彻底资本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引起农业与家务劳动的工业化以及有利于工业雇佣劳动者队伍扩大的小手工业生产形式和传统服务性职业的萎缩。于是从发展趋势上看,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说,消费性商品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变成了投资和资本增殖的关键性领域。彻底资本化、雇佣劳动普遍化、无所不包的国内市场的建立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新的积累周期的基础。^① 在美国占居霸权地位的情况下,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崩溃的世界市场于 50 年代重新恢复起来。日益发展的生产国际化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构。新的原料开采和利用形式逐渐发展起来。依附国家的经济被有选择地现代化(门槛国家)。同时,在主导国家的经济中,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加剧导致合理化与竞争的压力激增,推动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这种福特主义积累模式使利润率的全面增长和稳定成为可能,从而为长期繁荣创造前提条件。它的基础是为资本开创新的投资领域(彻底资本化)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决定性增长(泰勒主义化)。后者的基础是因工业批量生产而成为可能的劳动力

^① B. 路茨:《永久繁荣的短暂梦幻》1984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

再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上升。此外,出现了抵消资本有机构成迅速增加的一系列技术发展,如新的较廉价的原料和能源(石油)的使用,服务产业部门的工业化,在组织、通讯和交通领域新技术的发展。

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推行对于社会化形式和政治体系结构产生了决定的后果。“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关系、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尤其是工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瓦解或消失;强制性流动、消费个人主义及传统家庭和社会共同体结构的削弱导致社会分裂的现象日益增长——逐步形成由自治的个人组成的强制“现代化的”大众社会,以金钱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外部强加的劳动分工和工业时间经济是其突出的特征,这是一个越来越由庞大的官僚机构管制和集合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在工业化初期能够通过适应和利用现存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自然资源(农村人口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家庭作为社会保障、自然作为无偿使用的生产力)而成长,随着工业化的推行这些条件逐渐被摧毁。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倚为基础的生产条件从人和自然变成必须由社会——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由国家来管理的事务。

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国家是在世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在日益加剧的资本集中和社会分散化的情况下诞生的。将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仅仅托付给市场机制和自发的社会组织网络的效能证明越来越不可能。资本集中和社会分散化导致日益增加的官僚化和进行调节、管理和监督的国家(“社会保障国家”)^①的膨胀。国家官僚的调控成为经济过程不可缺少的基础(经济周期政策、技术政策、结构政策、补贴政策),成为保持

① 约·希尔施:《社会保障国家》1980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

和引导一支能满足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需要的劳动力大军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是以多种方式与国家行政机关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技术上高度发达的工业与金融资本综合体,另一方面是多种分支的社会官僚网络,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福特主义社会化表现的两面。

雇佣劳动的普遍化,工人阶级同质化和分化的复杂过程,社会分散化、社会的不断第三产业化(国家官僚、工业官僚和服务部门官僚日益膨胀)是产生官僚化中央集权工会机构和社会成分复杂、选票分散、纲领阶级性模糊的群众性政党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作为“凯恩斯主义国家”的政治调节形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征是国家化的大众融合的政党和以职团主义方式与政治机构相结合的工会居主导地位^①。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重要的政治组织在生产增长和进步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或类似的)政党在工人阶级一体化、与工会进行职团主义的联合、实施一种国家干预的现代化政策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持续的增长和相对充分就业是这种调控形式的基本前提,这种政治调控形式将有关的资本家集团和部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建立起促进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利益联合,并使之制度化。增长、现代化、进步、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劳动纪律、管理的“合理性”、加强国家作用的社会改革与平等主义等,这些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标准价值模式,它们将福特主义经济—政治统治结构凝聚在一起。

^① C. 博西·布鲁克斯曼:《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的凯恩斯主义化》1982年汉堡版。

三、福特主义的危机

目前危机的原因是这种福特主义的积累和统治结构开始成为货币增殖的桎梏。虽然这种结构的确立起初曾是资本赢利长期稳定和相对长期的资本主义繁荣的条件,但是现在这种结构和与它相联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及相关机制本身已成为导致危机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在构成一个历史社会形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内,补偿利润率下降的“相反趋势”逐渐失去力量。结果,利润率下降从一个矛盾的趋势变为实际生活中的现实。尽管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关系仍然是危机的基本原因,但是触发危机的条件及其表现形式却必须在福特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特定结构特征中寻找。这些特征决定了一种复杂危机关系的不同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植根于作为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板块”(葛兰西语)的统一形态中,当然,只有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才把它们彼此分开。

泰勒制劳动组织的危机

有迹象显示泰勒制劳动组织中所储备的生产力已逐渐耗尽。劳动日益强化、非技能化、单调和异化导致各种形式的抵制。这些抵制活动是没有组织的、零星的和隐蔽的,尚未达到引起负责管理的官僚机构注意的程度。但是,随着技术上高度发达、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和易受伤害,在设备高度密集的情况下,旷工、怠工和破坏造成的生产时间损失使成

本越来越高。^① 在泰勒制消灭了传统手工业熟练技术工人,取消了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以后,新的没有手艺的“批量生产工人”现在似乎反过来成为资本增殖的障碍。要招收工人从事单调、工资微薄而繁重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这些困难不再能够通过大规模使用移民工人来克服。在泰勒制劳动组织基础上,技术上可行的合理化措施却越来越明显地遇到难以逆料的人为风险所造成的障碍。因此,在工业生产的中心地区,泰勒制批量生产劳动逐渐丧失了其资本主义利润决定性的稳定器的作用,这意味着福特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基础成了问题。

职团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

如果说,泰勒制劳动过程的结构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危机,那么它在组织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即官僚集权及以职团主义方式结成一体的工会和制度化的社会保障系统明显成为资本增殖过程的桎梏。正是确保对雇佣劳动者进行福特主义的整合和管束的那些制度化的机构在积累日益困难和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开始成为资本利润的威胁。社会福利国家的调节网络和机构包括一种使社会要求和社会福利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形式,而这样做有时会妨碍物质再生产成本的平稳下降。被纳入官僚化的福利国家的医疗工业综合体逐渐产生了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费用日益上涨的动力,而同时其效率不断下降。随着增长率下

① B.科里阿特:《在批量生产的工业中全体工人的分化与分裂——福特主义,群众性工人与手工劳动的升健》,收入杜尔主编的《法国的工业劳动,危机与发展趋势》1984年英国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M.戴维斯:《危机中的福特主义》,见阿格利塔,载于《评论》1978年第2期。

降和社会损失增加(失业和劳动力的损耗),社会保障系统负担的财政费用日益庞大,成为国家财政危机的基本因素。

同时中央集权的工会通过内容广泛的、统一的工资合同保证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水平至少不至于迅速和大幅度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勒制使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和均质化,从而为统一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工会和规模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工人群众性斗争创造了客观条件。^①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易受技术故障影响,相互联系紧密,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哪怕是相对小规模罢工行动的伤害——只要这些罢工能在经济条件困难时付诸实行——这使劳方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当然,职团主义的官僚化的工会机构无法阻止实际工资的逐渐下降,大规模失业率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分裂过程,但是它们能够阻止关键性工业部门职工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大规模削减。

干预主义国家的危机

福特主义国家不仅是在保证劳动力的维持、培训和调节的意义上的“干预主义国家”。此外它还代表了一种在公司企业高度集中、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国家行政机构与工业界的联盟体系,其技术政策和基础设施政策的方向是确保世界范围内资本增殖的条件。官僚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国家成为危机的一个因素并不仅仅因为它将工人阶级物质再生产的某些标准制度化。除此之外,越来越清楚的是,它实行推进社会技术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在世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为了保持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在本国生产基地的利润稳定、为了维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必

① J. 奥康纳:《积累危机》1984年牛津—纽约版。

须以更快的速度实施推进结构适应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困境。这种正在进行的国际现代化竞争,从全球来看,是保持利润率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社会代价(失业、边缘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越来越大,使这种政策的“可接受性”颇成问题,也使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受到质疑。^① 不管怎样,在有必要实行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增长政策”和建立在人们能够获得物质让步和补偿基础上的分配多元主义和“全民党”——职团主义的大众整合制度之间存在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结构性变革过程中的另一个弱点产生与国家机构和康采恩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这种联系在研究和技术开发(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尤其突出。国家与工业界合办的研究与技术综合体的发展以及国家在研究与技术方面财政拨款的增加体现了来自世界市场的革新压力。在某些方面,甚至高度集中的单个资本的财务和组织能力也不能对付这种压力。军事—工业综合体机构是福特主义国家的特征。它们的扩展已远远超出军事工业部门本身。结果,革新的社会潜力最重要的部分集中于半由国家垄断的机构综合体,导致经济革新中越来越明显的资源浪费和弱点。^② 诸如联邦德国核计划和数据处理计划等大型技术项目的失败,或者是联邦邮政局与电子工业垄断联合的方式从制度上造成技术落后,都可以作为例证。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由于不灵活、计划有问题和转产困难,国家支持的大工业垄断企业已成为适应世界市场经济革新的障碍,从而逐渐削弱技术进步在稳

① F. 弗吕贝尔、J. 亨利希和 O. 克雷耶主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81年莱茵贝克版。

② 约·希尔施:《国家机构与资本的再生产》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定资本利润率方面的效果。

福特主义主体的危机： 消费模式与价值变化之间的矛盾

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条件下的雇佣劳动者具有完全“真正纳入”福特主义形态的可能性或对福特主义形态具有几乎无限的适应性的论据被证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①确切点说,甚至福特主义社会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并不总是起作用的,而且是矛盾的。^②福特主义消费模式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福特主义使劳动力再生产和大众消费成为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的决定性基础,所以它必须努力使消费趋于无限扩张,它系统地将“一厢情愿的生产”制度化并且不断扩大需求。这些需求只能以商品形式加以满足,而这又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③伴随福特主义生产产生的“需求无止境”^④和福特主义消费模式中固有的消费者要求无限大包含了物质要求膨胀的内在趋势,这对维护资本增殖的关系构成威胁。塑造福特主义雇佣劳动者“自我陶醉”的形象有赖于将他们和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这在政治上确实有利于稳定,但在经济上却靠不住。

赫希描述的追求象征地位物品的机制加剧了这个矛盾。^⑤

-
- ① S. 布罗伊尔:《主体化与机械化,关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组织联系》,载于《利维坦》1978年第1期。
 - ② H. 马尔库塞:《普罗米修斯的恐惧,关于技术与社会的25个命题》,载于《新论坛》1979年第20—21期合刊。
 - ③ 达米科:《需求与商品形式》,载于《目的》1978年第35期。
 - ④ J. 奥康纳:《积累危机》1984年伦敦版。
 - ⑤ F. 赫希:《增长的社会限度》1977年伦敦版。

如果消费品的个人使用价值恰好由于这些消费品是大众消费品(如在阻塞和污染的道路上行驶的汽车)而降低,因此几乎总是必须考虑到大众消费中制约消费品使用的“外部效应”,那么,结果可能是现金收入增长与需要的实际满足程度下降相伴而行。这种机制必然导致进一步追逐金钱,从而形成显然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一般说来,可以假设福特主义社会化形态必然造就与维持其正常运行的规范、工作纪律和消费准则相抵触的信念。异化劳动、用商品的形式满足需要、商品化社会服务和对官僚机构的依附增强了人们对个人自发活动、“独立工作”、非传统消费形式、非商业化和非规范化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渴望。对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加深的依附引发了要求自行管理和争取自治利益集团政治代表权的呼声。消费主义视为当然的欲望无穷、传统价值取向和准则的沦丧、个人关系的商业化、社会疏远和自我陶醉的个人主义包含了“文化解放进程”^①的可能性,其后果难以预料。该进程并非事先就可以认定具有反叛性,但决不能与福特主义价值体系完全契合。拒绝争取福特主义的成功、不按福特主义社会规范行事、激增的要求和零星的反叛,这些因素日益瓦解福特主义社会形态的复杂结构。

生态危机

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获取廉价原料和能源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无限制地利用大自然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免费生产力”的可能性。在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

① T. 齐厄:《自我陶醉易受伤害,文化解放过程的心理反映》(手稿) 1981年。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料来源和市场的帝国主义控制是其决定性的前提。可是现在对原料的利用以及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至关重要的生产过程的自然前提面临遭到破坏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利益受到损害,难以接受。这不但不可避免地迫使国家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制定规章,进行干预,而且导致了专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生产单位日益增多。因此产生了没有真正满足需要的“破坏性增长”。^① 即使有人设想单个资本在许多领域里从事“环境保护”相当有利可图,无论如何,物质再生产总水平还是下降了,需要改变既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在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引起抗拒、摩擦和冲突,更不用说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开辟了一个新的、难以捉摸的方面。不管怎样,支撑福特主义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资源浪费和对自然界的破坏被证明是代价越来越大。

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

除了在处于中心地位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更大的市场以外(如欧洲共同体),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是有选择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工业化,将技术较简单的产品的生产向这些国家转移,同时向这些国家转移与这种生产相联系的对廉价的、往往由妇女充当的劳动力的超额剥削。这证实并体现了沃伦斯坦的理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依赖非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存在,即依赖剥削工资低于其物质再生产水平的劳动力的可能性,剥削的方法是支付勉强糊口的工资就地生产(使工作女性化)。^② 实际上,转移生产的战略是导致主要资

① A. 格斯:《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1983年伦敦版。

② I. 沃伦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年伦敦—纽约版。

本主义国家增长缓慢和失业的原因。^① 基于建立若干超额剥削孤岛的“血腥泰勒制”^② 的稳定利润的效果与“边缘地区福特主义”战略同样有局限。这种战略将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特主义生产系统,而不让它们在技术上自立、实现平衡的国内发展和社会管理。^③ 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福特主义的不稳定还表现在国际债务危机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上。国际债务危机极大地限制了特别是向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出口生产资料的机会,而这些地区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只能通过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恐怖主义政权艰难地加以“平息”。正如对原料的利用存在局限一样,通过“外围地区”资本化和第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第二世界”)的依附性工业化来稳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的做法也存在局限。

四、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轮廓

从目前的危机中,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否会出现? 怎样出现以及以什么形式出现? 这些都是难以

① F. 施鲁普:《国际化与危机》,载于《利维坦》1979年第7期第1页。

② A. 利皮兹:《走向全球的福特主义》,载于《新左派评论》1982年第132期。

③ G. 西摩尼斯:《联邦共和国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载于《利维坦》1979年第7期第1页。

预料的。它取决于世界范围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其结果仍悬而未决。然而从福特主义危机的原因出发,基于已经显露出来的重新构筑资本主义的倾向、方案和计划,已可能勾画出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和新的资本主义支配结构可能呈现出的轮廓。这不是预告预期会发生的一般社会发展的问题,而是指出将构成未来冲突的真实而矛盾的趋势,有必要从福特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危机着手。

超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劳动组织

新的积累模式的确立要求开发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周期载体的生产技术。除了分子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尚未充分预见的后果以外,尤其是新的信息技术、长途通讯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可能成为“超工业化”的基础,能够特别使服务业发生根本变革。正如“给共和国安装电缆”这个口号所表明的那样,这将对主导消费模式和社会化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微电子革命”使社会劳动关系的深层次变革成为可能。资本正在对泰勒制劳动过程及其政治和制度“上层建筑”的危机作出反应,引进主要基于微电子学的新的信息处理、计划和管理技术,旨在重新发动合理化与减少活劳动力的历史性运动,但仍难以完全实现建立无人工厂的目标。^①更确切地说,劳动过程的改组旨在确立人和机器之间新的、更加灵活的结合方式,在雇佣劳动者中实行新的等级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劳动关系个体化。其目的是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使从事泰勒制批量生产的工人分裂和多样化,降低生产过程的脆弱性,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连续生产),削弱建立在标准化工作条件基础上

① H. 克恩、M. 舒曼:《劳动分工终结了吗?》1984年慕尼黑版。

的共同利益组织。

然而,这是否会像克恩和舒曼所假设的那样导致从事泰勒制批量生产的工人逐渐消亡,是值得怀疑的。“新的劳工政策”旨在形成由少数拥有高等熟练技术文凭的雇员组成的享有特权的核心,委以监督和指导的复杂任务。可是,与此同时,可以设想,在工业生产的核心领域和管理服务部门,听命于他人的、非熟练技术的、单调的工作将继续存在。新的信息处理、计划和管理技术使在更高的层次上确立泰勒制成为可能。总的来说,这些技术决定性地增加了企业决定劳动过程发展方向的自由度。在生产过程中,人和机器能够在时间以及空间上分离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意味着活劳动的使用越来越不取决于技术必要性,而能够更多地反应节约劳动力方面的考虑。即使实行“弹性”工时制并向连续不间断工作过渡成为可能,也使工作与机器在空间上脱钩(用电脑在家上班的新形式)以及工作场所、工资的确定和劳动合同条件彻底个体化成为可能。^① 利用微电子技术改组福特主义劳动过程远非局限于通过诸如成立部分自我管理小组重建装配线。^② 除了有技能的、相对自我管理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工人以外,在新的技术基础之上还产生了新型的从事批量生产的工人。确切地说,他们在空间上并未集中于一地,也未联合起来,工作条件不尽相同,而是高度个体化、工作时间弹性化和工作地点分散化。泰勒主义化的、没有技能的、从事批量生产的工人并未消失——特别是当存在廉价劳动力结构性供应

① 《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1983年)受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委托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② B.科里亚特:《在批量生产的全体工人中的分化与分裂》第49页。

过剩的时候。“弹性化的”及次要和没有保障的工作、兼职、家庭佣工和临时工不但会继续保留,而且还会发展,虽然总的来说物质生产核心部门、管理和服务部门的就业会削减,群众性失业会增加。^①

社会的二元和分裂

与物质生产及管理和服务部门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后泰勒主义”变革相联系的合理化运动给社会带来双重分裂。在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现代”工业、金融和服务部门核心内,两部分人的分裂日益加剧,一部分是有技术的、高薪的、雇佣条件相对安定的“稳定的”雇员,另一部分是与公司没有联系、在临时和转包条件下从事简单的、经常变动的、工作无保障的“不稳定的”工人,^②甚至包括形式上自给自足的半就业者。同时必须考虑到失业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在存在失业的基础上,一个边缘化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发展起来了。这个边缘(或美其名曰“非正式”)部门以其小生产、手工业、零售业及多种形式的“替代”服务业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面向世界市场的超工业化进程所遗留下来的、或提供的空缺和职位。随着工业生产、国家和工商管理以电脑为基础实行合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服务业的工业化,一个次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发展起来了。就劳动条件而言,这个部门的特征也是工作不确定、工资低、多半不要求什么技能、

① G. 勃兰特:《后工业社会中劳动的未来》,载于《HIS》杂志 1981 年第 5 期。

② 参见 B. 科星阿特:《在批量生产的全体工人中的分化与分裂》第 59 页。

不提供或只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① 核心部门中的次要雇佣劳动和非式生产、服务部门中的次要企业体现了社会二元化和分裂的复杂趋势。这个趋势在福特主义阶段业已存在。^② 但现在可能会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这种事态发展显示了后福特主义社会阶层分化的倾向,这种分化包含了“核心”和外围之间新的阶级分野的成分。

然而,这将不一定导致在社会—政治上完全排斥失业大军或那些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南非化)。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甚至边缘部门都要受“福利国家”的管理、控制和补贴,以特定的方式促进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培训系统以便至少暂时吸收失业者,以及通过一个(经费削减了的)系统发放失业救济金——部分原因是需要使甚至边缘社会群体也能作为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接受者保持稳定,从而把他们融入后福特主义消费模式之中。

一般说来,人们能够觉察到一种可以被描述为社会劳动“家庭妇女化”的趋势。^③ 即使在工业核心部门仍然保留着兼职、临时工和在家上班的工作,这些工作无须特殊技能、无保障、工资低,可以说是“女人干的活”,尽管劳动力的核心部分技能熟练、工作稳定,然而,与此同时,社会雇佣劳动总的来说越来越不足以保证再生产的物质水平。可能会出现与福特主义雇佣关系的

① 戈斯:《劳动的二元化,以美国为例》,载于《左翼杂志》1984年第174期。

② J. 艾瑟尔和约·希尔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家,一种后福特资本主义政治调控模式》,载于《宣言》1984年第56期。

③ C. 韦尔霍夫:《无产者已经死亡,家庭妇女还活着吗?》,收入巴登符腾堡绿党社会福利与医疗保健专业委员会发表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未来》1984年斯图加特版。

推广和与之相关的再生产领域资本化相反的倾向。新形式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的工作大量发展。这些超工业化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社会补充物有“非正式”部门中的“新型自给自足”和超额剥削,以及更多的人在家从事“独立工作”。从资本增殖的观点来看,社会成功实现二元化、分裂和等级化的作用在于从整体上降低劳动力物质再生产的水平(尽管差距会拉大)。同时,一支多层次、多半具有较高学历的和流动的劳动力“后备军”可供作为次要的和流动的雇佣劳动者使用。超工业化过程引起的消费和服务需要,从健康食品商店到生物能和自我发现创作室,都可以由边缘化的“非正式”部门加以满足。该部门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福利国家和政治上强制性管理和控制将这个分裂的社会连为一体。总而言之,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内部极端严重的社会(以及地区)异质化,即帝国主义造成的北方与南方的差距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自身内部重现。

专制的国家主义和分裂的社团主义

归根到底,问题是怎样能够创建一个与后福特主义积累模式和社会模式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结构,这个统治结构将把这个社会连为一体,形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板块”,使其矛盾不致激化,加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凯恩斯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充分就业、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强大的工会和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之上的。基本上通过社会民主党来实行中央职团主义的政治管理方式是其特征。我们能够预料在这种国家之后会出现什么形式的政治制度呢?后福特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在由福特主义危机所导致的、正在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分野和分裂的基础之上,它必须逐步形成使新的积累模式

和社会模式的确立成为可能、甚至促进其发展的政治管理形式。

从根本上说,可以认为,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后福特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决不会是听任“市场力量”无障碍地自由发挥作用的软弱无力的、无所作为的国家。相反,它是强有力的,因社会利益的多样性而获得自主,在许多方面都是干预主义的,并且高度武装,对国内外而言都是如此。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状况所致。其特征是国内外的变动和冲突加剧,争夺(部分通过军事手段)原料来源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冲突和分裂迅速扩大。此外,在世界市场竞争和持续不断的生产国际化的压力下,强制推行结构调整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大,这很可能遭到国内的抵制。

后福特主义国家的基础是一个阶层众多、严重分裂的社会。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倾向于使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丧失选票。^① 与此同时,工会有最终沦落为仅仅代表有特权的核心工人的类似职团主义利益的危险。^② 这意味着支撑凯恩斯主义国家的主要支柱的坍塌和中央集权的国家职团主义政治管理模式的失败。这种职团主义将广泛的(阶级)利益集团组织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可以在“已经成为无定型的社会力量关系”内部觉察到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分化的职团主义的兴趣,这种职团主义的基层组织是由职业、地位和利益不同的相互竞争的集团构成的。^③

① C.伯西-克鲁克曼:《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的凯恩斯主义化》1982年汉堡版。

② P.洛山法戈:《社会民主党之后》,载于《海盜》1982年第11期第72页。

③ 同上,第74页。

管理这种分化的职团主义社会并使之稳定的政治体制必定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国家不同。在这些差别中,首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行使镇压和监督职能的国家机器;此外还有福利国家的“重建”,与过去一样,福利国家必须加强和深化社会分化,同时将社会分化置于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问题不可能仅仅是简单地“摧毁”福利国家制度,而是鉴于物质救济较少的总形势,区分这个制度对于社会分化、整合和控制的潜能。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包括:对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集团有利的、有选择的私有化战略(从收集垃圾到私营保险业,甚至到私立大学);对边缘化部门的“自助”进行金额不多、而且附加一些限制条件的资助;“解除管制的”基金、或不受法规的约束的专为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干预而设的基金;社会救济在数量意义上的增长。这种救助在物质上很有限,得到的法律保障支持不足,以牺牲制度化的社会保障系统为代价(如失业的情况),并且部分是通过教育系统重新等级化(“培养精英”)来实现的。如今,福利国家机器分裂为享有特权和法律上受保护的部门以及多半拥有自行决定权的“管理扶贫事务”的机构两部分,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权力下放”、“民间进取精神”和自助起着双重作用;对于那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稀疏的“社会保障网络”中跌落下来而无其他谋生手段的人来说是纯粹存在主义的需要,而对于有钱人来说则是一种特权的形式。所以“社会保障国家”的后福特主义的变体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和更具有选择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国家行政机构来实行有关的社会分化和排斥。在危机中和在可以觉察到的新积累模式的条件下,不团结和非政治化的事态必然发生。国家必须做的是建立健全的、使这种事态发展成为可能并同时在意形态和政治上使之保持稳定的政治管理机构。在政

党制度层面可以看到相应的趋势。主要的群众性的政党似乎正在由成员广泛的“人民党”、由疏导和融合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党、由发挥媒介作用、促成多元化权力分配妥协的党,转变成极端官僚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化的政治机器。鉴于物质让步的幅度下降,这些政党的主要作用在于宣传使严重分裂的社会——其特征是社会分化的职团主义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和谐一致的思想。这要求将政党机构重建为能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和商业营销策略的公共关系机构,重建后的机构能够提出一套将专制主义与平民主义融为一炉的思想,这套思想为重要的利益集团所不容,但却清楚地表达出社会复杂的分裂状况。^①

这套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轮廓已清晰可见,像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价值几乎完全不被看重。取而代之的是,成就、成功、精明、隐私、家庭、牺牲和道德等价值又再度流行。与一个越来越分裂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分裂为相互竞争的社会地位不同的集团,正分裂为“精英”和被排斥阶层——相对应,逐渐形成了世界的形象,这些形象由以下一些混合体构成:对于个人成就的推崇和为了安全而实行专制的必要、愿意使用暴力与弥漫的忧虑、集体的积极进取性和个人的与世无争、伪自由主义与削弱的道德、独身文化与虚构的家庭田园诗。作为已经消失了的在物质上的共识的替代物,民族主义再次有了用武之地。必须用现存的旧的和新的敌人的形象来掩盖日趋加剧的社会分裂:外国人、逃避现实的人、社会寄生虫和异端分子、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俄国人、当然还有美国人。这种事态发展的逻辑显示了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一种可能导致政治“非正式化”的变化,即集体

^① J. 艾瑟尔和约·希尔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家》。

机构和利益集团组织的重要性丧失,社会冲突“非官僚化”、“非制度化”和专制平民主义的非政治化。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理论宣传可以忽视重要的利益集团,但是,在一个分裂和政治“非正式化”的社会,这些集团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这样组成、分裂、重新联合、挑起重新争斗和重组,以至于将他们纳入新的支配结构的框架。

因此,后福特主义的起源带有“来自下层的被动革命”的特征。然而,后福特主义是否确立或以什么特定的形式确立仍悬而未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历史上屡次遭遇危机而陷于停顿,它并非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即使在资本关系范围内也并非如此。危机的力量为建立新的资本积累和社会模式平整好了地面,但是它也引起了新的矛盾与冲突。近年来兴起的非主流文化和“新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福特主义及其危机的产儿,它们当然会继续受到福特主义的矛盾的制约。它们是否最终将只是“来自下层的被动革命”的工具,或者它们是否能够改变力量的社会政治关系而使以人道的形式解决危机获得机会,目前尚未清楚。

(李春放 译)

后福特主义的世界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

阿兰·利皮茨

吉恩-克里斯托弗·鲁弗因写了一篇挑战性的文章(1991年)^①,把“冷战”之后的世界新格局同4世纪的罗马帝国作了比较:富裕地区构成一个四边形,周围是一圈并入帝国版图的地地区,这些地区把富裕地区同未知的野蛮地区隔离开来。

的确,今天的世界由下列一些地区组成:

1. 划分为三个大陆集团的、并分别受美国、德国和日本“支配”的发达地区;
2. 最终变得对主导性经济力量没有价值的边缘地区(安第斯条约组织成员国、非洲、印度和中国内地);
3. 在“帝国”和“野蛮地区”之间,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不断成长起来,它们梦想着成为“罗马的公民”,即成为经济合作

* 本文译自德国《社会主义》杂志1997年第7—8期附刊,作者是巴黎应用数学经济学制定计划的远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① 吉·鲁弗因:《帝国与新野蛮地区》1991年巴黎版。

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本文拟阐释促成世界“新格局”的原因之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变化。

战后曾占主导地位的雇佣关系——福特主义的危机在发达国家导致了多种道路的出现：一些国家选择了“灵活化”，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动员人力资源”。“新兴工业国家”增强了竞争能力，并且相互之间有所区别。这些情况导致了世界经济等级结构的全面转变。

此外，还有一种趋势也表现得日益明显：国际经济关系向几个大陆集团（欧洲、美洲和亚洲）集中。这三个集团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所联合起来的经济具有多样性。因此，本文将具体分析采取了不同劳动制度的各国，在一个一体化的大陆集团中的共存现象。然而，我们将会看到，美洲集团选择了不同于另外两个集团的道路。这一点可以解释它的相对衰落，类似于罗马相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那种衰落。

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将探讨主导性经济力量所选择的摆脱福特主义危机的出路，然后分析其他经济力量所选择的道路；在第三部分提出一种新的（第三次）国际分工假设；在第四、五、六部分回过头来分析三个集团的对比性特征；在第七部分将探讨这种新等级结构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其焦点是决定地球未来的关键问题；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所采取的行动。^①

① 第一部分有些内容参见利皮茨向1990年墨西哥“拉美的一体化和民主化历程”等系列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新的中心—边缘关系》。关于世界新等级结构的地缘性战略的结果，参见利皮茨：《迈向新经济秩序——后福特主义、生态和民主》1992年牛津—纽约版。

中心地区福特主义的危机及其出路

福特主义的兴衰^①

首先来简要地回顾一下福特主义的含义。正如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对福特主义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作为劳动组织(或“工业范式”)的一般原则,福特主义可以称为泰勒制加机械化。泰勒制意味着,劳动科学部门的职责是在设计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化的和事先确定好的任务;作为宏观经济体制(也作为“积累体制”或社会积累体制),福特主义意味着把由这种组织原则带来的生产增长,一方面以利润投入的方式转化为投资增长,另一方面用来提高工人工资的购买力;作为操作规则(或调节方式)的体系,福特主义意味着长期采取这样一种雇佣关系,它严格限制解雇,并根据价格指数和一般生产增长指数有计划地提高工资。此外,它还意味着社会福利国家借助广泛的收入社会化办法来保障雇员的最低收入。

因此,在福特主义模式下,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

^① 下面这一部分摘自下列著作:A.格林等:《黄金时代的兴衰》,载于S.马格林和J.朔尔主编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战后经验的重新解释》1990年牛津版。利皮茨:《幻影和奇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问题》1985年巴黎版。《全国和地区——以何种方式面对资本的世界危机》1985年巴黎版。

上的需求主要是由工资引起的。由于不同的国家都在同时增长,并且相对国内市场的增长而言,国际贸易所占的比重较小以及美国在经济上处于霸权地位,外来的推动力是有限的。

首要的和最明显的危机原因产生于“需求方面”。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竞争水平大致相当。发达国家之间追求级差盈利的行动导致了生产和市场的国际化,而来自南方国家的原材料(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又加剧了70年代初的出口竞争。结果是在实行福特主义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生产转移到非福特制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以此来逃避国内的工资规定。这样一来,平衡外贸的必要性使通过工资政策调控国内市场增长的做法遇到了困难。

针对需求方面的危机,各国首脑人物最初所采取的对策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他们的主要主张在于维持世界需求的协调增长。然而,到70年代末,已明显看出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利润率下降。在这一点上,供给方面的许多做法是负有责任的:生产率增长缓慢,整个劳动成本(包括用于社会福利国家的间接工资)提高,资本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上升,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从此便产生了转向“供给政策”,即转向调整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办法。

对供给方面的这些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作出解释。官方在70年代末的说法是:劳动成本的相对提高是“黄金时期”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果。^① 利润太低是因为工人力量过于强大,而情况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操作规则过于“僵硬”。因此,最早是英国政府、接着是美国政府采取了“自由灵活性”的政策。继它们

① 参见伊藤诚:《价值与危机》1990年伦敦版。P.阿姆斯特朗、A.格林和J.哈里逊等:《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1984年伦敦版。

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部分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政策。原有的社会妥协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方面被放弃,这涉及提高工资的规定与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水平,也涉及解雇自由和扩大临时雇佣制。

然而,80年代的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并没有给坚决采取灵活性制度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带来好处。相反,这些国家遇到了工业生产能力下降和贸易赤字的麻烦。80年代末,竞争的胜利者(日本、德国)靠着用一种替代性的办法解决供给危机而出名。

对福特主义危机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泰勒制原则的效益不断下降。但是,用充分就业虽然可以解释60年代末的利润率下降现象,但不能解释这种趋势为什么在以后的年代还能得以延续。今天看来,使直接生产者在执行生产过程中放弃决定权的任何约束是不明智的。这种办法虽然有助于管理部门直接监督劳动强度^①,但是,如果使直接生产者能有较大程度的“责任自主”,就会导致一种优越的组织原则,尤其由于在引进新技术或“即时生产”办法而要求直接生产者发挥动脑筋的能力并自愿地同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合作的时候。而后面这一点正是日本、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许多企业所选择的替代办法。在这些国家,工会和其他组织传统的压力促使人们选择“协商约束”来解决福特主义的危机^②。

到80年代末,这种替代办法的优点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初看上去,自由灵活性制度和“协商约束”好像是两种可以互为

① A. 弗里德曼:《工业和劳动》1977年伦敦版。

② R. 马洪:《福特主义向何处去? 新技术、劳动市场与工会》,载于《经济与工业民主》1987年第8卷。

补充的策略。这种看法构成了皮奥里和萨波尔(1984)提出的“灵活的专业化”这种“后福特主义”方案的基础。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两种办法是不能相互兼容的。

福特主义之后是什么?^①

实际上,这两种解决供给危机的学说可以看做是针对福特主义劳动关系的两个特点提出的两条出路:一个特点是劳动协议的刚性,另一个特点是作为管理部门直接监督工人活动的形式的泰勒制(参见图1)。前一种学说主张劳动协议由“刚性”向“弹性”发展,后一种学说主张把“直接监督”转变为“责任自主”。第一条轴线(纵轴)注意到劳动关系的“外在”方面,即企业同求职者(和工薪领取者)的联系;第二条轴线(横轴)注意到“内在”的方面,即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和合作等级结构^②。在后一条轴线上:

1. 与泰勒制不同,日本、尤其在丰田公司发展了一种日本生产方法理论家引以为荣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企业主义)^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第一条轴线即“外在的”轴线上,刚性和弹性包含许多方面,外部劳动市场是或多或少的有组织的。因此实际上这条轴线是一条综合性的轴线。除了市场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个人、职业、企业、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制定

① 这一部分的结尾和下一部分摘自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的一个合作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结论一章是由我负责编写的。参见利皮茨:《幻影和奇迹——第三世界工业化问题》1985年巴黎版,亦见R.布瓦耶:《后福特主义》1993年巴黎版。

② 参见P.德林格、M.皮奥里:《国际劳动市场和人力分析》1971年纽约版。

③ 参见B.科里亚:《思考》1992年巴黎版。

规则。第二条轴线即“内在的”轴线同样也包含许多方面,其中“约束”一词包含素质、横向合作、参与职责的确定和监督以及产业改组的协商等内容。这条轴线同样也是一条综合性的轴线。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个人约束方面的协商层面为可能做到的灵活性划定了界限。

2. 约束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协商,并在奖金、提升机会或其他方面得到补偿。这种办法与最大限度的外在灵活性并不相抵触,但它受约束的集体性特征的限制,而这种集体性特征是大多数合作生产过程所必需的(见图 1I)。

3. 约束也可以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管理部门与工会之间协商(见图 1F)。在这里,企业及其劳动力分享由他们在集体学习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专门素质所产生的利润。这种做法包含了企业层面上劳动协议的“外在”刚性,就是说在企业层面上已经开始限制解雇工人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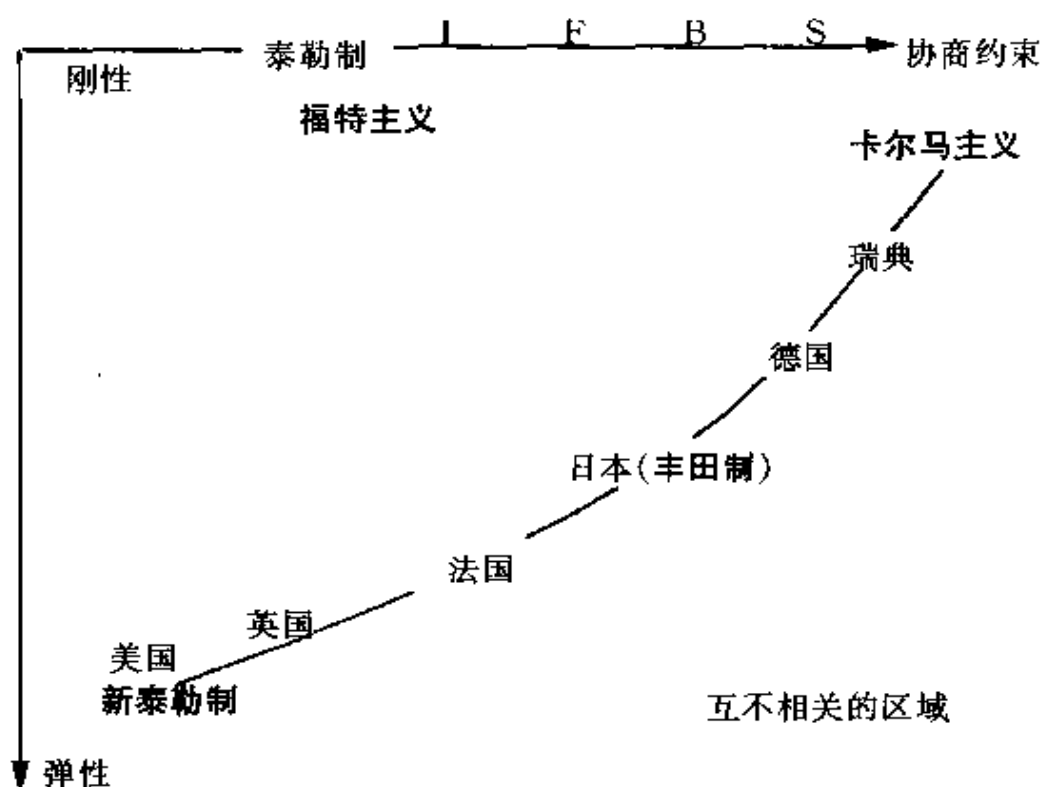
4. 约束也可以在部门层面上(见图 1B)进行协商。这种做法可以给企业减少由“社会倾销”造成的竞争危险,鼓励它们共同建设培训机构等设施。这样做还可以使“外部的劳动市场”可能组织得更好一些并且总的说来更加稳定。

5. 约束还可以在整個社会层面上进行协商(见图 1S)。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在地区或整个国家范围^① 内部社会问题和产品分配进行协商。工会当然要尽量做到让“自己的人”在车间或办公室“尽心尽力”。在这里,外部劳动市场很可能组织得跟更带有社团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福特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一

^① 如何使区域范围适合社会范式,是很难研究、也很少研究的问题之一。参见利皮茨:《全国和地区——以何种方式面对资本的世界危机》1985年巴黎版。

样好。

图 1 后福特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



(注)I:个人层面;F:企业层面;B:部门层面;S:社会层面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与其劳动力之间针对某个层面(个别企业、部门或地区)上的“外部灵活性”没有共同的目标,就不会出现工人的集体性约束。因此,“灵活性”和“约束”之间相互关联的界线是一条曲线,它把两条轴线联结起来,并把与两条轴线没有关联的一个三角形区域排除在外,在这个三角形区域中,灵活性和通过协商达成的集体性约束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只有

当这种组合所涉及是同一个社会的劳动市场的环节时,它才是可能的。一般说来,可以排除弹性制工人团体通过协商达成的约束,即皮奥里—萨波尔模式。

这样,两条轴线构成了值得优先选择的发展途径,即两种真正的范式(参见图1):

1. 一种是外在的灵活性同直接的等级制监督相结合。这种范式导致了一种泰勒制的劳动组织形式,但不存在福特主义黄金时代的那种社会上对立的双方。我们把这种范式称为“新泰勒制”。

2. 另一种是劳动协议的外在刚性同工人的协商“约束”相结合。我们称这种范式为“卡尔马主义”。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第一家用这种原则进行改组的汽车工厂(沃尔沃)曾因采用这种范式受到称赞。这家工厂今天已经关闭,我们要看看原因出在哪里。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近年来的经验,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沿着两条轴线间的关联曲线所走过的一束轨迹有所区别:美国和英国优先选择弹性制,放弃约束;有些国家(如法国)采取在个人层面上协商约束的做法;日本实行(大)企业层面上的、德国实行部门层面上的协商约束;瑞典离卡尔马主义轴线最近。日本处于一种可称之为丰田主义的中间地位,其特征是外部劳动市场具有很大的两重性(刚性/弹性)。^①

^① 注意:丰田主义不是大企主义,它把大企主义作为工业范式同劳动关系的一种特定形式组合起来。

其他地区采取了什么形式的后福特主义？

东方国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劳动关系形式(他们以一种有争议的方式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形式),而南方国家则是指那些没有照搬西方或东方模式的国家。对南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采取“异端的”模式(它们包含东方模式的某些方面),似乎是它们赶上西方国家的出路。尽管现在看来现实社会主义的尝试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回顾一下迄今仍在许多新的边缘国家留下印记的那些道路,还是有意义的。

失败的模式：“社会主义”

大致地讲,苏联有如下特征:

1. 受不完全的泰勒制影响的技术范式;
2. 建立在受到统一关税壁垒保护的进口替代基础上的积累体制;
3. 国家管理机制和雇佣工人在唯一的组织中达成妥协(国家即党),保证工人贵族的某些利益。^①

这种调控方式允许由一些弱小的变种存在,如人们所说的“社团主义?”

^① 在用“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对“现实社会主义”作理论解释时,可以把(也可以不把)“管理阶级”称为“资产阶级”。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是工薪阶级。

这种模式(不完全的泰罗制、进口替代、社团主义)也流行于所有 1930—1970 年间试图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图 2 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制度比福特主义有“更大的刚性”(不可解雇原则,即终身制),^① 由工人贵族约束的协商层次更高,即处于企业和部门之间。^② 这种模式的危机主要归因于它的刚性,而危机又导致了向弹性和“合理化”的全面转变,即转向图 2 左下方的模式。

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农业大国

中国和印度是最早采用苏联发展模式的两个南方大国,它们同东欧国家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农业规模相当大。

中国曾进行过农业改造,对它的“农村世界”进行严格组织,并从中获益。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直到 80 年代末还没有出现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这是一种“隐性的刘易斯主义”模式,^③它的人为制造的劳动力短缺,是很适合旨在实现进口替代的准苏联式粗放积累战略的。尽管如此,在 1958—1974 年间,中国也

-
- ① “终身制”是个法文概念,原意是指农民有权终生耕种一块土地,即使他不是该土地的占有者。这里用来指雇佣关系的刚性。终身制是一种稳定的、解雇可能性很小的雇佣关系。
- ② 参见科勒:《没有黄金时代——东欧》,载于 J. 朔尔和 J. I. 尤主编的《处于变化中的生产关系——一个全球性的展望》1990 年伦敦版。
- ③ “刘易斯主义”出自亚瑟·刘易斯,他对第三世界的状况做了如下界定:无论在什么价格水平上,劳动供给量与劳动需求量相比都是无限的(参见丹·莱沃尔涅和利皮茨的文章《后福特主义政治模式的全球比较》,载于《论证》1996 年总第 217 期第 697 页脚注 7)。

以实行(管理部门直接监督工人的泰勒制形式的)技术范式和(中央计划的)调控方式为目标,做过几次试验。很难估计这些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微观经济革命”^①,在多大程度上为邓小平战胜毛泽东的继承人后,在中国取得“重建资本主义”的成就作了准备。

在印度谈不上什么农业改革,也未曾有过“国家社会主义”和真正的中央计划。然而,在它独立后的工业历史上仍然可以看出苏联模式的一些迹象。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推动了面向国内市场的重要的第三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发展,这些部门的雇员也同东方集团国家的雇员一样,从“不可解雇原则”中得到好处,就是说受惠于由政治考虑所决定和支持的就业制度(第一产业)^②。这些工人(像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很少享受协商约束的权利,但也没有完全服从泰勒制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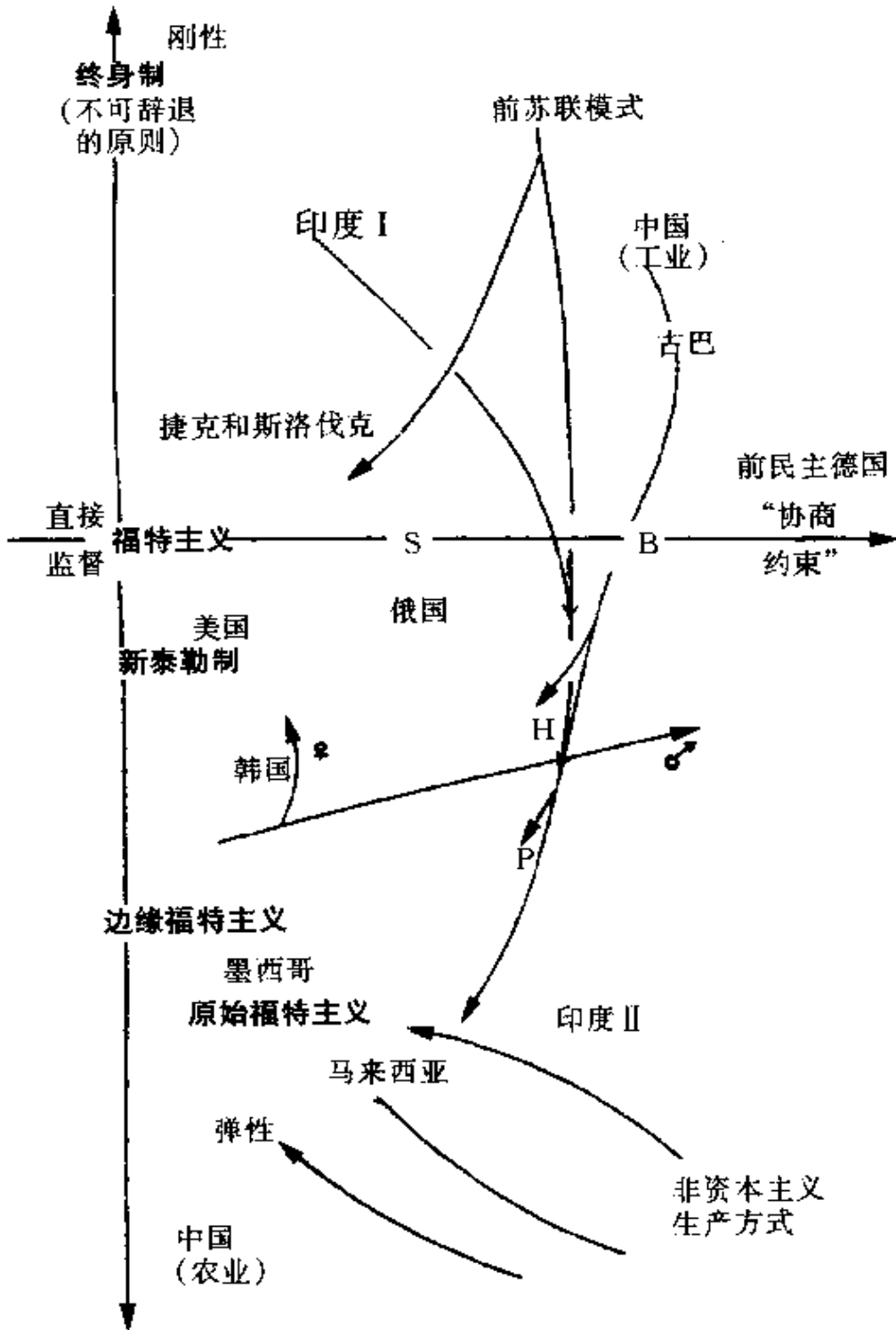
印度同中国的重大区别在于它不断地在原始泰勒制中摇摆,数量有限的人或者处于前资本主义关系中,或者通过“产出制度”的一些形式与资本主义关系一体化(第二产业)^③。因此,在农业印度的大洋中出现了第二组工业劳动关系群岛。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在这些地方泰勒制没有达到由一个管理部门直接监督的程度,这种管理部门几乎不存在。在图2的资本—劳动关系示意图中,这个过程可用从右下角开始的一个箭头表示。

① 参见K. 里斯金:《中国的改革和体制变化》,载于J. 朔尔和J. I. 尤主编的《处于变化中的生产关系——一个全球性的展望》1990年伦敦版。

② J. 莫汉·拉奥:《印度的劳资关系——连续性和变化》,载于J. 朔尔和J. I. 尤主编的《处于变化中的生产关系——一个全球性的展望》1990年伦敦版。

③ 同上。

图 2: 南方和东方国家的后福特主义



8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趋势很可能会给印度和中国带来走向典型原始泰勒制形式的劳动关系。随着对国际竞争对手的开放,第二产业也采取了较为彻底的直接监督形式,但在实际工资和社会立法方面没有明显改善。第一产业不再实行不可解雇原则(终身制),但是享有特权的劳动力集团有可能通过协商取得有限的弹性制,福特主义模式的社会对立双方可以就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进行协商。

印度模式很有意思,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理解拉美国家所谓“拉美模式”的某些发展政策。这里是指有些国家(按照拉美模式的理论目标)把下列因素组合在一起:

1. 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建设现代工业部门,并且往往是在民众主义政策的保护下做这项工作的;

2. 农业经济继续存在,它的社会关系不如说是原始的,这种关系引起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流;

此外,从墨西哥一直到阿根廷,还可以看到下列现象(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3. 在第一产业内部,相对“固定”的工人贵族阶层被迫接受残酷的弹性制和“合理化”(实际上是实行泰勒制);

4. 起源于农村的第二产业走向城市化,并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雇员开放,这种现象或者归因于一个“非正式”部门形成的无序过程,或者归因于直接进入实行灵活性劳动协议的泰勒制企业。

这种新的边缘类型的工业化(与印度、中国、拉美模式以及进口替代制度相比)值得单独研究。

“新兴工业国”向何处去?

7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国”,例如巴西、韩国。对这

种发展模式的某些方面,有人曾以“原始泰勒制化”和“边缘福特主义”为题目作过研究^①。

原始(或血汗)泰勒制化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在社会构成中数量有限的福特主义工业部门,转移到剥削程度(在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方面)很高的社会形态中,它们的产品通常返销到发达国家。60年代亚洲的免税区和“加长的工作台”是这种策略的最好例证,这种策略今天仍在不断推广。

可以肯定,这种体制有两个特征:第一,生产活动通常遵守泰勒制原则,但机械化程度却相当低。实行这种制度的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特别低。因此,这种策略避免了进口替代政策的一个缺点,即生产资料必须进口。此外,由于这种策略主要使用妇女劳动力,它也吸取了来自家庭夫权主义剥削传统的全部知识。

第二,说这种策略是一种“血汗”制度,是从马克思关于英国资本主义前夜的“血汗立法”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它除了保留压迫妇女的传统做法以外,还增加了压制工人的一切现代武器(国家控制的工会、缺乏社会权力保障、对反对派实行关押和刑讯)。

与福特主义一样,边缘福特主义也建立在把扩大积累同发展最终消费市场联系起来的基础上。但是它的边缘性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流通中,大部分熟练劳动(特别是工程师的工作)都是在这些国家之外进行的。此外,销售市场要适应由本地中产阶级的消费、工人日益增长的对日用品的消费和向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廉价商品出口,这三者组成的特殊结构。

我们举巴西为例。巴西的工业化比印度开始得早,成就也

^① 参见利皮茨:《幻影和奇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问题》1985年巴黎版。

更大,尽管印度模式同巴西差别不大。1964年的军人政变取消了瓦加斯时期促进社会福利的立法,其后果是推进了纯粹依赖技术发展的泰勒制“科学的劳动组织”形式。血腥镇压工会运动为资本提供了“弹性制的”劳动力。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西建成了很有竞争力的工业,实现了进口替代,扩大了工业出口。从这种原始泰勒制中获得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以发展双重的、边缘的福特主义。

一部分人(新中产阶级)达到准福特主义生活水平。工薪劳动者在70年代下半叶,也从机械化和合理化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中获得好处。后者包括绝大部分“正式部门”的雇员^①。另一方面,还有很大一批工人没有分享到巴西奇迹带来的好处:他们是被“刘易斯模式”困住的以前的农民、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和正式部门小企业中工资很低的工人。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接着出现了民主运动。

这种局势使发展趋势变得相当复杂。工业部门的矛盾主要是分配矛盾。在这场持续不断的风暴中,处于社会边缘的刘易斯模式下的劳动后备军、非正式部门以及正式部门的不同层面都受到冲击,劳动关系无法保持不变。面临这种混乱的局势,巴西未来有三种可能性选择:回到原始泰勒制,巩固边缘福特主义,或者甚至走向局部正向丰田制发展的福特主义。

与巴西相比,韩国1985—1987年的革命拥有许多更为有利的初始条件。对所有其他改革来说,1950年的农业改革以及此后实行的农民收入补偿制度是基础。韩国的原始泰勒制没有遇

^① 参见E.阿马德奥、I.M.卡马戈:《巴西的劳资关系》,载于J.朔尔和J.I.尤主编的《处于变化中的生产关系——一个全球性的展望》1990年伦敦版。

到刘易斯模式劳动后备军的不断冲击。所有劳动力都被正式雇用(即使通过弹性劳动的方式)。另外,国家努力规划好出口规模,以保证债务可以得到偿还。妇女主要在出口部门工作,遭受异乎寻常的剥削,但是,工人的家庭收入在70年代毕竟有了提高,在80年代提高幅度加快。结果是韩国实现了由原始泰勒制向边缘福特主义的过渡。此外,在工人阶级的男性部分中还形成了“热爱企业”的精神,从而为在企业层面上摹仿日本“协定约束”形式的某些方面作了准备。^①

可以看出,巴西和韩国在80年代走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路。新兴工业国之间的这种分化至少跟福特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化同样显著(参见图2)。

走向第三次国际分工吗?

我们不想深入讨论不同国家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发展模式(在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和生态方面)的稳定性,相反,应该讨论一下日益国际化的世界的中心地区各国不同模式共存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世界经济理论问题,陈旧的前提在今天阻碍了对它的研究。事实上,人们可以(依据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

^① J. I. 尤:《福特主义正在走向韩国》,载于J. 朔尔和J. I. 尤主编的《处于变化中的生产关系——一个全球性的展望》1990年伦敦版。

——依附理论的传统)认为,对任何商品来说都有一种最好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会得到贯彻,给掌握它的国家带来好处。这是一种绝对优势理论。

或者,人们也可以反过来允许在一个统一的技术范式内部的要素组合方面“变通”。这样的话,就会看到不同国家在不同要素的最初配备方面的分工:这是李嘉图所说的相对优势理论。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是各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完全可以流动,^① 它们的组合方式(技术范式、劳动关系)却因国家不同而有区别。

最初的两次国际分工

直到 60 年代事实上还在盛行的“第一次国际分工”,的确说明了斯密假设的正确性。只要某种物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它的生产就会集中于生产条件(自然条件——气候、土壤——或文化条件:社会组织、实践知识)最好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中变得相对稳定,因为(等级经济学意义上的)大生产的优势保护老工业中心,排挤新兴起的中心。新的中心只有在“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距离或对“新兴工业”采取保护主义)扶持下才能发展起来。

英国一出现手工工场、尤其是大工业以后,世界生产的绝大部分就集中于这个国家和其他一些通过或多或少的保护政策采取同样工业范式的国家。另外的国家只有在生产“其他产品”和把生产集中于自己相对英国而言拥有绝对优势的部门(大多是地理上的优势)时,才能参与世界贸易。因此,第一次国际分工(出

^① 虽然对移民有“劳动流动性”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是由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作出的。

口成品——出口原材料、农产品或煤、铁)是一次部门之间的分工。

但是,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原始泰勒制,尤其是边缘福特主义的出现,又产生了一次新的国际分工。一种技术范式好像从此可以用很小的成本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外一个国家。从那时起,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素质要求最低和机械化程度最低的环节,能够以更加大得多的竞争能力转移到低工资地区或国家。

这是李嘉图相对成本优势理论的报复吗?大错特错!

1. 首先,这里所描述的不是所有部门生产条件之间的相对优势,不如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按照唯一的技术范式组织起来的同一部门或同一行业的生产过程,不同环节上劳动要素成本的差别。福特制分工实际上把任务分为三类:(1)计划、工程师活动和劳动组织;(2)素质要求高的生产活动;(3)常规的非熟练活动(其中包括第三产业的任务)。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型的标准化的生产方法,允许把这三类任务在地域上分割开来。从那时起,这三类任务便“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质量与成本关系最佳的地区。因此,这里所说的是每个部门内部分工中的绝对优势。原始泰勒制是与“第三类任务”向工资很低的国家转移相适应的,而边缘福特主义则与第一类任务和(尤其是)第二类任务转移到收入较低、但已拥有熟练劳动力和比较发达的技术规模的国家相适应。这就是第二次国际分工的“经济学”格局。

2. 此外,新兴工业国家充满活力的现状不能仅仅归结于劳动要素的相对成本这样一种经济学格局,还要考虑到工业组织、运输费用和市场布局等因素。第二类或第三类的任务不能随意地移到某地去完成。必须使该地的劳动市场素质、工业结构和地方需求结构之间保持一定的适应关系。亚洲自由贸易区和美

国与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加工业”格局,就是把生产过程的一些环节转移到“南方国家”(那里的工资非常低),让它们为“北方国家”的金融市场服务(那里的需求日益旺盛),但这种格局只与世界生产活动的一小部分相对应。

即使从“供给方面”看,有差别的要素(在这里是劳动)也首先是一种社会构成物。仅仅拥有足够的劳动力(刘易斯模式)是不够的,否则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会成为新兴工业国了。劳动力还必须同时从其他约束(乡村的、家庭的、宗教的)解放出来,摆脱压制或传统(在女工那里)的消极影响,养成服从工业劳动纪律的习惯。简单地说,人们所竭力追求的“劳动要素构成”,实际上是局部社会的结构标志:它的对应物是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灵活的泰勒制范式。^①

两种后福特主义的共存

80年代初,福特主义的妥协受到公开批评,被认为过时了。人们完全根据历史的教训来摸索什么会成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主导形式。80年代前期,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就令人瞩目,后来则是“劳动协议(外在)灵活化是摆脱福特主义危机的出路”这种观点大行其道。人们批评“欧洲硬化症”,把它归因于雇佣关系的刚性。然而,自1987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明显地走向衰落,陷入里根主义“放松控制”政策的死胡同;与此同时,日本和德国却显示了它们在技术和财政方面的优越性——人们承认,旨在“动员人力资源”的模式,在摆脱危机方面比以弹性化为取向的

^① 但是在这里,适应泰勒制的和弹性制的劳动力必须也包括那些企业家精英和有能力推行这种模式的高层领导人物。参见利皮茨:《幻影和奇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问题》1985年巴黎版。

模式优越。

现在,德国和日本所遇到的困难又要求人们在评价时更加审慎;来自亚洲、甚至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似乎给全世界确定了统一的标准,即工资越来越低,劳动协议越来越灵活化。在遇到所有这类情况时,人们都认为在两种(不同的)范式中总有一种比另一种具有绝对优势,后者最终会被排除掉。

但是,由于人们总是说不清哪种范式会取得胜利,我们理应去做进一步的思考。首先,我们所说的两种范式,显然还不足以在全球范围内规定一种互相关联的发展模式,至少它们还缺乏调节国际有效需求的办法。世界市场正如1950年以前那样,重新由全球竞争来决定,其发展表现出循环性特征。当然,这种循环也波及那些主导性模式(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此外,像“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和重新转向市场资本主义(中国最早取得成功,东欧国家却搞得不成功),这类重大事件也影响了经济景气和邻国的体制(尤其表现在德国统一这件事上)。

除了从经济景气方面作这番思考以外,我们现在还敢于作出下列基本推论:

1. 1982—1995年的教训是明显的。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政策(美元升值或贬值,过高的利率或负利率,可控制的或不可控制的预算赤字),它在贸易和服务业结算中的赤字都已成为结构性的,其数额在每月100亿美元左右。相反(无论经济形势的变化产生多大影响),日本和德国在对外经济结算中都处于有利地位(德国统一后的一段短时期除外)。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竞争力的角度看,协商约束的模式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服务业和交换产品的生产部门比新泰勒制优越。

2. 世界划分为三个大陆集团。在这些集团内部,会出现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建立在两种后福特主义基本范式组合基础上

的分工。

世界经济重新按大陆分化的这种趋势(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地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地区),主要产生于“地缘因素的报复”;随着即时生产这种方法的实行,距离和交易费用重新具有更大的意义。此外,这种趋势也产生于人们在“邻居间”调节国际宏观经济的尝试。

在这些集团内部,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明显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第一、二、三次分工格局的中心—边缘关系。同时,这种等级结构又在不断变化:“边缘”国家取得进步,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多或少顺利地走出福特主义的危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它们各自优先选择前面所说的两条范式轴线中的一条,它们走了不同的道路。

我们的第二个推论,更为清楚地涉及同一大陆集团所属地区内部两种范式共存的可能性,这些集团以在采取不同范式的国家中间进行第三次国际分工的形式实现了一体化。这种分工不像第一次国际分工那样以不同的方式生产极为不同的物品,也不像第二次国际分工那样在同一泰勒制范式中把各种生产任务专门化,而是一种以不同的方式生产类似产品的分工。

只有当两种范式中的任何一种对于另一种而言只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时,也就是只在一些部门和行业中占优势时,它们的共存才是可能的。因此,当李嘉图用“适用一种范式的社会结构”来取代“要素初始构成”概念时,他的形式主义是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状态,在这里我们不想细谈它。^① 我们只想指出,应用“弹性制”和“协商约束”的范

^① 参见丹·莱沃尔涅和利皮茨:《区域性生产中的两种社会策略》,载于本柯和利皮茨编的《成功的地区》1988年巴黎版。

式,符合被一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精英们视为摆脱危机出路的那种“防御和进攻”战略。

要恰当地表达社会适应方面的区别,就要回顾一下一种翻新了的“委托—代理理论”。生产的组织者(“老板”),不管他是企业家还是委托人,在处理同下属(代理人)即雇员或供应商的关系时,有两种做法可供选择:

1. 或者选择信任和它的等价物——责任自主,这种做法可以保证自己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取得最大化的收益,但它也要求平均分配这种收益;

2. 或者选择不信任,对下属进行直接监督。这种做法可以保证属于“老板”的那份产品的最大化,但无法必然保证这种合作方式的全部产品的最大化。

显然,选择“信任”还是不信任取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经济以外的决定因素。因为在后福特主义制度下,这些因素的差别似乎对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影响。从此较成本优势理论的角度看,它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李嘉图的理论,自然而然地会形成如下结果:

优先选择对直接生产实行协商约束的部门会去寻找劳动市场中素质相对较高、弹性较少的地区或环节;而优先选择低劳动成本的部门会去寻找劳动市场中弹性最大的地区或环节。

至此人们也可以理解“丰田制”模式为什么取得成功了:如果同一社会内部存在着两类劳动市场,在企业层面上通过谈判达到工资妥协的办法,可以保证所有部门找到最佳适应方式。严格奉行“卡尔马主义”的国家的模式,会由于最简单生产部门的劳动关系的刚性和劳动成本居高不下而吃亏,(劳动关系)弹性最大的国家所采取的模式(新泰勒制),在那些要求很高劳动素质的部门也会吃亏。相反,一如既往地奉行经典福特主义雇

佣关系(刚性加泰勒制),逐渐变得“彻头彻尾地”落后了。因此,从“改造了的李嘉图理论”中会产生出下列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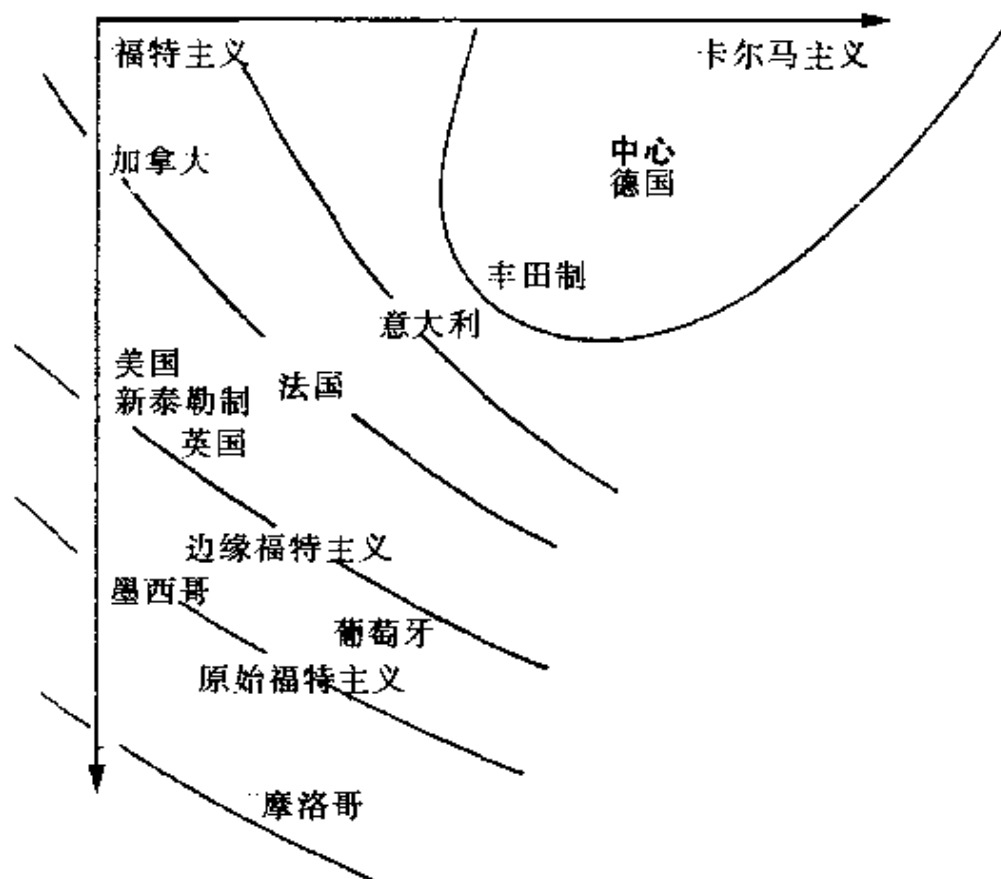
1. 实行协商约束的国家将吸引(工人人均)增值最快、智力劳动成分最高的产业;

2. 在这些国家当中,那些在最低层面上进行协商约束的国家将变得最有竞争力(在丰田制模式中能达到最佳情况);

3. 还有些国家,或者在实行福特制时做得过分(对于约束程度太低的情况来说过于僵硬),或者尽管劳动力成本极低,但劳动力素质太差,那么,在这些国家会出现排斥现象,就是说出现资本根本不再对劳动供给感兴趣的的局面。

现在,我们先把各国内部的差别放到一边,来看看各国在示意图中的相对位置。可以看到,在多种情况并存的大陆集团内,素质要求最高的部门倾向于向右上角发展,在那里有最高的收入、最好的劳动力素质和最大限度的“内部弹性制”,换言之,那里有引进新工艺流程、开发和试制新产品的最佳条件。一句话,那里是(F. 布罗代尔、I. 沃伦斯坦、S. 阿明等人)所说的那种引伸意义上的和双重词义的“中心”。越来越简单的部门集中于日益靠近左下方的国家。这些国家只能冒着被指责为实行“社会倾销”的危险,通过采取越来越苛刻的弹性制和低工资制的方法来保持它们的竞争力。这些国家包括那些以前曾实行福特主义,现在却(离“边缘”越来越近)越来越倾向于新泰勒制的国家,也包括边缘福特主义国家以及实行原始泰勒制的国家(参见图3)。

图 3:新的等级制



各个大陆集团的区别

图 3(作为例子)展示了欧洲集团各国的情形。显然,在美洲和亚洲看不到这样鲜明的等级格局,其主要原因是一目了然的:美洲集团受一个国家即美国支配,而美国却不具备主导性的技术范式。因此,美洲集团具有双重缺陷:一是它的中心本身受

其他中心支配，二是这个中心因此很难控制它的边缘地区。

这两个结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得到具体说明：

1. 美洲的劳动贬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生产率和社会成员平均购买力的恰当指数。就国际比较而言，有两种办法可以确定这个指数：

①根据经常性汇率：在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上（就是说，在国内市场上的产品供给价格与产品出口价格之间没有很大差别），这个指数可以很好地衡量出某个国家的劳动产品中能够购买他国劳动份额的有效含量。

②根据购买力平价：这是一个按虚拟汇率计算的理论指数，它可以用来比较等量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的价格。

第二个指数似乎可以修正无法平衡各国通货膨胀的差别这个缺陷。它可以从居民在自己的国家怎样花费自己的收入这个方面，比较各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因此，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国际含量的指示器”。假如所有国家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同样的产品，这个指数恰好有这种功能。此外，汇率也的确有可能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调整。

然而，这些情形从未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出现过（表1）。在那里，不同的国家处于三次国际分工的不同层面上。按照主导性范式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国家，不仅在生产上占优势（他们生产的多，就是说他们的人均国民产值“按其含量”来说要高），而且他们的劳动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估价较高（它们出售得“更贵”一些）。后者可以理解为，用经常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产值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产值之比。两者之比所产生的系数称为“国际价值指数”。这一指数当然部分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汇率

政策,但是经验证明,仅靠汇率政策无法长期维持汇率的高位水平。^① 因此,该指数很好地表达了一个国家的结构性特征。

表 1:国际价值等级格局^②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1993年)

	平均年变 化幅度 1993—94 (%)	按现实汇 率计算	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	人口(1993年, 单位:千人)	国际价 值指数
德国	2.8	23537	18510	81190	1.27
澳大利亚	4.3	15963	17103	17657	0.94
丹麦	4.7	26204	19335	5190	1.35
西班牙	1.7	12227	13311	39080	0.92
美国	3.9	24302	24302	257098	1.00
法国	2.2	21706	18700	57667	1.16
日本	1.0	33802	20532	124670	1.65
墨西哥	2.9	3968	6808	91210	0.58
挪威	3.6	23995	19476	4310	1.23
新西兰	5.0	12630	15493	3480	0.81
葡萄牙	1.0	8688	11953	9887	0.72
英国	3.5	16279	17036	57830	0.96
瑞典	2.3	21254	16831	8718	1.26
瑞士	1.7	33453	23195	6940	1.44
土耳其	3.9	2928	5410	59490	0.54

① 在法国,人们常在现行汇率倾向于要求过多的国际劳动来交换国内劳动时,才谈到货币“估价过高”。我却认为,只有在实际上要求较多的国际劳动来交换较少的国内劳动时,才会出现货币和它所体现的劳动的“估价过高”。

②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观察》1995年第6—7期。

在表 1 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用两种计算办法换算成美元。美国劳动的国际价值指数通常为 1。可以看出:

①日本和德国的劳动与美国的劳动相比估价偏高了许多(德国还是指统一后的德国而言的!)。要是贸易结算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就好了!

②三次国际分工中的所有边缘国家的劳动都估价偏低,并且在每个集团内部与各自的中心地区相比,它们的劳动又经受了一次贬值。

表 2:地区内部商品出口在该地区全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①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北美	39.1	37.8	35.4	34.2	34.3	33.0
拉美地区	14.0	13.8	13.4	14.1	13.4	16.0
西欧	68.4	70.5	70.6	70.7	72.2	72.4
东欧和前苏联地区	53.3	52.7	52.0	48.5	42.8	22.4
非洲	5.9	6.7	7.0	6.6	5.9	6.6
中东	7.7	6.9	6.9	6.3	5.8	5.1
亚洲	37.0	38.8	41.8	44.1	44.8	46.7

2. 美洲集团松散的一体化

表 2 显示了国际贸易“地区化”(实际上是按洲分化)的情形。如果把“集团内部的贸易”同“集团间的贸易”分开来看,这种数字肯定会有变化。那样它们显然要取决于各个集团所选择的限制条件和国家的大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一眼就可以看

^① 数字反映了德国重新统一和中东欧、前苏联剧变后的情况。资料来源:关贸总协定组织编的《1991—1992 年世界贸易》1993 年日内瓦版。

出,欧洲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亚洲的一体化程度很低,美洲更低。然而,人们更应该看到,北美地区内部的贸易出现衰退,拉美地区内部的贸易陷于停滞,而欧洲内部、亚洲内部的地区内贸易份额却在持续增长。

表3是一份成品交换的数据表。^① 尽管前后两次统计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可以看到,美洲在出口、尤其在进口方面走向分化;亚洲在出口、特别是在进口方面走向一体化;欧盟却在出口方面进一步走向一体化(出售将越来越多地在成员国中间进行),而在进口方面走向分化(越来越多地从亚洲购买)。这种结果给人造成亚洲出口能力增加的印象,亚洲的两种范式都取得了成功:日本的丰田主义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弹性制。

欧洲:布局良好的等级结构

欧洲:一个等级化的大陆集团^②

从人口和财富来看,西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但是,自

① 在这里把三个集团的所有国家重新分组,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单列一项,后者包括非洲和(主要受第一次国际分工约束的)阿拉伯国家,以及(自1992年起进入混乱的过渡期的)东欧。因此可以看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实际上是欧洲的边缘地区。

② 下面这一部分的内容来自莱沃尔涅和利皮茨最初达成的相近的观点。确切地说,“西欧”是指欧共体或欧盟,即欧共体和正准备加入欧盟的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全部国家。参见丹·莱沃尔涅、利皮茨:《避免出现两种速度的欧洲》,载于《劳动与社会杂志》1990年总第22期。

从危机开始以来,该地区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停滞的一极,成了唯一一块尽管人口停止增长、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的发达资本主义一极。这种悖论式现象的产生,原因不在于实行“协商约束”模式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阿尔卑斯山脊地区”国家(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瑞士)缺乏技术和社会革新的能力。略看一下数字就能说明这个根本问题:在80年代,只有挪威、瑞典、奥地利和瑞士没有遇到经济停滞和失业问题,就是说,只有一些非欧共同体成员的国家没有遇到停滞和失业问题。这正是我们要作出解释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有职责把整个欧洲吸收进来的欧共同体所特有的停滞。

表 3:集团之间商品交换的数据^①

(1982—1992年集团之间的交换占全部交换的千分比)

产地\目的地	美洲	西欧	亚洲	其他国家	I/X
西欧	60	387	30	89	4.3
	50	375	36	46	4.6
美洲	99	40	24	13	1.55
	108	38	32	7	1.54
亚洲	58	32	48	24	0.53
	87	57	91	16	0.63
其他国家	4	17	3		
	1	5	3		
I/X	0.84	5.38	0.89		
	0.79	3.95	1.34		

① I/X:集团内部的贸易额与该集团同另外两个集团的贸易额之比。“其他国家”包括:阿拉伯地区、黑非洲、东欧。资料来源:C. E. P. I. I.

欧洲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由出口大国(包括居世界前十位的七个国家)组成,但是,这些国家却在相互竞争。欧洲发展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这种发展的推动力来自内部竞争的巨大压力。欧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把出口向本洲收缩的情况,部分地是由于欧洲内部存在着多样性:它包括有长期工业传统的国家,同时也包括最近实行了工业化的农业国家,它还拥有矿物能源。然而,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主要归因于各国所选择的摆脱福特主义危机的策略不同。

有些国家(英伦三岛,南欧)打低工资牌(相对而言),另外一些国家(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反,注重通过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协商来掌握新技术。欧洲几乎占了由摆脱福特主义危机的多种出路构成的整个曲线,并且在那里可以区分出“中心”(其国际价值正在上升)和“边缘”(它们在量的方面没有增长)。仅仅停留在批评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行业管理办法的优势,或者批评第三世界国家(在纺织业)通过极端剥削劳动力的办法来进行竞争,这还是不够的。因此,欧洲也采取了保护主义:针对日本的汽车、亚洲的纺织品、阿根廷的肉类,等等。但是,假如把欧洲的自我中心主义归结为保护主义,那就大错了。它顽固坚持保护主义只是突出地表明它对维护内部社会妥协方面的担心。然而,损害这种妥协的最大危险却来自欧洲的制度结构。对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进一步探讨。

共同市场的宏观经济

截止 1992 年,^① 可以把欧洲的局面简单地描述如下:

^① 1993 年内部市场的实现和欧洲货币体系的解体,是不信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结果。

1. 欧洲有潜在的自给自足的能力；
2. 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自由的，现实汇率稳定；
3. 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大力合作的情况下适应外部压力(非合作性的调整)；
4. 欧盟的每个国家都可视为或者奉行新泰勒制战略，或者采取协商约束制度的地区之间的联合；
5. 进攻性的战略(协商约束)在大多数部门都比防御性的战略(弹性制)更有竞争力，但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则不同，那里的工资差别足以使防御性战略发挥其长处。

如果从第 1—3 条假设出发，采取凯恩斯模式通常的观点(以邻为壑政策)，^① 那么就会直接造成停滞的趋势：每个国家在短期内都必须采取压缩国内需求和加强出口(借助降低单位产品劳动成本的办法)的政策，来适应所有其他国家施加于它的压力。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倾向流行于 70、80 年代。或者也可以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实行低水平社会保障和低工资制的国家(至少在中期内)比其他国家拥有竞争优势，并且这种情形会引起社会保障的普遍解体(社会倾销)。假如到处都实行同样的劳动组织形式，假如竞争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工资和“防御性的弹性制”，那么这种情况也的确会发生。

因此，采取了第 4 和第 5 条假设，就会使上述预测有所改变。如果我们运用前一节所说的“改造了的李嘉图理论”，就会得出下列结论：每个地区专门从事这样一些部门的生产，在这些部门中，它能够以最集约的形式利用自己以最佳状态拥有的要

^① 参见 A. 格林等：《黄金时代的兴衰》，载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战后经验的重新解释》1990 年牛津版，另见利皮茨：《幻影和奇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问题》1985 年巴黎版。

素,即或者是灵活性的和泰勒制的劳动,或者是“协商约束”前提下的熟练劳动。由于资本可以自由运动和内部市场已经实现,欧共体内地区之间便会趋向于根据“比较成本优势”的这种特殊类型按部门(或行业)分工。这种趋势使得丹麦和葡萄牙能够共存,尽管前者的工资水平比后者高五倍^①。

这样一来,内部市场的总量取决于实行协商约束模式的国家的较高收入和实行弹性制国家的较低收入。在前一类国家中收入再分配的可能性变得更小,在后一类国家中,促使国家走向低工资制的压力(弹性化和失业)变得更大。如果没有一种“协调一致的复兴”政策(第3条),前一类国家就会迫使所有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宏观经济决策。它们就这样最终决定欧洲范围内不充分就业的均势。

因此,必须强调指出,中心地区应该对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润进行再分配(以“集体协商约束”的名义),这种分配应严格限于由工人协商约束模式的生产率优势在竞争中带来的收益范围内。收益本身的高低取决于两类地区之间竞争力的差距。前一类地区要维持收益就得采取体制方面的“慎重的分配政策”,因为这类地区总是面临着由于工资差距拉大而失去自己相对于后一类地区的优势的危殆。福特主义的宏观经济建立在一个国家内部(基本可以预测)的分配妥协策略上,而(在没有共同社会立法的欧洲)建立在协商约束基础上的地区性社会妥协策略要想维持下去,只有靠它不去触动两类地区的竞争力差距。因此,这种策略不适于通过需求去推动其他地区的增长。

假如在分析中只考虑我们五条假设中的前三条,那么结果

^① 丹麦的人均国民产值(按国际价值计算)是世界上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日本和瑞士。

似乎并不可怕。“两种速度的欧洲”、“豹斑”状地理格局^①取代了由欧共体内部竞争导致的各国社会妥协策略的相互破坏。然而,即使在那些由实行进攻性社会妥协策略的企业形成的地区“斑块”上,也往往存在一些实行低水平社会保障和高度灵活的供应部门和(企业与家庭中的)服务部门。地区内部的这种差别有可能是产生于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差别。

无论如何,由于我们刚才论述的机制的作用,具有两种社会速度的欧洲会变成只有唯一一种经济速度(并且是极低速度)的欧洲。

我们现在何处?

80年代末,欧洲好像是作为一支“稳健的力量”在向前发展,它发展得比美洲平静、稳定,也肯定比不安分的亚洲慢,但它是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发展的。欧洲似乎按照“中心—边缘”的格局(图3)很好地组织起来了。最上面是奉行“卡尔马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德国和“阿尔卑斯山脊地区”各国。再略往下是法国,它从福特主义朝偏重防御性的弹性制方向发展,但拥有少量的实行进攻性战略的部门。法国之后是实行“新泰勒制”的英国和保持边缘福特主义的西班牙,最后是更为边缘化(也就是实行弹性更大的做法)的葡萄牙。在此边缘以外就是摩洛哥和参加《地中海协定》的该地区各国,再远处便是参加《洛美协定》的非加太国家(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它们仍处于第一次国际分工的水平,并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第二次国际分工(即实行原始泰勒制)。

然而,柏林墙的倒塌动摇了这种格局。从宏观经济上看,假

^① 指不同模式错杂共存,状如豹斑。——译者注

如实行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东欧的重建本来可以推动西欧的发展。可是实行情况恰好相反,在实行了两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强硬做法以后,德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慢慢地扼杀了东部的恢复,也扼杀了西欧的全部内在发展动力。

除了经济政策的这种失误以外,(中欧和东欧地区)劳动力的涌入也动摇了1989年以前的那种均势,尤其在图3右上角所示地区。这些劳动力素质很高,但他们的劳动关系弹性化程度也高。因此,“弹性化”对于协商约束模式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最先出现危机。自从芬兰和瑞典在东欧的传统销售市场被无情地抢走以后,它们不得不在自由主义氛围中承认“卡尔马主义”妥协策略存在着结构上的竞争劣势。对那些协商约束水平较低、由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不大的部门来说,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通过协商实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妥协的策略,是一种可怕的过分“大度”做法。这种“大度”会压抑生产部门的竞争力。典型的例证就是这一模式以之命名的卡尔马的那家工厂(沃尔沃汽车厂)在这期间已经关闭了!^①因此,(瑞典)出现了向曲线的左下方下滑的趋势,即走向部门层面上的协商,并同时放弃“团结一致工资”。

即使是德国也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科尔总理关于筹资支持德国统一的“创业谎言”引起了西德地区劳动关系的普遍动摇,甚至也使那些还没有像在日本那样运用自如的“大企业主义”工业范式产生动摇。部门层面的协商遭到拒绝。中小企业的雇主采取了进攻性的战略,以便与部门层面上的协商脱钩,因为这种协商要求他们的工资标准与大企业的水准拉平。而大企业则

^① 参见A.桑德贝里:《沃尔沃模式走到尽头了吗?》,载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994年总第45期。

毫不迟疑地以把生产转移到弹性制国家(从葡萄牙到马来西亚)相要挟。^① 简单地说,德国总的趋势是向丰田制规则发展。

由于四周有边缘弹性制的“大洋”,中心地区的这场“洪水”暂时还没有泛滥。本来它可以在完善欧洲范围内社会立法和环境立法的疏导下趋于消退,但遗憾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忽略了这两项根本任务,相反,条约强调了各国宏观经济(借助调整汇价和利率)相互联合的硬性规定。在(1992年9月和1993年7月)两次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中,条约规定的这些条件瓦解。受其影响,各国国内宏观经济调节和各成员国相互适应的活动余地只得到很少的拓展。这种变化无法解决一些根本问题,因为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欧洲意义上的措施。

悖论式的集团:美洲

从图3可以看出北美与欧洲相比有两个根本性区别:

1. 美洲大陆的主导力量美国并没有采用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工业范式;

2. 由于大陆的中心和边缘地区都采用了同样的工业范式,它们只能靠程度不同的弹性化(在纵轴上)相互适应。

美洲集团的第一个悖论在于,从全球范围看,支配美洲的中心(美国)无论在技术和金融方面,还是在社会政策方面都不再

^① 参见G.杜瓦尔:《德国工业——泥足巨人》,载于《经济选择》1993年9月号总第110期。

占主导地位。80年代是美国“巴西化”的年代,克林顿总统任期的头几年尽管实现了经济的周期性复苏,但没有根本扭转以前的发展趋势。

把中心与共同繁荣的(这个词用得并不适当!)周边地区组织成经济网络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只控制北部边境(即加拿大)及南部边境的唯一一个市场:墨西哥。整个南美,包括曾经大有前途的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今天已被卷进了“历史潮流”之中:债务太多,离自身难保的美国太远。它们指望重新引起日本或欧洲的兴趣,而智利似乎已经这样做了。

第二个悖论在于,美国和它的边缘国家在同一种技术范式下进行竞争,即通过程度不同的弹性化进行竞争。结果是,美国是在实行弹性制方面落后于边缘国家的条件下起步竞争的。我们还是必须(在南方也一样)了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难道(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人们不是依靠弹性化和日本模式的长处吗?

“名不符实的日本化”

说老牌的福特主义国家实现了“弹性化”(我称之为“新泰勒主义”),显然是相对而言的。即使美国走上了“巴西化”的道路,它与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家的工资水平和缺乏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福利的状况相比还有重大差别。后者一开始就采取了灵活性很大的“初始弹性制”,它们在原始泰勒制的最初阶段依赖这种“初始构成”,然后在某个时候达到边缘福特主义阶段。第三世界的“老工业国家”则依然采取“拉美模式”的早期形式,它以进口替代和通过社团主义方式进行调控的半福特主义雇佣关系为特征;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都属于这类情形。因此,这些国家经历了某种程度的“重新弹性化”过程,这种过程有时因引进“日本方法”得到加强。

毫无疑问,设在埃莫西约的福特汽车厂是在以弹性制为特征的地区实行“日本化”的主要企业。因此,考察这里引进“日本管理方法”的实际情况特别有意义。结果表明,埃莫西约福特汽车厂的劳动决不是人们总算找到的日本技术范式 and 美洲弹性制两种成分的并列关系。如果说真的存在日本化的话,那也是一种口头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日本化;名不符实的日本化。

埃莫西约福特汽车厂通过动员熟练劳动力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效率的做法恰好与日本方法相背。在一次参观过程中,有位负责人介绍说,他们组织雇员之间的竞赛(例如看谁出错最少或放过的错最少)。换句话说,福特汽车厂的竞赛方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把每道工序做得尽量完美,但是它也造成另外一种效应,即每个工人都不把自己借助工作经验发现的可能的改善办法拿出来“社会化”。工人觉得他的同事都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他们同他在劳动组织中只有纵向(即泰勒制)结构的联系(并且也与他相对立)。因此,这种方法与(青木昌彦在1990年刻画日本方法时提出的那种)“横向合作”的精神相去甚远。^①

这位负责人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我们问他在竞赛中发多少奖金时,他回答说:“不发钱,发钱他们就挥霍掉了。我们发一些耐用品,譬如录像机,让他们明白节约的意义。”这种寓教化于奖励的办法(我没有问为什么不给他们发瓜达卢佩圣母像),自然会让人想起另一番话语:亨利·福特声称,他发给工人“优厚的”工资,这种工资也必须有利于促进“良好的”消费方式。他甚至派出社会工作者,指导工人的妻子如何设

① 青木昌彦:《公司内机制,分享和就业——日本经验的意义》,载于S. 马格林和J. 朔尔主编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战后经验的重新解释》1990年牛津版。

计家庭开支。

因此,埃莫西约福特汽车厂的劳动组织办法与真正把日本方法引进一个“弹性制”国家(那里工资极低,每小时约两美元)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高度发达的泰勒制,这种泰勒制几乎不考虑雇员的劳动条件,却用动员劳动力的政策来掩饰自己。^①

墨西哥:最终走向了边缘福特主义?

然而,这种名不符实的日本化的形式在墨西哥广为流行。墨西哥劳动社会学家们在著作中对它的影响作了分析^②,与实

① 同样,这种结论也适用于拉腊·恩里克斯所提到的电子产品加工厂和塔代伊·布林加斯所说的日资加工厂。参见B.拉腊·恩里克斯:《索诺拉电子电气工业的技术变化和生产的多样化》;另见I.G.塔代伊·布林加斯:《日本的加工业——后福特主义加工业的模式吗?》,两文均载于《社会研究》1992年埃莫西约版第3卷第6期。

② 我们从大量文献中举出下列著作:J. 卡里略编的《工业改组。墨、美边境地区的加工业》1989年墨西哥版;V. 卡里哈:《墨西哥汽车工业的改组——调整政策和对劳动的意义》,得克萨斯墨西哥研讨会报告,打印稿,1990年奥斯汀版。E. 古铁雷斯·加尔萨:《危机的见证——生产改组和工人阶级》1985年墨西哥版。E. 德拉尔萨·托莱多:《墨西哥生产机构的两极分化》,载于《时事杂志》1992年总第46期。A. 阿特亚加:《墨西哥汽车工业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1992年墨西哥版。G. 本苏桑·阿雷奥斯:《劳动关系和TCL》1992年墨西哥版。

行“科学的劳动组织”办法以前墨西哥大工业部门中旧的、与此相反的做法相比,在这种形式下工人承担质量责任是确凿无疑的。

由于它在极其现代化的自动化条件下,把真正的泰勒制和通过教化(“文明化”)使工人大众接受标准化的做法结合起来,便不难看出亨利·福特在其辩护性著作中所说的那种福特主义成分。^①但是,它还缺少实行标准化和调节工人收入的社会条件。现代墨西哥借助名不符实的日本化找到了福特主义,但它却是一种边缘福特主义。

在过去的15年中,墨西哥就像是由各种地区之间互不相同的发展模式组合而成的混杂物:北部实行原始泰勒制,中部(蒙特雷、墨西哥城、普埃布拉一带)则实行进口替代模式^②。现在的变化将使这两种模式有可能趋同而融合为一种真正的边缘福特主义:

1. 在以往实行原始泰勒制的部门,资本系数得到提高,劳动素质提高,工资也有所提高;

2. 以往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部门实现了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以往社团主义劳动立法的弹性化;

3. 这一切都发生在以下环境中:分别适用于供再出口的生产和供国内市场的生产的不同法律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从关

① 在参观诺加莱斯的一家电子产品加工厂时,女社会学家莉里亚·奥伦特斯提醒我注意食堂的卫生间中所写的标语:“饭后(而不是饭前)请洗手”。因此,福特主义“教化”的目的在于防止工人可能因为不卫生影响了生产过程,而不是相反。

② 这里不包括采掘部门(墨西哥湾的采油业),也不包括农业地区或土著居住的地区。它们的命运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受到重大影响。

税方面看)。

因此,墨西哥处于一种“印度式”的发展轨道上:

4. 对以往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普遍实行弹性制的雇佣关系,同时实行劳动组织的合理化;

5. 合作农场受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原来已经很突出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进一步加剧。它一方面导致城市及其非正式经济部门的膨胀,另一方面给原始泰勒制提供了过量的劳动力。

墨西哥与美国:竞争关系还是等级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生产率水平极为不同,并且美国在高科技部门处于技术知识的垄断地位,但是,这三个国家似乎大致采取了同一种福特主义技术范式的现代形式:泰勒制加自动化。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雇佣关系的弹性程度及其最简单的标志,即工时成本不同。因此,可以设想,美国的福特主义部门与加拿大的福特主义部门之间存在着“纵向”分工,即属于第二次国际分工类型。

情况的确如此。然而,对美国来说,它的后果早已不是积极的,因为,从总体看来,美国的工业不占中心地位。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加工性企业为欧洲和亚洲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利用它们挤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市场。即使那些融入北美生产循环的加工性企业也用欧洲或亚洲的机器装备自己。另一方面,北美的各个生产中心倾向于把生产完全转移到墨西哥。这是北美工业上演的最糟糕的一幕:在它选择了低工资和低素质

要求的策略以后,它就根本不再有理由像德国和日本那样把生产机构的核心保留在自己的领土上。美国的全部生产不得不转移到墨西哥,依靠那里的越来越多地使用欧洲或日本的机器生产的劳动力。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形成北美集团第二个特征的那些严重后果:有关国家(从中心到边缘)没有分布在从“卡尔马主义”到“新泰勒主义”的对角线上,相反,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分布在弹性程度越来越大的纵轴上,并且还采用了同样的泰勒制工业范式。简单地说,大多数部门只能靠低工资和不固定的雇佣制来进行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它们普遍把目光转向了墨西哥,因此,生产厂家涌入墨西哥是必然的。只有靠规定各个市场不要分隔太远,以便它们能够按照即时生产的原則发展,才能阻止这种转移产地的浪潮。

自从1990年初加拿大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这种法律就出台了。加拿大在80年代实行的“渗透性的福特主义”^①与里根时期放松控制的社会政策有很大不同。然而,由于加拿大没有同时从整体上用比美国更高的素质充实自己,它很快失去了增加就业的可能性,这对于它的邻居却是有利的。^②

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工业相对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以致美国方面自己(从1992年起)重新对自由贸易协

① 参见I.詹森:《“不同”但并非“例外的”——加拿大的可渗透的福特主义》,载于《加拿大人类学和社会学评论》1989年总第26期。

② 马洪指的是加拿大具有“向上”调整的机会。拉普安特把铝工业当作例子。而在加工工业(包括雅基人地区的水泥业),则长期以来把丰田主义当作一般发展道路。参见P.A.拉普安特:《劳动和民主的模式》,载于《社会学研究杂志》1992年第18—19期。

定的谈判提出疑问,而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本来是想加快这种谈判进程的。舆论界多数认为,按照新的游戏规则(由于大多数部门只要求非熟练劳动力),墨西哥与美国相比占有绝对优势^①。

不那么教条地奉行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重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克林顿政府在坚持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墨西哥仍感兴趣的同时,于1993年7月要求签署了两个旨在反对社会倾销和环境倾销的附加议定书。这样做当然也是想削弱来自三个国家的工会和生态运动方面的反对力量。但是,正如1994—1995年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它对墨西哥却未必有利。当然,这场危机也归因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主要指比索升值)、政治危机(奉行社团主义的执政党,即老的革命制度党的动摇),特别是社会危机(萨帕塔分子的暴动)。虽然美国离得很近,但墨西哥仍有一些它所“未知的区域”(从格雷罗州到恰帕斯州)。

亚洲:一个非正式集团的优势

要给“亚洲集团”下一个简单定义是有问题的。这个集团不受任何跨国经济调节机构(如欧盟那样的组织)的限定(显然,无论是东盟,还是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都没有起到这种作用)。亚洲集团(我们把大洋洲岛国,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合并进来)

^① 参见S.奥多涅斯:《现代墨西哥的外部限制》,巴黎第八大学论文,1994年。

不如说是指一种包含极为不同的积累体制的、“充满优势的国际组合”。但是,这个巨大的组合体同时也显示了按洲分化的特征(从贸易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和类似于欧洲的等级制格局。

事实上的等级结构

实际上,无论从人均国民总产值方面,还是从国际价值指数上,抑或是从每个国家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到一种“对角线式的”等级制格局:从实行协商约束的中心到它的弹性制的边缘。

1. 日本处于中心地位,它是实行丰田制的国家。亚洲资本主义集团没有受到对工人非常有利的社会民主党的制约。尽管日本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最高,它的国际价值指数估价也最高,但它的出口却连续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

2. 处于第二环的是早期的两个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它们主要在电子工业部门担负着福特主义中心的职能。它们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与有关的亚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分工。^①

3. 处于第三环的是两个属于欧洲殖民地的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尚保持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组合,即福特主义调节与仍然部分面向初级产品出口的专门化之间的组合。

4. 处于第四环的是第一代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韩国和台湾,它们达到了已经显示出丰田制特征的边缘福特主义的水平。

5. 处于第五环的是实行原始泰勒制的国家,即马来西亚、泰

^① 参见 J.R. 沙波尼耶尔:《东盟:政治成功,经济失败?》;亦见 F. 勒穆瓦纳等:《香港—中国:一条双头龙》,两文均载于《国际经济》(季刊)1994 年第 1 期总第 57 期。

国和菲律宾,它们拥有广阔的腹地。

6. 处于第六环的是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它们仍在采用第一次国际分工意义上的老的进口替代模式,但逐步向第二次国际分工接近^①。

7. 处于最边缘的是亚洲农村地区这片“汪洋大海”及其中的一些工业“群岛”,尤其是在印度次大陆。

8. 在这里当然要谈到占世界人口 1/4 的中国,它的地区日益分化,从第二环到第七环都有分布。

亚洲的非正式的动力

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却(非常奇怪地)没有单一的积累体制。在那里出现了一种“共生的局面”。

在中心地区,日本的丰田主义模式在宏观经济上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本来会形成一种障碍:它缺少有效的机制来对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实行再分配^②。这种情形是由在企业层面上协商工资的做法造成的。没有哪个企业能预见到其他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资的整个水平并不根据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提高。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种趋势:

① 处于第二环、第五环和第六环的新兴工业国家之间有很大区别(参见表 4)。

② 伊藤诚:《后福特主义的日本模式》,载于 M. 斯托普尔和 A. J. 斯考特主编的《工业化和地区发展的途径》1992 年伦敦—纽约版。

1. 到国外寻求销售市场；
2. 把利润和贸易顺差纳入日元升值引起的投机泡沫中(日元高比值)。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衰退的蔓延和随后(在 90 年代)出现的危机,令人回忆起“疯狂的 20 年代”开始实行泰勒制时的经济膨胀。它没有同样演变成 30 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可以说是个奇迹了。

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日元升值本身要求并容许日本在整个亚洲建立一种有利的等级制格局,把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国际分工联合起来。当然,如果没有处于第一环边缘的各国(尤其是第一代新兴工业国)的政府权贵的经济智慧,这种格局也不会产生。这些国家拒绝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既没有放弃保护主义、发展工业的政策和独立的金融政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资政策和汇率政策。^①

表 4:1991 年东盟国家的出口情况(按产品分类,%)^②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建筑材料	0.67	0.63	0.71	0.35	0.87
钢铁、金属加工	2.47	1.48	2.79	0.50	0.93
纺织、皮革	16.33	6.43	20.00	3.78	20.78
木材、造纸	13.27	3.75	7.30	3.51	5.50
电子	2.78	40.27	29.02	54.10	26.34
化工	3.88	4.93	3.77	7.92	4.76

① 参见 E. 瓦伦西亚在《进攻性调整和防御性调整——韩国与墨西哥比较》(巴黎第七大学论文,1994 年)中对墨西哥和韩国所做的出色的比较。

② 资料来源:C. E. P. I. I., CHELEM 数据库。

食品	7.14	8.27	13.71	2.39	18.36
工业总计	46.50	65.70	77.30	72.50	77.50
矿砂	2.73	0.58	5.53	0.45	0.73
能源	40.05	15.93	2.58	24.55	1.16
农业	9.62	15.69	8.75	1.10	14.39
其他	0.84	1.71	5.72	0.57	6.17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折合美元(百万)	29287	34134	9205	39779	25638

最后,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没有产生整个亚洲层面的最终需求的问题:

亚洲同时具备两种竞争优势:一是日本丰田主义那种昂贵的、高度约束的劳动;二是血汗泰勒制度下那种极其低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新兴工业国家的新的发展动力。借助这两种优势,亚洲可以“顺手牵羊”,抢走欧美的市场。此外,大量的、以前生活在前资本主义制度(印度农村)或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越南)下的人转向资本主义商业经济,也造就了对积累(甚至是扩大积累)的巨大需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分析过这种典型现象。

在90年代,日益增长的中国外贸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热动力循环中的冷端,而日本是它的热端。每一环都向下属的各环提供生产资料,而后者则向正在形成中的巨大的国内市场或另外两个集团的廉价商品市场提供消费品。

显然,只有在亚洲的技术范式表现出多样性和整个集团内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时,这种循环才能形成。中国和日本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下去,因为它们所生产的商品不同,生产方式也不一样,它们可以避免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那种危险竞争。即使这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放弃外

部调节手段;既没有放弃保护主义,也没有放弃可变汇价的做法。因此,它们可以避免欧洲统一条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造成的那种硬性的压力。假如中国或甚至韩国面对投机性的日元升值束手无策,那会出现什么结局呢?

现在看来,没有限制的局面有利于看似无限的经济膨胀,然而,长此下去就会出现缺少需求调节的结果。正如19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一样,亚洲也无法抵御周期性的衰退,更不用说抵御可能因中国与日本竞争引发的政治关系紧张,或者抵御从克什米尔到阿富汗直至韩国这片“未知区域”的动荡了。

一种出乎意料的结果: 在反对温室效应方面的等级制格局

建立在不同技术范式上的全球性新等级制格局在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反映。通过复杂的中介过程,这种等级制有时会被打破,产生一种悖论式局面,譬如像第二次海湾战争时的情形。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们想说明各国怎样能通过外交在反对温室效应的斗争中达成谅解。

温室效应是由碳氢化合物气体引起的,它的原因在于工业的发展。它的主要受害者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孟加拉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在这种冲突中,北方和南方本来是必然会处在对立的立场上的,北方不想采取任何对策,而南方则要求采取预防办法。然而,实际上只有北方的美国和南方的孟加拉所采取的行动符合这种粗略的分析图式。相反,人们看到:

1. 发达国家赞同采取彻底的对策,在这方面德国最有代表性,日本亦然,虽然略有逊色;

2. 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则反对作出任何强制性的限制规定。

当然,可以说那时因为“温室效应的代价”对美国来说无足轻重,而对孟加拉来说则很可观。然而,用“对付温室效应的成本”可以更好得多地解释南、北双方的立场,即它们对于通过强制规定要求不同发展模式采取“附加措施”这一点的看法。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论题。

本海姆、加尔顿和拉沃雷特从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各国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他们分析了可以用来表述上百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生产条件和能源消费情况的 20 个指标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国家处在一条对角线上;最发达的国家虽然能源消耗量最大,但由于方法比较合理,它们的单位产出所伴随的二氧化碳含量却最小,相反,最贫困的国家每单位产出所散发的二氧化碳量却最大。同时,分析结果也让人注意到另外两种情况:

3. 这条对角线上的等级结构与各国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对角线上的等级结构大致相同:上面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阿尔卑斯山脊地区”国家、日本、其他欧洲国家,再往下是新兴工业国家,最下面是最不发达的国家。

4. 完全偏离这条线的是一个“最富有和最脏的”国家——美国。

根据这种格局,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立场可以做如下理解:在以集约方式利用人力资源方面占有优势的国家,有办法把它们的能源消耗降低到“生态可以承受的”水平,在它们看来,任何新的限制都是对竞争对手的障碍。相反,其他国家——如美国,它

已把泰勒制发展到了很少关心人力资源,而只看重自然资源的程度;或者是新兴工业国家,它们还在那里幻想仿效美国的模式——则把维护全球环境视为自身发展的障碍。^①

几点结论

从这篇简短的概述中可以得出几条教训:

1. 流行于北大西洋两岸的“弹性化”道路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对福特主义危机的回答(即使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

2. 因此,面临竞争问题的各国都可以在两种适应战略中间作出选择,而不是只有唯一一种战略:或选择“防御性的”适应(实行弹性化),或选择“进攻性的”适应(通过协商动员人力资源)。第二种战略实行起来无疑要艰难一些,但最终是更值得的。

3. 进攻性战略不仅对资本来说更值得选择,对劳动、乃至也许对全球生态系统来说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宁可选择进攻性战略的三个主要原因。

(柴方国 译)

^① 参见J.I.尤所述的韩国的情况。参见J.I.尤:《韩国模式及其意义》,载于V.马斯卡尔和A.格林主编的《北方、南方与环境》1995年东京—伦敦版。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埃伦·米克辛斯·伍德

大约自本世纪 70 年代初,我们据说已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加以描述。一些人强调文化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另一些人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演变、生产与市场中的变化,或者企业组织与金融组织中的变化(“晚期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等)。这些描述首先考虑的是新技术、新的通讯交往形式、电子

-
- * 这篇论文发表在《每月评论》(第 48 卷)1996 年 7—8 月第 3 期。它是在向 1996 年 4 月举行的社会主义学者联席会议所呈交的一篇论文基础之上略作修改而发表的。原文修改后又呈交给 1996 年 5 月在英国苏萨克斯大学举行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国际学术会议。这里的中文译文是从联邦德国左翼刊物《社会主义》杂志(1996 年第 12 期)的德文译文转译的。作者埃伦·伍德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最近发表的著作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199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版),她还是伦敦默林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年鉴》编者之一。她发表了大量论文,主要刊登在美国《每月评论》。

计算机互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不管这个新时代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反正它是“信息时代”。不管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在这场划时代变化中发挥作用,反正新技术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因素,同它们的技术基础合在一起——汇集为“后现代主义”概念,并汇集为这样一个命题,即我们在最近20或30年内已经亲眼见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这一场历史性过渡。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我首先想探讨的是,在对资本主义划分历史时期的时候,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主要阶段究竟包含什么内容。然后我将仔细研究,在我看来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有哪些错误的东西。如果这个概念站不住脚的话,那就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考虑,即这种历史分期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一开始我就想立即澄清一件事:对于远未结束的资本主义变化作出分析理所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一种分期所包括的内容不仅是对变化过程的理解。提出一种时代变化分期就是要告诉人们,在对一种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下定义的时候,什么是本质性的。时代变迁就是通过这个制度的一些本质性的、至关重要的成分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完成的。换种说法,即我们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期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制度本身如何界定。因此问题在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些概念所告诉

我们的是,使用这两个概念的那些人对资本主义是如何理解的?

我们还应当更好地说明,我所要谈论的并不是被我们从广义上称作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人的思想。我这里涉及的主要是被一些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和戴维·哈维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首先要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简要描述。^①

根据理论家们,如詹姆森和哈维的看法,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向一个后资本主义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逻辑始终发挥着作用。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本质还是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即从一种物质结构向另一种物质结构的变动,而后者表现为从一种文化形式向另一种文化形式的过渡。

例如詹姆森认为,与后现代主义相应的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跨国的”、“信息化”、“消费主义的”历史阶段。哈维则遵循法国调节学派,把它描绘为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过渡。某些以轮廓不大清楚的形式出现的“紊乱资本主义”理论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② 后现代主义在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形式被灵活化所取代,出现了新的生产形式,如“减肥生产”、“小组计划方案”、“统筹即时生产”、为

① 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命题》,载于《每月评论》(第47卷)1996年5月第11期。戴维·哈维:《后现代主义的状况》1990年牛津—马萨诸塞州剑桥版。

② 关于“有组织资本主义”理论参见S.拉赫、J.厄里:《有组织资本主义的终结》1987年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版。

小型消费集团市场进行商品调剂、“灵活就业的居民”、四处流动的资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新的信息技术才得以出现。

根据这些理论,这些变化相应地要引起大规模文化变革。一项重要的解释原理——特别是在哈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中,把它同“时间—空间的密集化”联系起来,即由于新技术而使时间加快,空间缩小;新的电子通讯形式,新的快速生产与推销方法,新的消费习惯,新的资金筹集方法。结果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与智力格局——被描述为“后现代主义”——它将取代现代主义文化和与“现代主义方案”相联系的智力结构。根据这些解释,现代主义方案起源于启蒙主义运动,虽然它在19世纪才得以实现。据说这个所谓的启蒙主义方案代表着理性、技术中心主义、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对于直线进步和普遍的绝对真理的信仰。据称,后现代主义是对于这个现代主义方案的一种反动,尽管它被看作是起源于现代主义,亦即起源于怀疑主义和对于变化与发生不测事件可能性的敏锐感,后两者是在启蒙主义中就已经存在的。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把世界看作是支离破碎的、不确定的,拒绝任何“总体囊括一切”的说法,拒绝任何所谓后历史主义描述、任何关于世界和历史的囊括一切、无所不包的理论。他们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方案,甚至任何普遍的解放方案。换句话说,对于所有为了有利于反对各种极不相同的和特殊的压迫的局部斗争,对所有抱着普遍的“人类解放”目标的方案都坚决拒绝。

对资本主义历史作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种阶段划分究竟隐含着哪些内容?可以确定的第一个要点在于这种划分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等量齐观看起来也许是很不重要的,但我将要说明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所谓现代主义方案同资本主义很少有什么联系。第二个要点在于这种阶段划分似乎

意味着,事实上资本主义有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主要的分界。第一,现代主义似乎包括从18世纪至(大约)20世纪70年代的一切(哈维甚至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日期:1972年)。人们可以把这个漫长的现代主义阶段再划分出若干小的时期(詹姆森和哈维也都这样做了),而后现代主义似乎体现了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断裂。关于准确具体地确定什么时候发生这种断裂,或者这种断裂有多大规模,人们可以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是他们似乎在下列观点上是一致的,即这种断裂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其他阶段变化是完全不同的。它似乎不是同与它直接的上一阶段相断裂,而是同资本主义的以往全部历史断裂。至少当我们把现代主义上溯到启蒙主义时,会推导出这个不可避免的含义。总之,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某一点上资本主义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中断。我要说明,这种中断,或者至少是对这一中断的观察方式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将逐一具体研究这些观点。首先要研究现代主义概念和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看法。然后研究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断裂问题。我要说明,强调资本主义内部非连续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明确或不明确地以一种低估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非连续性的历史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一种掩饰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理论为基础的。

现代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观点

首先我们要研究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问题。对此

我们必须从头谈起,即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谈起。我的主要观点是,事实上在多数关于资本主义的描述中它是没有开端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始终存在于某一地方的;它只要不断摆脱桎梏,摆脱封建主义枷锁(或者不管是什么束缚手脚的东西),便可以成长和成熟起来。资本主义的种子似乎在简单交换行为中,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市场活动中就已存在。这种设想大多与这样一种想法相联系,即历史始终是技术发展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进程。无论如何,凡是在市场本身不断扩大,技术发展达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和地方,资本主义或迟或早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与此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添加了帮助挣脱枷锁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类解释的效果就在于强调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连续性,否认或者掩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从无法设想的遥远时代起交换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本身似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在这种论证结构中,资本主义对生产力进行革命的必然性,似乎只是这个包容一切、跨越历史时代、几乎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的一种扩大和加速。那么,资本主义的家谱很自然地要从最早的商人开始算起,经过中世纪的市民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者,一直到后来的工业资本家。

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段历史所作的解释中肯定也能找到一种类似的论证逻辑,尽管在最近的一些解释中,作者们经常用农村取代城市,用农村商品生产者取代商人。这些解释认为,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小商品生产或多或少是由于天然本性而进入资本主义的。换句话说,小商品生产者一有机会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种透视阐述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是一种剧烈的历史断裂的独特产物。资本主义市场与其

说像是一种强制——由于积累和获取最大利润的要求——倒不如说像是一种机会，它植根于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关系，并且为了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发展动力。

我认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如它通常使用的那样，属于这样一种历史的标准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早已存在的发展趋势的结果，甚至是自然法则的结果，是这些趋势或法则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有机会就会产生的结果。在从早期交换形式向工业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中，当这种受到禁锢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合理性从传统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就登台了。

因此，现代主义概念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巨大鸿沟的历史观念。它首先涉及的是资本主义运动法则，把它看作是普遍的历史法则。它囊括了极其不同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最糟糕的是它使资本主义天然合法化。

重要的是还应指出，反现代主义本身也具有这种把资本主义天然合法化的效果。人们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看到这一点。他说，现代历史是一个漫长的合理化过程，官僚组织中的国家合理化与工业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合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作用——与启蒙主义相联系的理性与自由的进步——就在于使人类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这种合理化产生并掩饰了一种新的压迫，即现代组织形式的“铁笼子”。这里隐含的悖论式内容在于，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统治恰恰是理性与自由的进步的自然扩展。在韦伯的理论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今天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典型悖论。在反现代主义中，对同一事物的控拆和赞扬往往兼容并蓄。

现代主义与“启蒙主义方案”

我的命题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主义将会导致掩盖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即使还没有从概念上对后者完全加以否定。我的观点不仅在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而且还在于认为把资本主义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会埋没现代主义的特征,如果这个所谓的现代主义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关联的话。

我想更清楚地说明,我把所谓现代主义的起源直接追溯到启蒙主义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大概也应追溯到启蒙运动。这就是理性和执着的合理计划思想、一种总体化观察世界的偏好、知识标准化、普遍主义——信仰普遍真理和价值——和一种对直线进步的信仰,首先是指相信理性和自由会不断地向前迈进。这些特点被人们同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随着自己的发展而展现出这些特点,或者是因为这些原则的传播促进了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对于所谓启蒙主义方案的攻击曾经盛极一时。我刚才列举的那些启蒙主义价值都曾受到批判——我在这里引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指责,即认为它们是“使人类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内备受折磨的种子不幸的根源”。^① 从世界战争、帝

^① 罗杰·伯巴赫:《关于后现代主义风格透视》,载于《每月评论》(第47卷)1996年3月第10期第37页。

国主义,直到生态环境的破坏,都算到启蒙主义的账上。在这里我不想同今天一些人散布的关于启蒙主义的胡说八道进行辩论,我这里只说一个简单的想法,即把现代主义同资本主义等量齐观就会使人们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浴盆中的脏水留下来,把孩子扔出去。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我们把启蒙主义最有价值的内容——特别是人类普遍解放的义务和责任全部抛弃,并把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毁灭性效果的罪责都推到启蒙主义价值的头上。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哈维和詹姆森虽然还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但是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期对于避免这种错误也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目前观念中主要属于资本主义,而恰恰是不属于启蒙主义的那些方面同启蒙主义方案区别开来。顺便指出,这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与反启蒙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进行斗争,而且首先有助于与资本主义凯旋论者相对抗。清理历史发展线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捷径。

我认为,启蒙主义方案的许多内容是一个明显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我要强调,这不仅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换句话说,启蒙主义的许多特征植根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他们是一种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如我所认为的那样——不仅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而且是摆脱封建主义的一条替代性的发展道路。

我想简要叙述我的观点,首先简要描述重要的历史前后关联:18世纪法国专制主义国家。关键之点在于,这不仅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而且是统治阶级中相当多一部分人的经济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成为启蒙主义运动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框架条件。专制主义国家是以非经济手段占

有剩余价值的中央集权制工具。一个国家官职就是一种所有权,是对于农业中产生的利润的占有权利。还有另外一些非集中制的非经济占有形式:封建主义的残余,即所谓裂土分疆的主权。这些占有形式与纯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恰好是截然对立的。

所谓现代主义方案的故乡——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农业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仅拥有一个有限的、分割的市场。这个市场始终依据非资本主义原则进行运作,不是依据占有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通过生产创造价值的基本原则,而是在农村人口占优势的情况下利用原始的商业获利手段——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转手利润、奢侈性商品贸易,或者向国家提供商品;它与群众性消费商品市场是相反的。而市民等级是启蒙运动关键性的物质—社会基础,它根本不是资本家阶级。事实上,它的绝大多数甚至不是传统的商人等级。市民等级的某些活动家在这个时候和以后的法国革命中“禄位高升”,变为国家官吏和知识分子。他们同贵族统治的斗争很少与资本主义摆脱封建主义枷锁有什么联系。

那么所谓的现代主义基本原则起源于何处?它是从新的、自身正处于发展状态的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吗?它在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是代表正在崛起的资本家阶级吗?我们是否至少能够说资本主义是现代主义方案出乎意料的结果呢?还是说现代主义体现的是另一种事物呢?

请回忆一下法国市民等级的阶级利益。当我们首先把目光对准启蒙主义方案高潮,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集中考察这些利益。市民等级的核心革命目标是什么?中心内容是社会平等、对特权者的攻击、要求根据才能晋升职务。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够自由进入原来被贵族所垄断、对其他人堵死门

径的国家官吏队伍。建立一种比较公正的税收制度同样也属于第三等级的核心要求,为的是使第三等级纳税负担不致过重,使特权等级不能受到优待,而免税是后者最珍惜的特权之一。控诉的锋芒主要指向贵族和教会。

这些市民等级的利益采取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表述形式?我们以普遍主义为例,即信仰某种普遍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适用的人道主义原则。当然,这种普遍主义在西方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但是对于法国市民等级来说,这种价值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市民等级通过宣布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民族”等普遍适用的原则向贵族挑战,而民族是一种普遍的身份特征,它超越了那些局部性的、排他性的身份特征,如亲戚关系、种族、村镇、地位、等级或者阶级。

普遍适用原则是作为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特殊的或私人的权利,一种与特权相对立的——普遍适用原则反对的是等级特权和恩赐权利。从这里出发距离向习惯法和传统发动进攻就已经不远了。这种挑战方式已成为一种历史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市民等级和他们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承担了起领导作用的历史任务:理性和自由的体现者、进步的先驱。

市民等级对于专制主义国家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的。在市民等级能够大批地进入国家有利可图的职位的时候,君主制是合他们的心意的。后来,他们甚至发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完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方案。第三等级对于传统秩序的挑战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拒绝专制主义原则,不如说是简单地扩大专制主义原则。

让我们再一次回过来谈普遍适用原则。16世纪的君主制国家本身已向贵族特权提出挑战——经常是在第三等级、特别是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它精确地借助普遍适用的要求来反

对贵族和其他参与竞争的拥有立法权力量的分立主义。市民等级把专制主义的其他基本原则继承下来,并且加以普遍化,例如早期的计划化与标准化原则。在这方面,专制主义国家和它的主要代表,如黎塞留和科倍特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先锋。甚至法国语言的统一都是中央集权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一种“合理化方案”,在凡尔赛花园中可以找到它的经典的文化表述形式。^①

我在这里不由得要加上一个很有意思的脚注:一些作者(如戴维·哈维和马夏尔·贝尔曼)^②写了些令人很感兴趣的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论文。他们很喜欢强调现代主义意识的二元主义。他们认为,这种现代意识把普遍适用性、恒定性和对于短暂性、偶然性和断裂分化的敏锐感受结合在一起。他们设想可以把这种二元主义追溯到启蒙主义。论据似乎在于,对普遍适用性和绝对真理的援引本身就是一种想对流动的、短暂的、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现代生活经验作出解释的尝试,而他们则把这种现代生活经验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贝尔曼引述了卢梭著作《新爱洛绮思》中的一些段落当作现代主义感情世界最早的表述形式的例子(他把卢梭描述为“现代主义早期阶段原型的现代声音”^③)卢梭作品的主人公圣普乐曾在一封信中描述他抵达巴黎时的印象,其中有一些表现力很强的段落,贝尔曼从中看出了现代主义对于新挑战的理解,这种理

① 关于这一段落的某些观点,我曾在《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对旧制度和现代国家的论述》(1991年伦敦版)一书中作过详细讨论。

② 马夏尔·贝尔曼:《一切坚实的东西都化为烟,现代主义的经验》1988年纽约企鹅出版社版。

③ 同上,第19页。

解是同持续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多样性引起的不安和危险联系在一起。贝尔曼又把这样一种经历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

而我在阅读《新爱洛绮思》中圣普乐的话或贝尔曼关于现代生活“旋涡”的描写时,我的脑海里居于首位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与其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验,倒不如说是城市生活所产生的自古已有的那种恐惧和魅力。卢梭笔下的圣普乐和夏尔·贝尔曼本身关于现代生活经验所说的那些话——在我看来,似乎也可以出自一位进入古罗马时的意大利农民之口。很典型的是,卢梭感到特别亲近的思想家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尔,而事实上,《新爱洛绮思》的敏锐感受表现出的与古老的斯多噶主义的共同性可能比它与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共同性更多。无论如何,卢梭和其他欧洲作家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表述形式不是起源于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而是起源于一个始终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这绝非偶然。

我的主要观点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它更多地与围绕非资本主义占有形式所进行的斗争、与关于经济以外的剥削关系和统治关系的冲突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不想把启蒙主义贬低为一种尚未成熟的阶级意识形态;但是关键在于,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明显地处于非资本主义关系之下——市民等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也采取了一种包容范围更广的争取全人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普遍解放的幻想的形式。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局限,但这还是一种解放的普遍主义——所以能够被更加民主得多的、革命性强得多的力量所接受。

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

为了认清这个领域的复杂性,人们必须把法国和英国作一比较。英国总体上不能说是目前当代模式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故乡”,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这个国家联系起来的。英国在18世纪曾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达到它的顶峰。城市居民人口日益增加,与法国相比,他们在全国居民人口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小所有者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借助暴力,而且还利用经济压力。伦敦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还有一个一体化程度(比其他国家)高得多并具有竞争能力的——国内市场,欧洲和世界的第一个民族国家市场。这已经是一个廉价日用商品、特别是食品和纺织品的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开端,而且劳动居民日益无产阶级化。英国立足于农业的生产基础已经按照资本主义基本原则进行运作。在这里贵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卷入农业资本主义和新的商品贸易形式。与此同时,英国也正在建设工业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人们会问,在上述阶段,英国资本主义典型的、明显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是什么?不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合理计划论,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手”和英国经济主义哲学。不是讲求形式、刻意雕琢的凡尔赛花园,而是漫无规则、明显未经过计划的“自然的”景观花园。当然,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对于科学和技术是感兴趣的,这也要首先归功于培根和洛克等人。但是,英国和其他欧洲文化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独具特征的

意识形态首先是“逐步改良”思想——不是启蒙主义关于人类进步的思想,而是推广私有制的思想,关于生产率和赢利的伦理学(事实上也是这方面的科学),关于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责任和义务,为圈地和剥夺进行辩护的伦理学。

这种逐步改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纪。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经济学和约翰·洛克那里都可以发现它的最初的理论表述。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农业改良的观念和相应的文学在同一时代的法国却没有出现。当时农民主宰着生产,地主同整个市民阶级一样,保持着年金收入者的心态。这里证明规律的例外情形的是重农学派,这种法国经济学把英国农业当作模式。

如果人们要寻找一种破坏性的“现代主义”的根源——即技术中心主义和使生态退化的意识形态,那就不能在启蒙主义中,而应在逐步改良的方案中,在使人的全部价值都从属于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方案中去寻找。我甚至敢断言,疯牛病丑闻之所以在英国这个“逐步改善—进步”概念的诞生地,而不是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发生,并不是偶然的。

一种时代更替吗?

关于现代主义就说这么多。我现在要回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分期与交替这个范围更大的问题上来。我曾经尝试把现代主义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观,而在我看来,这种历史观是根本错误的,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如果说,这种

观念还没有完全抹杀资本主义的存在的話,那么它至少最终使资本主义中性化或者天然合法化。然而我们仍旧必须关注资本主义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包含不断变化和发展,更不必说周期性危机了。但是真的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断裂吗?也许这是在60或70年代?

我公开声明,我自己刚刚开始整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借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设想并且根据这些概念对资本主义分期,并不能对所有下述问题的理解有丝毫帮助:是否存在一种历史断裂?如果存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种断裂有多深?持续有多久?起了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说它对于各种政治方案有过什么影响?在我看来,这些设想和这种分期会把我們引导到完全错误的地方。

我已在这里详细说明,目前所使用的现代主义概念是与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观察相联系的,它把技术决定主义与商品交易不可避免论结合在一起,使资本主义简直成了某种跨越历史的、几乎自然而然的过程的延伸,即商品贸易和技术的扩展。我们从这样一种观察中能指望得到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阶段分期呢?标志一次大规模划时代变化的路标又是什么呢?人们可以指望市场或技术中随便哪一次较大规模变化的界碑就是这种路标。而事实上目前关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理论大多数也都是如此叙述的。虽然这个理论可以向我们讲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我无法确认,它关于一场大的历史断裂是否已经对我们讲得够多了。

让我们研究一下所谓的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过渡的问题。我想暂时撇开劳动过程和营销战略中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扩展到多大程度这一问题不说。但是我一再问自己,伴随这场变化究竟出现了些什么?我并不认为这里丝毫没有有什么新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是否如此之新,以致使我们有理由宣布已完成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划时代过渡,或者向一种全新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过渡?

在旧福特制中,流水线作为高薪专业工人的替代者,并且为了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控制被资本使用,其显而易见的目标就是要从劳动中榨取更多的价值。而今天,新技术被用于这样一些目标:为了更容易、更简单地进行产品组装,为了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控制,为了排除生产部门和服务产业中的各种熟练技术,或者把它们组合起来,为了用低薪工人取代高薪工人,为了全面裁减工人——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为了同一目标,即为了从劳动中榨取更多的价值。可见这个所谓的新经济结构中的新东西并不在于新技术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更替。相反,它只不过容许人们使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老经济结构多样化和扩大。旧的理论逻辑现在能够渗透到它以前始终或多或少未能涉及的那些全新的产业部门之中。

为了把这些发展看作是一场较大规模的划时代断裂,人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或多或少的独立自主的技术逻辑上,不管这是劳动过程的技术还是营销的技术。我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是专门的技术工艺或劳动过程,而是特殊的社会所有制关系的逻辑。自然,技术始终在不断变化,营销战略也有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不能构成资本主义运动法则中的大规模划时代变化。

或者我们可以说,福特主义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划时代变化,至少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它表明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使劳动确实隶属于资本这个过程已经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技术并不意味着一种划时代更替,而仅仅意味着福特主义的延伸。我这样说的意思很简单:资本主义积累的

逻辑依旧可以相当普遍地应用于新技术,或者应用于新的生产形式、营销形式,但是这种积累逻辑首先要遵循福特主义的逻辑。

那么,什么是新的?

总而言之,我不赞同把“后现代主义”描绘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时代的说法,我宁可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一生中的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自然与资本主义有某些关联,但也可能只是一代知识分子在理论方面的自我意识。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战后长期繁荣的特殊时期内成熟起来的。对于这一代人的某些成员来说,这个繁荣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正常状态的终结。就这一点而言,对于他们来说,自 70 年代以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具有一种特殊的、根本性变革的意义。而另一些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者们似乎还陷在所谓的消费资本主义繁荣阶段里而不能自拔。

如果说,20 世纪下半叶确实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划时代变化的话,我们必须在另外的地方去寻找。如果我们要寻找比技术和营销战略中的变化更为深刻的变革的话,那么,单凭与灵活积累或者消费主义有关的说明是非常不够的。如果说,20 世纪下半叶有一场划时代更替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在灵活积累、消费主义、信息技术、后现代主义文化或其他习惯设想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埃利克·霍布斯鲍姆在他不久前发表的关于 20 世纪历史的著作中谈到 20 世纪中叶有一场巨大的变化,他甚至把这称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最伟大、最迅速、最彻底的(经济的、社会的

和文化的)变革”。^①在他看来,这场变革最富于戏剧性的象征就是农民阶级的消亡。但是我认为,随着这场变化而来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是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这个时期的见证。

我的观点是,甚至在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即渗透到国家、统治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我在我写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以及在其他场合都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发展,通过这些发展,甚至在西欧(更精确地说:与流行的论证相反,与其说是在英国,不如说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只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占领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但最近几十年内,这个过程恐怕几乎已经完成。自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但是我要立即补充的是,我指的并不是令人厌烦的、旧的“全球化”公式。我心目中想到的,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及民族国家的削弱——在这两件事上,我都抱怀疑态度。不如说我指的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我们从70年代以来就是某些新事物的见证人,那么这个新事物不是指资本主义连续性的大规模中断,相反是指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成熟。我们看到的也许是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体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最初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作为这样一种体系的后果,这种体系不仅再也没有一

^① 埃利克·霍布斯鲍姆:《极端时代,20世纪世界史》1995年慕尼黑—维也纳版。

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资本主义带着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孤独地生活着。它在自身内在机制之外找不到任何帮助,来纠正或者补偿这些矛盾及其破坏性作用。甚至被称作资本主义最后避难所的帝国主义不像它当初那样了。在占据领土或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旧形式中,资本大国通常可以在非资本主义地区解决它的对抗和矛盾。而现在甚至这种纠正机制大部分也已被经济优势和金融帝国主义的露骨的资本主义机制所取代。

就此而言,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这还是资本主义。如果说“现代主义”与所有这一切有某种关系的话,那就是它确实地真正地已经过时,不是被资本主义推向前台,而是被资本主义摧毁。启蒙主义已经死亡,也许社会主义将会使它重新复活,但是目前“逐步改善”的文化正居于优势地位。如果说,这就是整个历史的话,那么我们确实不需要后现代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加以辩论的唯一思想命题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新的现实。它的反题自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如果我的建议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像那些资本主义凯旋论者一厢情愿地相信的那样,成为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方案的理由。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全面化”同时意味着它越来越容易被它自身内在矛盾及反对派政策所伤害。

我刚刚听到丹尼尔·辛格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他说,此前不久法国统治阶级开始庆贺他们已使法国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法国的“正常状态”总建筑师——密特朗葬礼上的主要话题。密特朗把法国引入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新保守主义政府所遵循的方向。在法国资产阶级自我欢庆的时候,法国人民却走上大街,举行抗议示威,在某些地方,人数之多前所未见。我认为这是与未

加装饰的或未精心打扮的资本主义,与它的完全赤裸裸的和没有化装的现实直接冲突的结果。这件事倒使我们产生一种希望,这也许会成为一个真正划时代变化的象征。

(张世鹏 译)